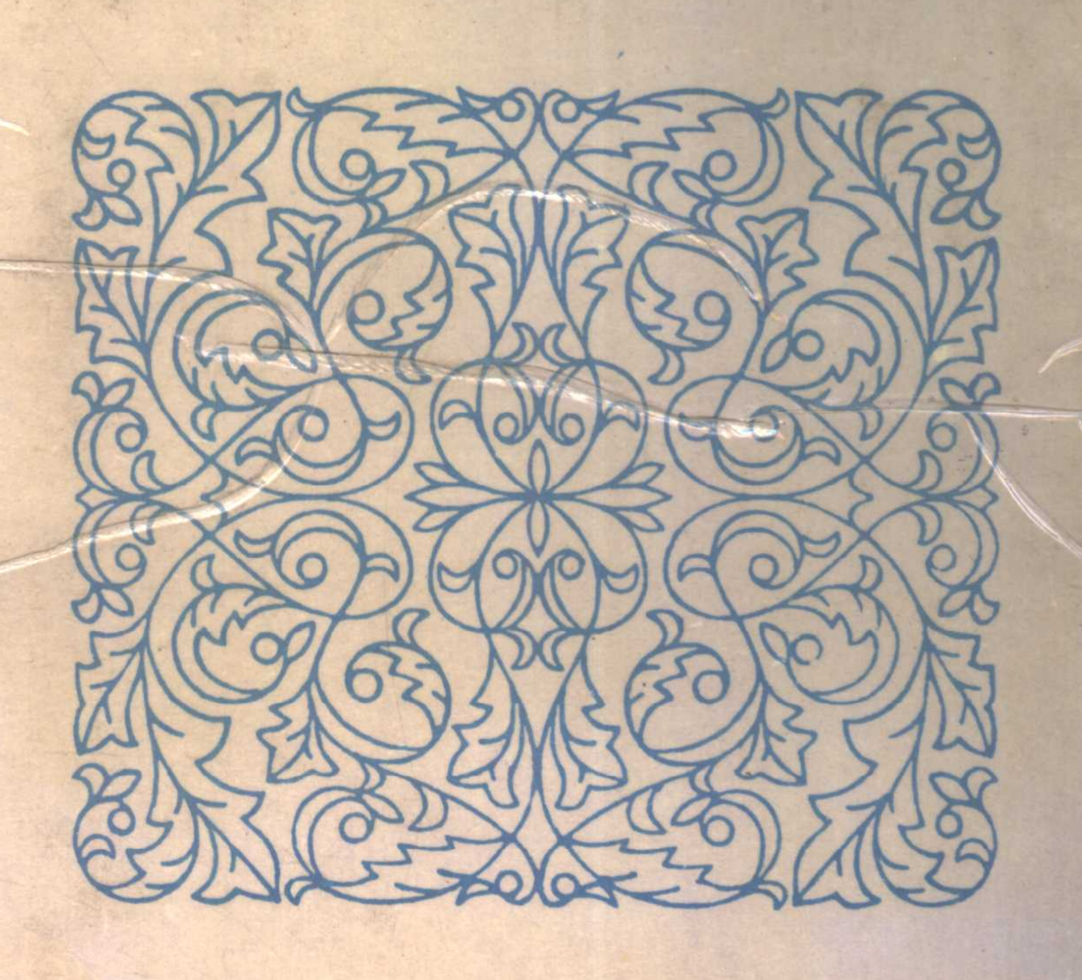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40·



民國叢書

第四編

·40·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　方豪著

明日之中國文化　張君勱著

歐化東漸史　張星烺著

西學東漸記　容純甫述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　馮瑶林著

上海書店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

方　豪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 第一輯

全一册定價三元三角正

著作者 方豪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正中書局 重慶中山路二三四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清校者 張木闓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自序

民國三十一年冬，余應友明之請，擇近年所草有關中外文化交通史之論文若干篇，輯為甲集，付獨立出版社印行，迄三十三年春始排畢，乃為之序。

夫列國相處，斷不能閉關自守；明太祖不許片板入海，可謂嚴矣，顧明初中國與南洋之交通，並未稍衰。國與國之關係既生，遂不能無影響，影響之可見者，於文化為尤著。中外交通之專蹟，久為我國史家所注意：史記有西域大宛之傳，後世有大秦、大食、諸蕃、外國諸傳，他若私家文集及筆記稗史中，其材料亦美不勝收。惟以事涉域外，易生遐想，於是荒誕不經傳會捏造之說，遂充斥其間，最為學者所病！

洎清之中葉，西北地理學崛興，於是中國與外邦交往之遺迹，為談時務者所不能不知；益以東西學者創為「中國學」（Sinologia）之名，研究中外交通之風，遂爾大盛；「中國學」包含彌廣，而中外交通之史蹟，尤投時人所好；故民國以前，其以治斯學而馳名壇坫者，非西人即日人，而國人無聞焉。

惟自日人創為東西交通史（或作交涉史，關係史）之名，國人亦從而稱中西交通史；夫晚近歐美科學文明，誠可謂日麗中天矣；且自古以降，曰「西方聖人」，曰「西方美人」，黃帝有訪西王母之神話，老子有出關西遊之傳說，國人於西方之想慕，亦可謂至

矣，顧以方位言學術研究之範圍，究有未便：言中俄關係史者　不能忽略與蒙古接壤之一部，言中國與歐洲關係史者，不能不及南洋，但此數地者，俱非西字所能盡也；且今日國人所稱中西交通史，其所不言者，日本而已，夫如是，則毋寧易稱中外交通史，而中日關係史亦可以兼容並包矣。

本集所收各文，除論相偷戲及打簇戲一通訊外，餘皆限於明代以後，且莫非早年初步研究之作，雖在編纂時，已一一加以訂正，而兩年來，仍時有弋獲。舉例言之，如：「嘉靖間葡萄牙人在寧波被屠問題」，乃前在北平新北辰雜誌第三卷第五期（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發表者，原用語體，近年以新得材料頗多，乃全部重寫，改用文言，是即本集所收者；然年餘以來，仍續有所得，今春為復旦學報復刊第一號撰「十六世紀中國通商港Liampo位置考」雖為同一問題之改作，而材料之增加，不啻倍蓰。則關於此問題之研究，固不能不以復旦學報所刊者為目前暫時之定本。

「拉丁文傳入中國考」，原載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三十一年八月）；集刊為石印本，字數頗有限制，不能暢所欲言，去年余於說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十一月）發表「康熙雍正二帝之提倡拉丁文」，即增補原文之第三節者；今歲友人聞在宥兄亦囑「拉丁文傳入中國考補」投寄拙編真理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三月），余乃乘機復就舊稿見所不及者而補其後。其他待補之處猶多，非短序所能盡；讀者假我以歲月，必有求教之

日也。

「伽利略與科學輸入我國之關係」，此亦為國人前所未知者。是文既登入思想與時代第十五期（三十一年十月）矣，乃又獲讀吾友裴化行司鐸 P. Henri Bernard，在華裔學誌 Monumenta Serica 發表之「崇禎曆書及西洋新法曆書考」一名「中國修曆所受克拉維、伽利略及刻白爾之影響」（原為法文），於是復草「伽利略與中國關係之新資料」一文，發表於科學技術月刊第二期。（三十三年二月）近嚴敦傑君函告於重慶書肆購得 Li Marco Polo 一九四〇年二月號內有裴化行「早期靈采科學院與中國」一文，裴化行氏以數學專家，改治中西交通史，通英、法、德、義、西、葡、拉丁及中文，網羅史料至夥，前途未可限量；此文或亦有為吾人所不及見者。

「紅樓夢新考」乃專為研究書中所載外國物來源而作者，由外國物傳入之時間而推知紅樓夢故事應發生之年代，復因此而考知大觀園曾有西洋人之足跡，實為余着手考證之始所不及料者；此固為意外之收穫，亦嘗節要刊登於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二號，（三十二年四月）惟就年來讀書所得，則又有可補者三事：

一、關於和珅被籍沒之家產中所有洋物，無名氏輯「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三十五冊）與錢鱸香之嘉慶和珅檔案，頗有歧異，茲分列於後：

嘉慶和珅檔案	從抄和珅家產清單
大自鳴鐘　十九座	大自鳴鐘　十座
小自鳴鐘　十九座	小自鳴鐘　一百五十六座
缺	桌鐘　三百架
洋表　一百餘個	時辰表　八百個
洋鐸　二萬八千圓	同上
瑪瑙煙壺　一百餘個	玉鼻煙壺　四十八個
五色大呢　八百板	五色呢　四百五十板
鶯㲲　一百十板	大紅呢　八百板
五色羽緞　六百餘板	羽毛　六百板
五色嗶嘰　二百餘板	五色嗶嘰　二十五板

（大紅呢是否即鶯㲲，未及考，姑以此繫之。）

二、關於紅樓夢計時之稱法，拙作謂：「子初二刻十分，即為現在十一點四十分，蓋子正為午夜十二時，子初則猶未到十二時；二刻為三十分，加十分則四十分矣。」然此說謬，應更正。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三「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曰：「此本有一處註語最可證明曹雪芹是無疑的紅樓夢作者。第五十二回末頁寫晴雯補裘完時，

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下有雙行小註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所以避諱「寅」字。「四下既是寅正初刻，往上逆推，二下爲丑正初刻，則子正初刻實即午夜十二時，子初三刻十分當爲十二點五十五分。

三、關於康熙二十八年西教士張誠洪若翰於織造局覲帝時，任江寧織造者爲何人。據作以江南通志載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任江寧織造者爲桑格。張穆編閻潛丘先生年譜八十五頁附註，稱康熙十七年曹璽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子清爲曹寅字，可見曹寅乃直接繼曹璽之任者，璽與寅之間無桑格其人。惟曹璽之任織造既始於康熙十七年，假設而其在任三十餘年，則曹寅繼任當在康熙四十八年後矣。按故宮博物院民國十七年刊行康熙硃批諭旨，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曹寅子連生奏曹寅故情形」摺云：「奴才故父一生，叨沐聖主浩蕩洪恩，出管江寧織造二十餘年」，以康熙五十一年上推二十餘年，是曹寅之任江寧織造實在康熙三十一年之前，則江南通志以桑格爲織造之誤益可徵信，而康熙二十八年西教士進織造局覲帝時任織造者爲曹寅，亦多一證矣。

嗟乎！余少時，好癡學，而先大夫督教甚嚴，經籍古文辭外，尤喜披讀乙部之書：今先父見背已十七年矣，先母之喪，更早二年，若仿西人著述之例，則此書之應獻奉（Dedication）者，舍先父母莫屬，無待五八矣！若夫糾繆匡誤，則固余所深望於讀者也。民國三十

中外文化交流史論叢第一輯

三十年春於日機騷擾方殷謹識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

目次

嘉靖間葡萄牙人在甯波被屠問題

讀近人選譯中西文化交通史及有關明代外交或宗教等問題之論著，時有十六世紀西大批葡人在寧波（雙嶼）被屠之記述。惟關於屠殺年代與葡人到甬日期，死難人數及被焚燬之船數等，頗多紛歧，而西人著作中，亦不免有此現象。蓋國人所述多本諸西文，所據不同，論列遂異，初無足怪者。惟其事實中西交通史上一大問題，不可不一究其真相也。

最先紀述寧波葡人被屠事件者，爲葡人品篤 Fernand Mendez Pinto。故本文先述（一）品篤小傳與品篤遊記編印記略。（二）遊記之評價。繼之以（三）品篤遊記所載葡人在寧波被屠經過。（四）品篤遊記文考證。殿之以（五）寧波事件之漢文史料。（六）中西文史料之引證。

（一）品篤小傳與品篤遊記編印記略

品篤葡人，十六世紀初生（年月不詳）。自幼即有航海冒險之志。一五三七年（嘉靖十六年）離葡，在外飄泊二十一年，遭遇順逆無常，曾任大使及艦長，並曾在海中失事遇難，且一度爲俘囚。一五五八年（嘉靖三十七年）回葡，爲國人蔑視。顧品篤攜回之紀念物頗豐。並開始起草遊記，倩人潤色。惟品篤之探險報告書，未及付印問世，其本人卽於一五八三年（萬曆十一年）棄世永訣。（品篤生地在高因勃耳 Coimbre 附近，卒地在

斯本附近）

稿本後付託一職業編著家名方濟各特桑特拉大 Francisco de Andrada 者，改削頗多，增添補註之處，亦復不少；原書本來面目，遂不可復得。蓋詞句雖流暢華美，簡潔有致，然其書之歷史價值，則因校訂者對於地方人物茫然無知，大爲減色。（書於一六一四年出版）

（二）遊記之評價

自上節觀之，原書在史地學上之權威，實至微薄。然中古時代歐洲人之東亞遊記，其來經後人删改潤色者綦夥，馬哥波羅 Marco Polo 與和德理 Odoric ，俱不能脫此厄運。惟自經後人詳密考察，乃知品篤遊記，眞實性尚未盡失。自來批評品篤遊記者，如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 H. Bernard : Aux Portes de la china. P.82（借譯本懸劣，如在五十二冊一頁中，相去僅四行，即將 Pinto 譯作平托與品多兩個絕對不同之中國名字）曰：「可惜我們對他這部老年時寫成的作品，不能有堅實的信仰心。……全憑回憶和反省，一定有許多不符事實之處。再說他是一個多言好謗的人，如果在寫述時他覺得有什麼不能斷實的地方，必要用虛偽的枝節去補足。」戴遂良之史料集 P. Wenger: Textes Historiques3—4, P.2035 稱之爲「可憐的權威」。倫傑隆之亞洲旅行記 P. Bergeron Voyages faits Principalement en Asie 書中（十八世紀）記漢學家沙海昂 Charignon

評爲「小說作品」。高迪愛中國通史 H.Cordier: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t.IV 則直斥爲妄言。此外更有毀謗之徒，詆之爲「誇大的南方人」「戲劇家」等。友人張星烺先生歐化東漸史中，雖引用其記載（六頁），顧在渠致作者手札中，則謂品篤遊記，經德人 Schurhammer 之考證，知其爲誑造，不可信。其書文雜亂無序，幾於無從着手考證云云。按 Schurhammer 之考證，載在 Asia major 雜誌 1926, t.Ⅲ, P.P.71—103, 194—267，名 Fernand Mendez Pinto und Seine Peregrinação。

惟最近沙畹昂夫人 A.J.H.Charignon 發表其「關於品篤之探險遊記」Apropos des Voyages aventureux de Fernand Mendez Pinto 一文，並經北平法儒邁德女士 M.Medand 增訂箋註，初在北京政聞報 La Politique de Pekin 發表，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起，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止，每星期連續刊布。後於一九三六年單行問世，北平李司鐸 A.B.Duvigneu, C.M. 並在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 1937, Janu 著文介紹，謂爲品篤竭力辯護。然所述軼出本文範圍，不復贅焉。

（三）品篤遊記所載葡人在寧波被屠經過

近人轉錄之葡人被屠記載，既多不相同，爰根據沙畹昂夫人考本，重譯一過，要使讀者能得一較爲準確之敍述。

「吾人旣達寧波（假定）諸港，港爲兩對峙小島，離當時葡人經商之地約三里，

（原名 lieu，爲古法國里制，海里一里計五五五五粎，陸里一里計四四四四粎）彼等皆住其地，遇有一千餘所館舍；管理者有區長 échevins（一七八九年前之法國官名），陪審員，議事員，法官與其他七八種諮議或裁判員司。書記官當宣判終了時，即向在下之人宣稱：「余某某，寧波法院起草兼編目書記官，奉我皇陛下云云……。」所有屋宇，耗三四千杜加脫 ducats 金幣，（每枚約値法郎十至十二枚）始得造成。乃因吾人所犯罪戾，無論大小，盡爲華人焚燬……。」

「本地居民與沿岸船戶咸呼此兩島之間爲寧波；其地有一運河，長寬厖較 arque-buse（古鎗名）兩倍射擊之距程尤大，深至四〇．五粎，有若干處其海岸極宜於下錨停泊；並有一風景優美之小河，河水甘美，源出高山，流經之地，松柏橡樹等小森林，皆甚深密。前安多尼特法利亞 Antonio de Faria 停泊之地，即在二島之間。……」

「政府大員（Chaem）即本地巡撫（？），令海道（Haitan）出巢，發艦船三百艘，小艇（用槳櫓者）八十艘，船上共六萬人，在十七日內召集。海道等於我國之海軍司令 Amiral。此艦隊乃專來毀滅此不幸之葡屬地者。事變之經過，將葡人實出意外，使余不得不承認余之記述，必有遺漏，此實出於余學力不足，即有敏銳之悟性，亦不能充分推想。茲就余目睹者略述如後：此次災難之爭所予之恐怖懲戒，殺達五小

時之久，兇猛之賊人，並不使寧波境內有所餘存可資稱述。凡為彼等發現者，一律被燒焚燬。此外又被屠殺一萬二千基督教徒，凡百葡人亦統計在內，另在三十五艘小艇及四十二艘帆船中被焚。財貨金錠，胡椒，檀香，丁香，肉豆蔻與肉豆蔻子，以及其他貨物，損失二百萬金。凡此種種災禍，皆因存心不良與貪鄙之葡人不擇所致。……時一五四二年（嘉靖二十一年）瑪爾定•亞風索•特•蘇薩 Martin Afonso de Sousa 任印度總督，呂•凡•貝勒拉•馬拉馬克 Ruy Vas Pereya Marramaque 任馬剌甲軍佐。」

（四）品篤遊記文考證

品篤遊記中之 Liampo 是否即係寧波？在本文之首，寧波二字下加標「假定」二字，蓋因品篤遊記中之 Liampo，與現在通行之寧波譯音 Ningpo 不同。沙海昂夫人即否認其係寧波二字譯音者。

（1）沙夫人以為當時外人在中國境內旅行，甚或旅行僑居，未經許可，而又不為官方察覺，在事實上倘有可能，但重要口岸如 Liampo 者，必在廣東省，而不能在他省也。最多亦僅能假想其在福建省，斷不能在浙江省。因浙省密邇陪都（指南京），外人極易被察也。

然以吾人觀之，沙夫人實未免過慮。蓋明季倭寇在浙江之侵擾，遠在葡人以上，孰謂

其事不可能，或爲後人所飾造耶？

（2）沙夫人又云品篤等某次舟中遇颶風，曾有加以詰問者，乃答稱：「余等欲往南京，以便明年北京 Ayria。政府特許我國人貿易之廣州。」沙夫人以爲南京在廣州，路程之遠，當在寧波到廣州三倍半之上，擬之以理，應先覓寧波而後再訪 Liampo，但遊記中不曰寧波，而曰廣州，足見 Liampo 乃在廣東省沿海。

此一說亦不足信。品篤雖自 Liampo 出發，但海中遇風後，並非不回原處不可。況當時葡人已在廣東被逐，並無置足之地。（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一九海外諸蕃，林富疏；又明實錄嘉靖八年十月明史佛郎機傳何鰲疏，王希文疏；又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卷下澳蕃篇等）。

（3）品篤遊記中稱南京爲 Lanquin，Sumbor 三省（？）之首府。此說頗費解，而沙夫人以第一地名爲代表廣東省，第二地代表福建省，第三地名代表浙江省之謂 Sombor 即 Sang—Pou 即 Sung—Kiang—Fou（松江府）之稱，則尤爲費解，且難得確證之證。據吾人揣測，當時外人或僅知市舶司，而不知省名，或以市舶爲省，所謂三省 Royaume 大約即三市舶司。謂南京轄三市舶司者，謂南京轄三省與轄浙江市。三市舶司者，即指寧波（安遠驛），福建之泉州（來遠驛），廣東之廣州（懷遠驛）。三司最初設立在洪武初（一三六九）洪武七年（一三七四）罷，永樂元年（一四〇三）

復，三年（一四〇五）罷驛。正德三年（一五〇八）移廣州市舶司於高州電白縣，嘉靖元年（一五二二）罷浙閩二司，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又復。

（6）聖方濟各沙勿略 S.Fr.Xavier 曾於一五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由 Cochin 致函西蒙羅特里格 Simon Rodrigue 曰：「自日本至中國近海要城 Liampo，相距凡一百六十里。」（見前）（文見通報一九一一年 Cordier 發表）

沙夫人以爲聖方濟各所切望身臨其地者，仍係杭州而非寧波，否則亦宋故都杭州之名，遠在寧波之上，方濟各必更願前往杭州也。

沙氏人之見解實甚幼稚，蓋歷史上寧波對日本之關係，在中國實無可與比。日本佛教全書安祥寺惠運傳載：「乘大唐商人李處人之船入唐，又乘唐張支信等之船，自明州（當寧波）上帆歸國。」可知寧波之爲中日交通口岸，其由來實已久矣。

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曰：「蘇州，揚州，明州，楚州，爲日本遣唐使必經之地。自唐文宗開成四年至唐亡，日支商舶停泊地點，以明州爲最多。」

宋代對倭船之禁最嚴，但在浙江仍未絕跡。宋元以來，浙江與日本，市舶而外，在文化上亦有密切之關係。蓋日本僧侶以天台宗爲最盛，而天台宗實得諸浙江也。浙江徑山，靈隱，天童，普陀，育王，淨慈諸古刹，皆予日本以絕大之影響。日人之頂禮膜拜者踵相接。明季朱舜水王陽明先生，尤爲日本文化之祖。

宋史日本國傳曰：「日本商船，入口最多者，爲慶元府。」慶元卽寧波。又淳化三年（九九二）「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縣。」（輿地紀勝卷二）此所謂定海卽今日之鎮海。

開慶四明志卷六市舶條，有日本入口貨物表。四明續志卷八，則有錢包抽博倭金歌，歐陽修日本刀歌（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五）曰：「寶刀出自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越賈亦指寧波商人而言。

元仁宗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命王克敬往四明監倭人貿易。洪武七年置寧波市舶司，則又專爲日本入貢帶有貨物交易而設者。（見續文獻通考）

粵海關志卷四引明譚順之曰：「國初，浙福廣三省設市舶司，在浙江省者則專爲日人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

明史食貨志卷四曰：「市舶司……洪武初……設於寧波……。寧波通日本，日本叛服無常，故限其期爲十年，人數二百，舟爲二艘。」又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眞僞。……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市舶旣罷，日本海賈往來自由，海上姦豪與之交通，遂爲寇賊。」具徵寧波對日關係之深。若再檢寧波府志，鄞縣志等書，則類此紀述，更俯拾卽是。聖方濟各之所以先願來中國傳教者，卽因日人在當時事事以中國爲表率，曾坦白向方濟各聲明，若干中國人代奉天主教，

書籍亦必從其後。（見方濟各沙勿略行實）然日人自廣東所獲得者惟貨物，自浙江（寧波）輸入者，則爲佛教與朱舜水及王陽明之學說。謂當時日本士大夫心目中。有浙江而無廣東，實無不可。況寧波爲通杭州口岸，方濟各云往寧波，或即有意探入杭州，最低限度亦不能謂其不知有杭州，或無意到杭州也。況倭寇侵擾中國，亦以浙江沿海爲最烈。（見黎光明著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近人趙簡坪著日本對華商業，述明季日使日商與寧波之關係，亦頗詳盡）

此外，沙夫人以 Liampo 爲電白，因葡人書法，T字與L字極相類似Tien-po與 Liampo，亦極相近，若改爲 Niampo，則仍與 Ningpo（寧波）之讀音與書法，相差甚鉅。又以爲 Liampo 或即浪白滘，（裴化行十六世紀天主教在華傳教誌乃同意此說者）吾人根據下列理由，知此種考據，均甚牽强。

（A）閩廣人方音往往以N代L，以L代N，南京讀作 Langkin，蘭谿讀作Nanki，故寧波亦能讀作 Liampo。（說見 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1917,N0 9.）品篤先到閩廣，故習用閩廣音。

（B）寧海（寧波之南）人讀寧字，與倫字同，在寧波一帶，此種讀法，隨處可聞。外國史家如高迪愛所引之 Biker,Macau; Jndice Chronologico（P.165—167）又何大化 P Ant.de Gouvea,一六四四年所撰之 Asia Extrema（Chap.XIX.）皆主此說。

（二）寧波事件之漢文史料

前人已往譯著中，對寧波事件，雖多已錄入，但亦有未盡審慎者。其最大原因，固由品篤遊記之不盡可靠，亦因在漢文載籍中，向無旁證之史料。前在寧波時，友人囑為鄞縣通志館撰寧波天主教史，或時曾在拙稿中敘述此事。後張蔭麟先生來函，因寧波府志等中，絕未言及其事，囑謹慎引用，遂即託友人轉為更正。但最近研究所得，尚有大出意料之外者。特分述如下；

1　葡人入浙之史料　明史朱紈傳曰：「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朱紈字子純，長洲人，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任浙閩海防軍務巡撫，二十八年即因誅李光頭而獲咎落職，仰藥死。可知佛郎機人之來寧波，即在此時。佛郎機在當時係指葡萄牙人而言。殊域周咨錄卷二頁一八略同。

朱紈甓餘雜集卷二「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奏云：「……又據上虞縣知縣陳大賓申抄黑番鬼三名口詞：……佛郎機十人與伊一十三人，共漳州寧波大小七十餘人，駕船在海將胡椒、銀子換米、布、紬緞、棉紬、絲綿，騙去銀三百兩，坐等不來；又寧波客人林老魁先與番人將銀二百兩，買段子，綿紬，後將伊男留在番船騙去銀一十八兩，又有不知名寧波客人哄稱有湖絲十六担，欺騙番人，騙去銀七百兩，六擔欠貨與日本人，騙去銀

三百兩」；今在雙嶼被獲六七十人，內有漳州一人，南京一人，寧波三人，及漳州一人斬首，一人溺水身死，其餘逃散等語……」按黑番鬼三人皆馬來人也。可知當時到雙嶼者，佛郎機人外尚有其他南洋或印度等處人也。

明鄭舜功日本一鑑曰：「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鄧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獄，嘉靖丙戌（一五二六）越獄逋下海，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投託合澳之人盧黃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一五四〇），許一（松），許（二）許三（棟）許四（梓）句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自玆東南釁門開矣。……夥伴王直（名鋥，即五峯）於乙巳歲（一五四五）往市日本，始誘博多津，倭助才門等三人，來市雙嶼，明年，復行風布其地，直浙倭患生矣。」

又「嘉靖癸卯（一五四三），海道副使張一厚欲討伐，捕獲犯禁通番擾害閩浙之許一許二，反爲許一許二等所敵殺。許一許二等兄弟與佛郎機夷，泊於雙嶼。」

利類思不得已辯亦稱：「明季弘治年間，西客遊廣東廣州，浙江寧波，往來貿易。」（見原書附精選法行教辯）西客必指葡人。利類想（L. Buglio），爲義大利教士，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入中國，以明末歐洲人，而記當時歐洲人事，必可靠也。

王鳴鶴登壇必究卷二十九火器曰：「鳥銃傳自西番，未得其妙。歲戊申，盧鏜破雙嶼，獲番銃者，授其背褩，命馬憲制器，李槐製藥，始稱絕云。」戊申乃嘉靖二十七年（

一五四八）。此云鳥銃傳自西番，則善銃者必亦西番無疑，雙嶼之有西人（葡萄牙人）也可知矣。

俞大猷正氣堂集（卷七）曰：「數年前，徽州浙江等地方之番徒，引誘西南諸番，至浙江雙嶼等處爲貿易，藉以免避廣東市舶司之稅。」（論海勢宜知海防宜密書）

明鄧鍾籌海重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善板書室藏萬歷二十年本）云：「鄭若曾云……貢舶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舶廣東之私澳，官稅而貿易之，後而皆避抽稅，省陸運，福人導之，改船海倉月港，浙人又導之，改船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可與貢舶相混乎。」可知來雙嶼者，實西洋之商舶也。（他本「雙嶼」作雙山嶼」）

王世貞弇州史料（卷三）曰：「船客許棟王直等，於雙嶼諸港，擁萬衆，地方紳士，利其互市，陰與之通。」（湖廣按察副使沈密傳）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十一冊浙江上）曰：「（嘉靖）十九年，福建繫囚李七許一等百餘人，越獄下海，同徽歙奸民王直（即王五峯），徐維學（即徐碧溪），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倭，結巢於霩衢之雙澳，出沒爲患。」

（2）葡人敗遁之史料　明史朱紈傳（接上）曰：「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

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製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値，棟等即誘之攻剽負債，令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明年（嘉靖二十七年）都御史朱紈，使副使柯喬，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 ，遏賊 逸，使都司盧 ，將福清兵，由海門進。……夏四月，鏜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擒，棟黨王直等，收餘衆遁。鏜築塞雙嶼而還。」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二十二册浙江下舟山志港）曰：「雙嶼港去城（舟山）東南百里，南洋之表，爲倭夷，貢寇必由之路。嘉靖間總制軍務朱公紈，命都指揮盧鏜，率兵堵塞之。」下附來紈贈盧鏜詩，原稿已塗去，余以其可供參攷也，仍錄出之：「梅港雙龍伏，桃洋一斧開，旌旗隨日月，金鼓動風雷，揮毫雲影動，飛酒浪頭迴，淮于門南涘，豎中甾將臺。」文中「去城東南百里」一語，不實。詩曰梅港者 ，以附近有梅花市也。曰桃洋者，以附近有桃花山也。

又（原編第十一册浙江上）：「十九年（嘉靖）福建繫囚李七，許一等百餘人，越獄下海，同徽欽奸民王直，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倭，結巢於霩衢之雙嶼，出沒爲患。巡撫都御史朱紈，調發福建都指揮盧鏜，統督舟師，擣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餘黨遁至福建之浯嶼，復帥鏜剿平之，紈乃躬督指揮李興，帥兵發木石，塞雙嶼港，賊舟不得復入。」

籌海圖編（卷八）曰：「雙嶼先年為賊巢，今填塞。」又稱賊營結巢四出焚掠，時在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云。

（六）中西文史料之印證

為考證明晰起見，先將上引漢文史料作一簡表。

史料來源	肇事人	肇事地點	肇事年代	所傷人數
明史	倭人及佛郎機人奸民	寧波之雙嶼	1547——1549	?
日本一鑑	奸民及佛郎機人	雙嶼大茅等	1540——[illegible]	?
正氣堂集	西南番	雙嶼等	?	?
弇州史料	舶客及徒衆	雙嶼等	?	（[illegible]）
登壇必究	有西番	雙嶼	1548	?
天下郡國利病書	番倭及奸民	寧波之雙嶼（雙嶼港）	1540	數百
籌海圖編	賊	雙嶼	1540	?

（以上史料因地點及奸民巡撫等姓名相同所指必為一事）根據右表，可得下列若干結論：

（1）被難中有倭寇，有佛郎機人，有馬來人，有奸民。葡人由廣東，故正氣堂集稱為西洋番，此為一五六八年，日本織田信長將軍在東京四條房門撥地建堂，被稱「南蠻寺」，蓋指南方來之葡萄牙教士，而當時西醫亦稱南蠻醫術。）天下郡國利病書稱番舶。近人梁嘉彬明史佛郎機傳考證（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謂「當時中國既不能分別滿剌加與佛郎機，復不能分別佛郎機與倭寇。」其言極是。但倭人嘗有偽扮為佛郎機人者，亦使人不易辨認之一大原因也，明鄭舜功日本一鑑海市篇：「歲乙卯（嘉靖三十四年）佛郎機國夷人誘引倭夷，來市廣東海上，周鸞等使倭扮作佛郎機，同市廣東賣麻街，遲久乃去。」廣東佛郎機人有此勾當，安知浙江之倭人亦不仿效之乎？

（2）地點在雙嶼，此與品篤遊記中所稱「二島」極合。品篤書中不稱雙嶼而仍單稱寧波，則因寧波著名，足以包括雙嶼，故明史亦稱寧波之雙嶼。（見圖）浙江通志（卷八十八）曰：「[illegible]驛，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洪武二十年分陳度建，今皆裁革。」（驛傳上）（引嘉靖寧波府志）又（卷二十三）曰：「霩衢所城，郡治東南一百八十里，定海縣海晏三都地名霩衢，

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築城鑿池，闢南西北三門，羅以月城，其東為水門，各冠以樓。置吊橋，復置瞭望樓於山城，列窩鋪。永樂十五年，都指揮谷祥加修增築，置敵樓，塞水門。」（城池一）（引成化四明郡志）

品篤以為雙嶼波港即寧波，不知寧波距其地尚遠。遊記中所謂運河，似即指甬江而言。所記小河高山，或即寧波江姚江與其他通育王天童東錢湖等小河，高山必為四明山。

（8）品篤所記年代為一五四二年（嘉靖二十一年），與日本一鑑所記同，與天下郡國利病書及籌海圖編所說相去亦遠。但與明史朱紈傳所記，相去五六年。實則嘉靖二十一年討伐者乃張一厚，品篤誤為一事，並不足奇。此外史料尚有明史食貨志所稱「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紈訪知舶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皆以虛直轉鬻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餘艎，奏請鐫諭戒大姓，不報。」又明史世宗紀曰：「二十六年十二月乙亥，海寇犯寧波。浙江通志亦引肅皇外史曰：「嘉靖二十六年，巡按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視浙海道，從之。以朱紈巡撫浙江。紈至浙，知沿海大姓，皆利番舶勾連主藏，轉鬻番貨，牟利潤己，久不歸值，遂構難，有所殺傷，乃下令嚴申海禁，凡雙橋餘艎一切毀之。」

（4）被難人數，品篤謂有一萬二千，弇州史料稱舶客擁有徒衆萬人，其事非不可能，即有誇大，想亦距事實不遠。明史朱紈傳稱有倭人及佛郎機人。但食貨志與世宗紀祗

稱倭人，足見倭人人數必遠在佛郎機人數之上，否則，即不能概括一切。品篤謂彼時葡人數達八百，亦不為過甚。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廣東御史龐尚鵬有疏云：「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居住，不踰年，多至百數區，今殆千區以上。……今夷衆殆萬百人矣。」疏語雖往往過甚其詞，以聳發動觀聽但在數千之上，則必可信、（室有千區，苟以五人一區計之，即得五千人。）以此例彼，則相去總十餘年，必謂寧波不能有八百葡人，孰能置信？葡人同奉天主教，但當時來華葡人，幾全屬商人，傳教非其目的所在，品篤稱一萬二千人為基督教徒，實屬駭人聽聞，豈當時已有所謂掛名教徒耶？（見後）

（5）品篤所記焚燬情形，與漢文史料相去極遠。但朱紈所著甓餘雜集（卷二），記所燬房屋與船不多，原文曰：「在雙嶼焚燒盡滅賊所建之天妃宮十餘間，寮室二十餘間，及賊所遺棄之大小船二十七隻。」（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據報閩皆說稱「蕩平巢穴」，賊勢以前又猖獗異常，以理度之，房屋船隻，決不止區區此數，然隱匿少報之慣技，實官場卸責之唯一秘訣，無足異也，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上編第二章稱：「據平托（即品篤）述說：……在浪白滘即（本文所云）寧波為信仰而犧牲性命的一千二百名教友中，只有一百是葡萄牙人，在這城內有一處聖母無染原罪大堂，及六七處小堂，還有一處聖雅各伯小堂，在這城的別一盡頭。」又註曰：「有八位傳教司鐸。」裴氏云彼雖教友一千二百人，與沙勒昂夫人所云一萬二千人，適為十分之一，蓋二人所據之原

本不同也。但所云聖母堂，殆即雙嶼雜集所記被焚之天妃宮歟？夷人不祀天妃，朱紈以中國之神名之也。

（6）總觀漢文史料所記肇事原因，與品篤所記，尤極彷彿。故嘉靖間大批葡人在寧波雙嶼被屠之史實，無可疑也。

（附）品篤遊記出版後，不久即譯成多種文字，最早之法文本係一六二八年巴黎印行本譯。沙海昂夫人所據者係一八三〇年重印本，初版本現已不易覓得。葡文原本，其材料尤為豐富。

按姜先生（西溟）全集卷一湛園未定稿卷一有史志擬論四首，第四首為「一統志日本貢市入寇始末」，述浙人導西洋貢舶至雙嶼事，與籌海重編詞句多同。但據名山藏（卷二十七）及浙志便覽，則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倭寇又陷寧國，明宗憲督諸軍敗之。又云：「嘉靖三年（一五二四）歲凶，雙嶼貨壅，而日本貢使適至，海商遂販貨於倭 倩其兵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仍回私澳，東洋船偏布海岸，而向之商舶，悉變而為寇舶矣。……初，自宋素卿創亂之後，十八年（一五三九）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浙閩至二十二年（一五四三）許棟占據之雙嶼港，為朱紈所逐，其下王直改住烈港，併殺同賊陳思盼，柴德美等，遂至富強。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峯，徐惟學，徐光亮分領之，因而從附日眾，倭船偏海為患。」可知嘉靖初年

嶼原爲葡萄牙人勢力範圍，後恃倭其爲衛，而以貿易權交倭，至嘉靖十八年，則葡人後由金子老，李光頭等勾引，刼掠閩浙。是時，雙嶼已仍爲彼輩之巢據地也；至二十二年，雙嶼始平。

又按雙嶼在乾隆間猶爲英船停泊之所，亦足見其在浙江對外通商史上所佔之地位。史料旬刊第四期，乾隆二十四年嘆咭利通商案，第六一一三頁，浙江定海鎮總兵官羅英笏摺：「……茲於本年六月初一日，據臣標中營遊擊李□稟，據外巡外洋汛把總謝恩才稱：五月三十日巡至四礁洋面，望見夷人小船一隻揚帆而來，當率兵船飛追至雙嶼島拋泊，隨諭該船查驗，係夷人小船，船身長三丈，樑頭一丈四尺，夷商舵水手共十二名，內黑鬼一名，攜帶防護槍砲。據夷商洪任稱，係英吉利國船，五月間，由廣東空船出口，貨物銀錢俱在後面大船上，欲往　貿易。……據夷商洪任口稱，回廣東生意不好，意欲仍來浙江交易，故坐小船先來探信，其大船在後，今既不准在浙交易，自當回往廣東等語。」又閩浙總督楊廷璋奏（頁一一一六），據閏六月二十六日守備陳兆龍稱：「本年（按同上，即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申刻，在洋巡哨，瞭見大洋有船前來，隨駕兵船迎往，認係番船，即於雙岐港喝令拋碇，施放號砲，各汛千總把兵船陸續俱到，因問上番船查看，內祇番商洪任帶有黑鬼一名，番人十名，並隨身砲械，並無貨物，及內地人名。……」此云雙岐港，當即前摺之雙嶼島也。

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

明末天主教傳入我國後，急急以文字爲佈道之具。蓋當時東來教士，隸耶穌會。耶穌會素重學術傳教，而尤好與士大夫遊，於是書册尙焉。時西士寥寥可數，又復散佈各地，談吐更非盡人所解，偶有質疑問難者，苟可假助於圖書，則開卷有益，寧獨傳之久遠。且教外學子，往往以無書可閱，裹足不前，故當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之末，比利時教士金尼閣P. Nicolas Trigault 返抵羅馬後，除接洽教會事務外，並由教皇保祿五世頒賜大批書籍。萬歷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尼閣與其他教士二十二人返華，四十八年（一六二〇）七月二十二日人書俱抵澳門。（見Dehaisnes著法文金尼閣神父傳）蓋已三百四十餘年於茲矣。尼閣所著基督教遠征中國記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有謝教皇書，謂係教皇之鴻錫，洵爲教廷對於中國之永久紀念云。

此一部圖籍之歷史，西書記載不多，而漢文史料之有關此事者，余於數年來得十餘事，且有出諸反對教會人口者。但國人至今乃鮮知有其事，爰述顛末，以記此藝林一代之佳話。

余藏「辯學」鈔本記曰：「傅汎際，字體齋，與金尼閣四表，俱羅瑪大臣。先是，利瑪竇浮中華，晉見朝廷，賓延殊禮，其國君感甚，特命傅金二位，遠求盟好，除齎進上方物

外，猶有裝演圖書七千餘部，皆天人之學及曆法度數之書。道途開通，皆抵香山澳，帶進者尚未有什之一二。」按汎濟原名 P. Fr. Urtado，葡萄牙人，與尼閣同舟來華。二人皆天主教司鐸，稱「羅瑪大臣」，則以當時教皇亦兼國君也。惟「辯學」所云，皆本諸杭人京兆尹楊廷筠之代疑編，代疑編曰：「自西泰利先生用賓上國，歷朝廷生養死葬，其國主感恩圖報，特遣陪臣金尼閣遠來修貢，除方物外，有裝演圖書七千餘部，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書籍見頓香山澳，俟一朝得獻朝廷，當必發儀部及詞林，與西來諸儒翻譯雠訂，書義昭然，並編亦爲剩語矣。」代疑編作於天啓元年（一六二一），距七千部書運達澳門後一年也。漢文史料之有關七千部者，殆以此爲最早。曰「裝演圖書」，「演」爲「潢」之譌，蓋其書皆精釘本也。曰：「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見其選擇之精，不以淺近平庸之充數也。廷筠並計劃進呈御覽，思藉帝王之力，翻譯傳佈，志願不爲不宏。

天啓三年（一六二三），義大利教士艾儒略 D. J. Aleni，著「西學凡」一卷，刻於杭州，廷筠爲序其首，曰：「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具在可譯。此豈蔡愔玄奘諸人，近探印度各國，寂寥數簡，所可當之者乎？」時廷筠入教已十載，聞七千部東華，其喜可知。旋又撰代疑續編，其引啟一節，亦云：「西教不然，其學有次第，其入有深淺，始有文學，次有窮理之學，名曰費祿所斐亞，其書不知幾千百種也。舉之數年，成矣，又進而爲達天之學，名曰陡祿日亞，其書又不知幾千百種也。……上言二大

釋之書，雖不能全攜在身，緗帙已七千餘部，每部以單葉之紙夾印細字，在昔中國即一部又是數十部也。三才名理，法象精粗，何者不在典籍之中？孰能窮之以辯乎？」斐錄所費亞，今譯哲學，陡祿日亞，今譯神學然七十部非盡神學之書也，廷筠所謂「三才名理，法象精粗」，「辯學」鈔本所謂「天人之學及歷法度數之書」，蓋皆含括科學而言。但西書在當日最為國人所驚羨者，在其能兩面夾印，一部可抵我國數十部也。廷筠卒於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同年，七千部之第一部譯書「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在北京出版，七千部版本廷筠誠能及身目睹也。

廷筠而外，其同里工部郎中李之藻，亦時時稱述七千部。天啟三年（一六二三），之藻在杭州，刻艾儒略職方外紀六卷，並為之序曰：「金子者攜彼國書籍七千餘部，欲貢之闕廷，以參會東西聖賢之學術者也。」又曰：「德之府明」，奇蹤炳瑞，時則有異國異書，梯航九萬里而來，蓋蹟古已然，於今為烈。聖主崇文，館閣得廣致鴻英，分曹摘譯，以盡傾海嶽之奇乎？」之藻亦說明其書為教會之貢品，備大規模之翻譯，以溝通中西之文化也。

天啟五年（一六二五），之藻為葡教士陽瑪諾 P. E. Diaz (Junior) 所著唐景教碑頌正詮，作讀景教碑書後曰：「七千部梯航闕集，開局演譯，良定以增輝冊府，樹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迄今尚有所待。」可知其時七千部之翻譯工作，猶未開始。徐文定公集

有辯鄉人書，曰：「實義中（案利瑪竇之天主實義）所論理學，止舉大概，若欲盡解其義，宜用經書萬卷，今未得遍譯，他日必當大明，恐我與執事不及見耳。」此書疑亦作於七千部入華後也。乃不二年，巴特Bade大公國教士鄧玉函P. J. Terrenz即與涇陽王徵合譯「遠西奇器圖說」三卷，並由徵捐貲在北京刊印。徵著奇器圖說錄最曰：「奇器圖說乃遠西諸儒攜來彼中圖書，此其七千餘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既吾人所知，奇器圖說殆爲七千部中之最先譯述者。其書屬物理學，更可徵七千部不盡爲示教書也。玉函亦與尼閣同時來華者。

同年，李之藻譯寰宇詮，又作一度宣傳曰：「時則有利公瑪竇，浮槎九萬之程，既又有金公尼閣，載書踰萬部之富。乾坤闢其鑿融，光岳煥彼精英。將進闕廷，鼓吹聖教，文明之盛，蓋千古未有者。……」（見原書序）之藻蓋以尼閣運書之功，比之於瑪竇開教之業。而尼閣即以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杭州，葬在武林門外方井。國立北平圖書館有寰宇詮鈔本，末有題云：「明天啓五年初譯畢，崇禎元年中秋刻竣。」崇禎元年之七月十五日，王徵畏天愛人極論（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Chinois 六八六八號）亦有記曰：「亡何，復詣都門，及晤七克作者之龐子。……龐子爰爲予陳其梗概曰，吾西學從古以來，所闡發天命人心，凡切身心性命與天載聲臭至理者，不下七千餘部。」龐子者，西班牙教士龐迪我P. D. de Pantoja也。迪我於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卒於澳門，七克於萬曆四

十二年（一六一四）刊於北京，時七千部尚未入華。七千部之語必不出諸我之口，而爲傳私家所□也明甚。然亦可覘當時我國奉教學者對七千部之重視也。

崇禎三年（一六三○），李之藻卒，距七千部之入華適十載。彼前並彙刻當時已譯宗教及科學書二十種爲天學初函，有題辭曰：「又近歲西來七千卷，方在候旨。將來問當譯國，倘有待云。天不愛道，世不乏子雲夾際，鴻業方隆。所望好是懿德者，相與共臻厥成。」曰「近歲」，又曰「方在候旨」，似其時七千部尚在澳門。題辭有云：「時則有利瑪竇者，九萬里抱道來賓，重演斯義，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廣。」瑪竇來華在萬曆八年（一五八○），五十年前，正崇禎三年也。

及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李九功序勵修一鑑，曰：「聖化覲恰，西儒接踵來賓，其遠攜緗帙在千餘部，譯著百有餘種，而教中闡理記事諸書，已具大凡。」勵修一鑑爲九功自撰，其書現：通行本。九功有昆仲曰九標，嘗爲艾儒略口鐸日抄作序，閩人也。蓋當時凡天主教　跡所到之處，若晉，若秦，若蘇，若浙，若閩，若粵，已無不知有七千部矣。至所謂「譯著百有餘種」，則成於七千部入華之前者爲多。

入清以後，罕有述及七千部者。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福建巡撫佟國器，奉教宗室也，撰福州重建聖堂碑記，亦曰：「追明萬曆辛丑，泰西利氏，梯航九萬里，觀貢萬國全圖及西書七千餘部。同會鄧子，在京翻譯百有餘種，明正教，闡絕學，搢紳先生，咸爲

遺之。」（見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五附）其辭含糊不清，一若七千部爲利瑪竇所攜入者。蓋其時距七千部之入華已三十五年，偶有誤傳，亦所難免。至所謂翻譯百有餘種，則或仍上引李九功之說也。

七千部之東來，教人飛眉舞色，津津樂道，遂蓋教外之忌。黃貞請顏壯其先生闢天主教書，（見破邪集）曰：「天主教書，名目多端，艾氏說有七千餘部入中國。」艾氏即艾儒略，嘗傳教福建，故黃貞得聞其說，德清許大受著聖朝佐闢，（見同上）其自敍亦曰：「彼夷自宜言兩國天書有七千部。」蓋皆懷疑其誇大者。楊廷筠代疑編中即有一條專爲答辯此事，題曰：「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僞造條。」詞長不錄。萬部之說，或舉成數而言，然彼時除七千部外，全國西士個別帶入者，亦必有數千部，則萬部云之，要非過甚之詞。

清初以降，七千部即寂然無聞，世界學者亦莫知所終。民國二十七年，北平北天主堂（俗呼北堂）整理藏書樓，發現七千部殘餘數百冊，包括神學、哲學、數學、醫學、物理學及其他科學。其書皆一式裝訂，書面皮製，左右二上角，分鏤教皇保祿五世御璽及耶穌會徽章。其書原藏北平南天主堂（俗呼南堂），今盡歸北堂藏書樓。「辯學」鈔本謂「書存香山澳，帶進者尚未百什之一二，」可知其書係分批北運。有否全運，則不得而知。明末清初，國內擾攘不安，交通阻塞，倍於今日，則此鉅大書籍，豈尚不留於澳門，或返回西歐

書乎？否則，以七千部之多，而殘存僅數百册，殆不可信。

論曰：中外交通以來，古器物與古書籍之流出海外者，不可數計，實文化上重大損失。然同時外國文物亦不乏輸入者；苟能加以守護，則小得亦可償一部份之大失。清末，日人島田翰著「皕宋樓藏書源流考」，曰：「昔遵義黎純齋宜都楊惺吾，在日購求古本，都市為空，數窮必復，今之所獲，倍蓰於昔日所失，是為於國有光」云云。彼蓋謂皕宋樓之流入日本，謂可與黎楊二人搜去之書相抵也。抗戰前，余於嘉興修院得見十五世紀之西書；黔省號稱荒僻，而遵義天主堂近亦發現一六六九年里昂出版之拉丁文書。若合全國所存古西書計之，其數必有可觀，董理而珍藏之，是有望於來者。

近人論中國之宗教，每盛稱浮圖經藏，而於基督典籍之不可多得，則深致其嘆惜之意。孰知二百年前，以四五十載之短時期，入華天學圖書，竟踰萬部之富耶？使其時果能一一迻譯，則影響於我國文化，豈易言哉？我國天佛盛衰之故，雖非一端，歷史之短長，困厄之多寡，皆其大者，然譯事之成敗，實一重要關鍵。七千部之淹沒不彰，又不僅教會蒙受損失而已，我國科學之進步，亦為之延遲二三百年，此語或非過當。科學之重要，夫豈可等閑視之。繼往察來，國人當知所勉矣。此作者草斯文時所發之新嚮也。

明清之際中西血統之混合

我國與西歐之交通，至元代而大開，中外血統之混合，亦隨之發生。明初且有强迫通婚之令。明律集解卷六曰：「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爲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爲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爲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然民族血統之混合，由於宗教關係者，其事例較多。我國古代回教徒中，即不乏印歐族伊蘭典型之遺傳。元末陶宗儀輟耕錄謂杭州回教人「象鼻貓眼」，其一例也。天主教教規，教中人必須與同教人聯姻，否則，即爲無效。其因特殊情理，得主教之寬免，而與非基督教人或基督教別派人相嫁娶者，視爲例外，教會但爲之證明，而不舉行祝福儀式。歐人來華之初，商人多於教士。教士有絕色之戒，商人則往往有就地成家者。然因教規關係，此種結合，多限於教內，而初來西洋商人，亦以籍隸班葡天主教國者爲多。況以同教關係，結識較易，故天主教與我國「歐亞種」之產生，因緣頗深。誠能廣搜資料，詳其源流，亦我國民族學及人種學之一新門類也。顧國人舊時目外人爲夷狄，偶有婚媾，即爲鄉里不齒，宗譜中亦多削其名，欲於漢文典籍中求尋材料，洵非易事，故必須同時參考外人之記載，以爲印證。

又舊時中外婚配，以外國人娶中國女子者爲多。蓋早期來華經商之外僑，以航行艱

險，罕有攜妻室者，故多在澳門等埠落籍居家，而十七八世紀時，國人之赴西歐者，亦鮮歐人來我國者爲少。且我國舊俗，重男輕女，血統重在父方，故男子有民族自尊心，往往不屑與西婦爲室，若女子，則諺所謂「嫁夫隨夫」，苟非名門閨秀，嫁與外人，亦聽之而已。西商多富有，尤使爲父母者豔羨不已。本文首段所舉四人，皆據法文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俱爲馮承鈞節譯本所不載，亦足以稍補其闕略。近代優生學家，多謂混合種爲優秀人種，此寥寥數人，雖因獻身修道，並無後嗣，然伊等必非全無昆仲者，則四百年來，其傳衍如何，要亦值得專門學者之探索也。

（一）龐類思，字克巳，修士。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生於澳門。母澳門人，父葡萄牙人。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卒於杭州。（費賴之原書頁一九三）

（二）修士費藏裕，字爾歸，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生於澳門。父葡人， 母華人。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前去世。（同上頁一九四）

（三）修士巴爾篤（譯音）Barreto ，華姓氏不詳。蓋其時葡國享有保教權，雖中國修士司鐸，亦俱加葡名。父西班牙人，生於菲列濱。約在崇禎九年（一六三六）至順治二年（一六四六）間入耶穌會。曾到泉州，南京，杭州，廣州等地。（同上頁二九五）原書註明修士爲中國籍，故其母爲中國人，無可疑也。

（四）司鐸何天章，字起文，康熙六年（一六六七）生於澳門。母中國人，父歐洲人。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入耶穌會，閱五年晉司鐸，傳教河陝冀等省。並曾至東省附近，留間雍正帝所囚之蘇努宗室。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卒於北京。（同上頁四一〇）

以上四人，父為葡萄牙人者二，西班牙人者一，歐洲人不詳國籍者一。母盡中國人。出生地點，則澳門得其三，非列濱得其一，

又修士郭梅士（譯音）Gomes，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生，父馬來人，母中國人。曾到福州蘇州及南昌等地。順治元年（一六四四）清兵屠南昌，修士與其他教士二人，亦為所害。（同上頁一九七）附記於此。

惟我國天主教徒之中西婚姻，尚有早於此者。裴化行 P.H.Bernard 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曰：「在一五六三年（嘉靖四十六年）澳門至少有八位耶穌會士，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內中有九百葡國人，及許多本地的教民。……住居澳門的外商，因為葡國婦女的缺乏，又不滿意於馬拉甲或印度而來的婦女，於是便與日本的特別是與中國的婦女結婚，他們很羨慕中國婦女的優點。」（七編第五章一〇九——一一〇頁）（原註見義大利文利瑪竇全集及西班牙文印度塞維拉檔案館印度非列濱史料總目）澳門中西聯姻之歷史，幾有四世紀之久，可見教友之中白色血種，數必可觀。惟修士司鐸有記載可稽，教友則探究為難耳。

葡萄牙航海家品篤 F.M.Pinto 亦記曰：「余曾遇見葡人卡而佛 Vasco Calvo 偕其中國夫人與子女。伊等並爲余背誦「天主經」「聖母經」「信經」「又聖母經」。」(Schurhammer, Pinto. ch.95)

明史朱紈傳亦曰：「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人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此處所云通婚事，當兼指倭人與佛郎機諸國人而言。

至清初，則我國教友亦有娶西女爲室者。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澳門同知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記（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曰：「（上略）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係在澳進教；一係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爲夷。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略）周世廉番名唛哆囒咽嚧哋，又呼買鷄周，儼然爲夷船之主，出洋貿易，娶妻生子。（略）伊等挾有資本，久與夷人交關，一經追逐，猝難清理，其妻室子女，若令離異，似覺非情，若許攜歸，則以鬼女而入內地，轉恐其教易於傳染。應否分別辦理。（略）其娶有鬼女挾資貿易，及工匠兵役人等，穿唐衣者，勒令出教，穿番衣者，勒令易服出教，均俾鬼女身死之日，攜帶子女回籍。（下略）」讀此，可見當時國人心目中，對以娶歐洲女子爲大不然者，宜乎其材料之不易得也。然「鬼女」死後，子女仍可回籍，則血統仍可流

人。向達中西交通史第八章（一一四頁）謂十八世紀「又有一位姓黃的留居巴黎，娶法婦爲妻，竟死其地。」惜未知其詳耳。

此外，則亦有不法葡人，或出錢收買，或藉勢掠奪中國子女，此等被幼買之子女，雖多充賤役，然亦必有納爲妻妾者。澳門紀略（卷上）載海道俞安性之禁約五條，有一條爲「禁買人口」，謂「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占恡不法者，按名究追，仍治以罪。」萬曆四十一年，郭給諫（尙賓）疏稿（卷一）亦曰：「有拐掠城市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而光緒廣州府志（卷一二二）載胡平運奏疏稱：「……其一在澳夷住蠔鏡澳，凡番（禺）南（海）東（莞）順（德）新（會）皆可揚帆直抵。其船高大如屋，重編番銃，人莫敢近。所到之處，硝磺刃鐵，子女玉帛，公然搬運，沿海鄉村，被其殺掠，莫敢誰何。」其言或難免過實，然不能謂絕無其事也。故林豁元與翁見愚別駕書，雖力辯葡人（原文作佛郎機人）未嘗爲盜，但亦不能否認其收買子女。其言曰（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佛郎機雖無盜賊刼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爲無罪，然其罪未至於強盜。」郭尙賓萬曆四十二年疏（見同上）請「諭令今即先遣回倭奴黑叔，盡散所納亡命，亦不得潛匿老萬山中，似立一限，令夷人盡攜妻子離澳。」此所謂夷人之妻，其中必有收買掠奪而來者。稻葉君山著近代支那史，頁三三二記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對外商頒布九條禁例，第二條爲婦女不得攜入夷館，第四條爲外人不

僱用澳人婢僕。皆所以防微杜漸也。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中之中國會士，有標明其生於澳門，父母皆係華人者，如修士邱良厚良稟昆仲，（原書頁一二〇及一二三）與修士法利亞（譯音）Faria（頁一五〇）。亦有僅記其爲澳門產，而未明言其父母之原籍者。然以當時情形度之，則彼等血統中之含有歐洲人種成分，頗多可能。茲亦附記於後。

（一）游文輝，字含樸，澳門人，萬曆三年（一五七五）生，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卒於杭州。修士也。（費賴之原書頁一〇三）

（二）萊附修士Loieao華姓名不詳。萬曆十年（一五八二）生於澳門，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卒於韶關至澳門舟中，葬在廣州。（頁一〇三）

（三）石宏基，字厚齋，澳門人，工繪事。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生，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後卒。亦修士也。（頁一二三）

（四）費藏玉修士，字爾成，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生於澳門。約在十七世紀末，終於澳門。（頁二五六）

（五）修士高關雅（譯音）Co[illegible]，華姓名不詳。生於澳門。康熙二年至八年（一六六三——一六六九）在澳門求學。（頁三〇六）

（六）修士郭斯大（譯音）Costa 亦澳門人。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尚在澳門。除不詳。

（頁同上）

（七）鄭瑪諾司鐸，字維信，澳門人，崇禎八年（一六三五）生，曾留學羅馬。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回國，二年後卒於北平。（頁三八一）

（八）郭天寵司鐸，字若汗，（按應作翰字）澳門人。康熙七年（一六六八）生，雍正三年（一七二五）被逐，遂住暹羅。卒年不詳。（頁四五七）

（九）馮瑪諾修士，澳門人。擅音樂。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入會，曾居北平。（頁四五八）

（十）莫拉斯（譯音）司鐸 Moraes 澳門人，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時傳教湖廣。（頁七三一）

（十一）司鐸若瑟高蘭雅（譯音）J.Correa雍正七年（一七二九）生於澳門。乾隆廿年（一七五五）後去世。（頁八三五）

海國聞見錄曰：「呂宋原係土番，今爲是班牙（按卽西班牙）據轄，漢人娶本地番婦者，必入其教，禮天主堂，用油水畫十字於印堂，名曰澆水。」此亦菲列賓土著與漢人血統混合之關涉天主教者。但視聖婚配，僅灑聖水，並不用油。海國聞見錄出教外人手，偶有誤記，不足病也。惟以吾人度之，此等混合，當不以土著爲限。一則土著奉教者少，而西班牙人則幾盡屬教徒也。二則西班牙人必有不屑與土人結婚者，故除在同國人中發生

婚姻關係外，華僑必爲若輩擇偶之主要對象也。上述修士巴闌篤即生於非列賓而其父爲西班牙人者。明史呂宋傳謂：「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至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東西洋考（卷五）亦云：「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間有削髮長子孫者。」名山藏（王享記呂宋條）則曰：「間有削髮長子孫者。」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稱：「或娶婦長子孫者有之。」娶婦長子孫，不足爲奇，娶婦而削髮，則必有故。蓋削髮所以從西俗，足證所娶者亦必西婦。現在海外娶婦，欲覓同國人，恐亦非易事也。據美人調查，非列賓兩院議員中，華非合種者佔百分之七十五，而非人奉天主教者亦達百分之八十二，則其間中西僑民因信仰相同而發生血統之混合，因血統之混合而使信仰趨於同一之關係，必有可資吾人深切研究者，此文不過開端而已。乾嘉以降，海運大開，中西交婚，司空見慣，不復贅矣。

（附一）　清代官吏每好掩飾事實，以規避責任。清初中西血統之混合，已爲史實，但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廣東巡撫朱桂楨猶有冠冕堂皇之報告，曰：「夷婦生子，多雇澳乳媽服役，及向澳奸私買婢女一款。查夷人攜帶番婦子女來粵，船隻進口，多用三板小船載運家口寓居澳門西洋鬼樓；所用服役之人，多係西洋貧苦之人。其在澳門生子雇用乳媽，及服役婢女，亦均係大小西洋貧苦妻女，並無漢民受雇者；如果向澳奸私買，難保無控告之事；檢查案卷，並無呈控之案。」（見道光外交史料

譯本，頁四四至五〇各摺）

（附二） 淸廷嚴禁外人攜帶妻女入內地，於是遂有外人宿娼嫖妓之事發生，茲亦分記之。（惜因限於史料，故時間略有倒置）。國朝柔遠記，嘗道光八年（一八二九）粵洋行司事謝治安下獄事云：「先是，洋商在粵通市，定制不得攜帶家屬，自大班公司既設，出入自便。是秋，遂有大班挈一洋婦來粵城，時東裕洋行司事謝治安爲置肩輿出入，久之侈然自大，翻不許行中人乘輪入館。大吏聞之，立拏究治安，死獄中。大班輒架大礮洋館外，設兵自衞，大吏恐激變， 乃遣通事諭令撤兵礮，速遣洋婦回國。於是洋行具稟託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爲詞，請俟稍愈遣之。……」乾隆十四年澳門同知張汝霖議，有一條：「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准出澳，奉行已久，今多有匪夷藉打雀爲名，擅或驚擾鄉民，或調姦婦女云云。」（粵海關志卷二十八夷商三）史料旬刊第九期，乾隆二十四年嘆咭唎通商案（頁三〇七）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摺有云：「夷人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也。查歷來夷商到廣貿易，向係寓歇行商館內，原屬事有專責。以近來有等嗜利之徒，將所有房屋或設買已經歇業之行，雕欄畫檻，改造精工，招誘夷商投寓，圖得厚租，任聽漢奸出入夷館，勾引教誘，或縱番厮人等出外閒遊，酗酒行兇，嫖宿鹽婦，殊乖體制。……查夷船進口之後，向係收泊黃埔地方，每船夷梢多至百餘名或二百名不等，伊等種類各別，性多強悍，約束甚疏，每致生事行兇，

誘附近奸民蛋戶更或引誘酗酒姦淫，私買貨物，走漏稅餉，在在均須防範嚴密……」

（附三）

我國載籍中，頗有託述外人掠奪或誘拐中國女子者，但實則此等不法行為，中外皆不能免。粵海關志卷二十八夷商三有知縣張甄陶論澳門形勢狀，主張「搭造官店，貿與澳民」，謂有五利，第四利即「澳姦無因拐誘夷婦」也。

（附　）

乾隆年間，澳門已有夷娼。乾隆十四年澳門同知張汝霖議，有一條：「禁夷匿夷娼窩藏匪類……查出賣姦夷娼，勒令改業……窩留惡少之夷男娼婦，各照犯姦例治罪……」。（見粵海關志卷二十八夷商三）

伽利略與科學輸入我國之關係

——為紀念伽利略逝世三百年紀念作——

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為近代物理學之祖，世熟知之。然伽氏對科學東漸之關係，則國人已往雖偶有述及，亦略而不詳，間且有失實之處。今年為伽氏逝世後三百年，烽火瀰漫寰宇，然各國學術界對此偉大發明家仍有種種表示。國立浙江大學物理學會亦於今春舉行學術講演會，以為紀念，茲篇即余在會中之講辭。僻處荒服，史料闕略，未能盡量運用，此則余所深以為憾者也！

(一)伽利略與來華之耶穌會士

吾人知伽利略曾於一六〇三年與自然科學家Federico Cesi創立「靈采研究院」Academia dei Lincei，亦譯「山貓學會」，山貓目光遠銳，所以象徵科學研究也。研究院本隸屬教會，義大利統一後，會員半隨王室，半隨教廷，隨教廷者即由教宗庇護第九世加以改組，名「新靈采教廷研究院」Pontificia Academia dei Nouvi Lincei。研究院在昔頗著盛譽，惟自教廷失國後，無暇及此，工作遂形停頓，至一九三六年，始由前教宗庇護十一世再度改組為「教廷科學研究院」Pontificia Academia delle Scienza，網羅全球教內外科學大家，謀為人類作最大之貢獻。此次大戰前已有研究員七十餘人，前途未可限

豐。

明末清初，耶穌會教士在我國以治曆著稱者爲湯若望（P. J. A. Schall Uon Bell 一六二二年入華，一六六六年卒）羅雅谷（P. J. Rho 一六二四年入華，一六三八年卒）及鄧玉函（P. J. Terrenz 一六二一年入華，一六三〇年卒）等三人，而玉函即靈采研究院之第一屆研究員，亦有謂玉函爲創辦人之一者，伽利略之知友也。

玉函有中國字曰涵璞（奇器圖說王徵序作函璞）爲Bade大公國之Constance城人，一五七六年生，幼於伽利略十二歲，實明末入華耶穌會士中最稱淵博者。在語言方面，則精諳希伯來、加爾代、拉丁、希臘及德、法、英、葡等文字，在學術方面，則通曉數學，哲學、醫學、生物學及礦物學。劉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崇禎八年刻）謂「玉函嘗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將遍嘗而露取之，以驗成書，未成也。」

玉函入中國後即在嘉定及杭州學習漢語漢文，所著人身說概，即成於杭州李之藻家者。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明廷准徐光啓之薦，使玉函及龍華民（P. Longobardi ）主修曆事，光啓與李之藻及李天經輔之，並開始製造儀器。惜次年玉函即謝世，乃由湯若望羅雅谷繼其未竟之業。

明末入華教士灌輸各項科學，厥功甚偉，而修曆爲尤著。修曆教士中尤以玉函爲最早，顧以爲時甚暫，故其功績爲湯若望羅雅谷所掩。玉函少伽利略十二歲，北去世也，乃

見伽利略十二年，假使天假以年，其成功必不止此！

玉函漢文著述，除人身說概二卷外，更有奇器圖說三卷，大測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正球升度表一卷，黃赤道距度表一卷。奇器圖說爲玉函口授，王徵譯繪。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Pfister：Notices biog. et bibl. des anciens Jesuites en Chine，No46 稱其著渾蓋通憲圖說，按是書實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譯。玉函天文書，以關於測驗日月蝕者爲多，則以西士參預修曆之最大動機，卽因當時欽天監測驗日月蝕有差誤也。所著大測，測天約說，黃赤道距度表，皆其卒後一年由徐光啓進呈者。

玉函有致德國天文學家刻白爾Kepler函，刻白爾亦有復書，俱已久佚。（玉函傳參見馮承鈞譯費賴之著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玉函爲來華教士中伽利略之一熟友，余故樂爲稱述，不憚其詳。然二人既爲知交，亦有書翰往還乎？曰有。不獨玉函有，卽徐光啓亦曾由西洋教士介紹，與歐洲學術中心，如豐采研究院及蒙脫彼利愛大學（Montpellier）通聲氣。中西交通史研究者裴化行司鐸（P.H.Bernard）嘗爲余言如此。民國二十三年裴氏著「利瑪竇對中國之科學貢獻，」（原書法文，余案頭苦無其書，英譯本作 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to China，）書末結論，曾謂利瑪竇卒後，少數伽利略與刻白爾之耶穌會友朋，賴徐光啓與李之藻之合作，竟得在中國參預修曆事。所云伽利略之友，卽指玉函也。裴氏又有「伽利

略與「友係教之耶穌會士」一文，曾在「利瑪竇對中國之科學貢獻」一書內預告，謂約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發表於比國傳文科學問題雜誌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後聞方燬，吾人猶未得見此文也。

（三）天啓三年（一六二三）玉函致書歐洲，述中國修曆事。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刻白爾為發表於Sagani（見一八六八年Francofurti出版刻白爾全集第七冊六六七頁——六八三頁）名曰「鄧玉函神父自中國致歐洲天文學界書。」余未覩原書，但既謂「天文學界」，其若及伽利略似不能例外也。

（二）伽利略天文學說之傳入我國

近人談明清之際西洋科學輸入我國之史實，每好謂教士墨守亞利斯多得Aristoteles及托勒密Ptolomaeus舊說，而故意排斥伽利略，諱言其新發明。然吾人研究之結果，乃知論衡歷史，必須緊隨時代，苟以二十世紀之眼光，作十六世紀學術之批判，決無當者。伽氏之天文學說，在今日誠為不刊之論矣，顧當其並世之時，雖非教會之天文學者，亦反對者有之，懷疑者有之；而莫衷一是。則以科學之結論，必先經假定階段，方其初創時，則盡假定也；由假定而確定者有之；由假定而失敗者則尤多。假定之事理，何能強人以必從？

惟十七世紀來華之教士，對伽氏之學說，或作消極之評論，或作積極之介紹，不一而足，遂不一概抹殺，此則書貴細讀耳。

（1）關於地動之說，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第十五卷曆法總部五緯曆指一論：「問宗動天之行若何？曰：其說有二：或曰宗動天非日一周天，左旋於地內，繫諸天與俱西也。今在地面以上，見諸星左行，亦非星之本行，蓋星無晝夜一周之行，而地及氣火通為一球，自西徂東，日一周耳。如人行船，見岸樹等，不覺己行而覺岸行。地以上人見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是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以地之小周，免天上之大周也。然古今諸士，又以為實非正解，蓋地為諸天之心，心如樞軸，定是不動。且在船如見岸行，曷不許在岸者得見船行乎？其所取譬，仍非確證。」一文中前段所稱「或曰」，雖未指明，實即伽利略也。五緯曆指乃羅雅谷譔。羅氏之卒亦先伽氏四年，兩人之意見雖不一致，羅氏固未諱言新說。且伽氏學說，乃於其生前傳入中國，亦云速矣。

（2）關於木星等之衛星，古今圖書集成同上七十七卷曆法總部曆法西傳曰：「第谷沒後，望遠鏡出，天象微妙，盡著於是。有伽利勒阿於三十年前創有新圖，發千古星學之所未發，著書一部。自後名賢繼起，著作甚多，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亦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象，皆前此所未聞。且西旅每行至北極出地八十度，即冬季為一夜。又嘗周行大地，至南極出地四十餘度，即南極星盡見，所以星圖記載獨全。」按伽利勒阿即今譯伽利略。伽氏發表天文學之新見解，著「星宿使者」一書，述木星之有四衛星等，乃在一六一〇年，此云「三十年前」，則當為一六四〇年，伽氏固猶在塵寰。孰謂

穆士抹殺伽氏學說耶？而僅補儀書內之星圖，亦必為根據伽氏之兩說所成者。

（3）關於天河之說：又七十七卷新法曆書曆指卷三，恆星之三論：「問天漢何物也？曰：古人以天漢非星，不置諸列宿天之上也。意其光與映日之輕雲相類，謂在空中月天之下，為恆清氣而已。今則不然，遠鏡既出，用以仰窺，明見為無數小星。」此又伽利略所發明者。湯若望亦嘗言之。同上七十九卷新法表異「天漢破疑」條曰：「天漢斜絡天體，與天異色，昔稱雲漢，疑為白氣者非也。新法測以遠鏡，始知是無算小星攢聚成形，即積尸氣等亦然，足破從前謬解。」按伽利略之發明小星構成銀河在一六一〇年，自經湯若望等介紹後，至一六四三年（崇禎十六年癸未）國人方以智撰物理小識，卷二亦有天漢二條，曰：「以遠鏡細測天漢皆細星，如郎位鬼尸之類。」時去伽氏之謝世纔一年耳。

（三）伽利略物理學說之傳入我國

伽氏在物理學上之發明，本易屈指計。然凡為其知友鄧玉函在中國所及聞者，幾無不採入於奇器圖說，謂奇器圖說為當時世界最新之物理學書，非過譽也。其書作於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去伽氏之卒僅有十五年。茲亦分述之：

1. 伽氏所發明之槓杆，滑車，螺旋及其用法，俱見奇器圖說。又有「螺絲轉曲」，「螺絲轉鐵錯」諸說，詳見原書，茲不備錄。

2. 伽氏發明之空氣溫度計，見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第九十二卷儀象部第一百〇

入父一百)九圖。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教士張誠Gerbillon 第三次隨駕赴滿洲，記曰：「某晚，予居養心殿，帝臨殿內，問余寒暑表及風雨表之用法，蓋洪若神父J.de Fonteney 在南京所進呈者，帝狀極親切。」見 du Halde著Description de la Chine,Paris,1735,T.IV,P.341 此殆爲最早傳入宮廷之寒暑表及風雨表。正教奉褒第二冊(九十六頁)亦有記曰：「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亭午，畢嘉洪若赴行宮(按在南京)謝恩，隨帶方物十二種，趙侍衞捧入奏獻。……畢嘉洪若謝恩訖。趙侍衞又云：這二架驗氣管，萬歲要收下，奈途次難帶，先生可覓妥便，送至京師。」又(一〇二頁)「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畢嘉送儀器抵京。先是，上年二月中，聖駕駐蹕金陵時，畢嘉洪若進驗氣管等儀器，奉旨着便送京師。至是，畢嘉躬送至都。」此二架驗氣管，蓋即次年康熙帝在養心殿問張誠使用之法者。畢嘉西名Gabiani。王大海海島逸誌名曰察天筒，謂「以玻璃筒二，式如笙管，長一尺餘，內實水銀，置之匣中，旁書和蘭字。其水銀自能升降，大約晴明則水銀下沉，陰晦則水銀上浮，然浮沉有高低，觀其旁字，以察風雨晦暝，未常不驗。」

3. 伽氏改良之望遠鏡，成於一六〇九年，即萬曆三十八年。閱五年，望遠鏡之應用，即由陽瑪諾P.Emmanuel Diaz 所著天問略，介紹於國人。(詳拙作望遠鏡傳入中國考。)

4. 比例規亦伽氏所發明，羅雅谷著有比例規解。規爲規矩之簡稱。余曾見清初刻本，羅氏自序頁之騎縫亦稱比例尺。序作於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正伽氏卒前十二年也。原書附有比例各線總圖兩幅，南京府文物刻，工頗精緻。奇器圖說亦有介紹，稱爲「規矩」，有所謂「兩足規矩」，「三足規矩」，「兩螺絲轉關活尺規矩」，「單螺絲轉關活動曲尺規矩」，「畫鉛錢規矩」，「畫紙規矩」，「作雞蛋形規矩」，「作螺絲轉形規矩」，「移遠實近規矩」，「畫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規矩等。」則指一切繪圖器矣。澳門紀略卷下澳蕃篇謂「有器曰規矩，中藏器備鍊削，裹以小革囊，可以佩。」則又以規矩稱規矩盒或儀器盒矣。文獻叢編第六輯記雍正二年六月初六日年羹堯具謝賜羊角鼻烟壺摺，摺末有硃批云：「今有新進三種小規矩，甚如意，寄賜與卿，以爲玩具。」中國皇帝以比例規尺爲玩具，伽利略地下有知，當有啼笑不得之感！

由上言之，伽氏之學說及發明，固久由耶穌會士傳入我國，且傳入時期多在伽氏未卒之前。輸入之速，至可驚人。惟物理方面之發明，因有實驗可憑，易於解悟，故介紹者，並不參加私見，若天文學說，則當時儀器未備，證實爲難，故伽氏生時，歐洲天文界呈極紊亂之現象，而伽氏本人亦嘗反對刻白爾之學說，以是教士介紹伽氏天文學說，方式亦不盡一，或作消極之批評，或作積極之贊同，但創作消極批評時，亦未嘗有武斷之態度。如五緯曆指所稱：「宗動天之說有二；或曰……然古今諸士，又以爲實非正解……云云，」

（見前）對於新說亦盡量說明，初未嘗諱言也。又如湯若望之解釋天漢，亦大膽曰：「足破從前謬解」。而五緯曆指更力言新發明儀器與實測之必要，曰：「自古以來，測候所繇，追天爲本，必所造之法，與密測所得，略無舛爽，乃爲正法，苟爲不然，安得泥古而違天乎？以學理論之，大概古測稍粗，又以自所見爲準，則更粗，今測較古其精十倍，又用鏡爲準，其精百倍，是以舍古從今，良非自作聰明，妄違迪哲。」孰謂教士泥古耶？世人習聞伽利略與教會之齟齬，雖然，此一面之詞也，一面之詞焉足信耶？中國遠離歐洲，苟無歐西教士之介紹，則當時中國人決不能聞知歐洲最新之學說，故教士如蓄意諱言伽利略之學說，則置之不譏可也。即如利瑪竇輩之東來，雖在新教成立以後，而利瑪竇諸人撰著之書內，無片字隻句涉及新教。則耶穌會士對伽利略之學說，則無論爲合於己者，不合於己者，莫不盡量言之。在中國本可以祕而不言，猶言之詳且盡，況在歐洲乎？地動之說，本始於弗勞恩倍Frauenberg之哥白尼神父Copernic，當時反對者甚衆，爲天主教學者起而擁護，西班牙之撒爾曼加Salamanca大學，尤表歡迎，近於狂熱。至十七世紀初，則巴黎大學教授方濟各會會士伽森地Gassendi，亦以之介紹於法國。熊倍爾Schonberg紅衣主教，以哥氏無力刊印所撰書籍，則亦爲之任剞劂之費，以玉成其發明。一五四三年刊印之哥氏拉丁文「天體運行論」一書，亦由教皇保祿第三世，出力辯護。蓋天主教學者之擁護哥氏學說，先後凡歷半世紀云。至一六一二年，歐洲一部份天文學家始有起而攻擊哥氏之

說者。次年，伽利略乃以義大利文著「太陽黑點忠及其證明」一書，為之辯護。時教皇保祿五世與伽氏至交，教中名流恭地 Conti，鮑洛梅 Borromeo，愛爾孟脫 Fr. d'Elmonte，倍拉爾明 Bellarmin 及巴倍利尼 Barberini 孔紅衣主教（巴倍利尼後亦任教皇，為烏爾朋八世）與利瑪竇之師「丁先生」（利氏在幾何原本內所稱）Clavice，及天文學家格林倍格司鐸 P. Grienberger 等，亦俱係伽氏之摯友，對伽氏之發明，無不熱心贊助。惟伽氏不圖諒當時民衆科學程度之低，及義大利國民對異說之恐懼心理，當檢察院 Inquisition 宣佈伽氏無罪後，伽氏更要求治反對者以罪，是無異強人信從其學說，在當時科學尚謂未備之際，抑亦多矣。況天文專門之學也，聖經亦專門之學也，非於本學研究有素者，豈易談哉？伽氏之不為民衆所諒者以此。伽氏所著天文略論 Il Saggiatore（一六二三年刊）本為教皇烏爾朋八世所喜朗誦之書，乃其後所作對話集，竟偽造審許，擅自出版，書中對教皇譏諷備至。夫凡百團體，皆有綱紀，不守綱紀，例有懲處。而對國祖不敬，則尤為不容，國如此，家如此，教亦如此。然伽氏旋即悔悟，世謂伽氏受刑下獄，實則受刑乃莫須有之事，下獄則不滿一日。若跪地求恕，則教中常習之儀也。未審前，伽氏居 Nicolini 大使館，定讞後，居篤斯加公爵 Due Toscane 府邸，後又赴他處旅行，最後乃返歸故鄉休養，固極受優待者，方其於一六四二年一月八日謝世也，並領受教皇臨終祝福。孰謂伽氏不服於其教耶？君子之過猶日月之食也，方其食也，人共見之，及其過也，人亦共見之。伽氏

有指。伽氏為近代科學之明星，光芒萬丈，其個性或有過強之處，然其在科學上之成就，乃適由於其毅力之堅強，完人固不易求也。吾人絕不宜苛責，但對團體之行動，亦不應奚加指摘。古伽氏之發明物體下墜新定律時，同僚多加譏笑，逼其脫離比撒Pisa大學，且控之於官，誣爲妖言惑衆，及伽氏發現木星衛星，則又謂其神經錯亂，不意中國之耶穌會士，乃對於伽氏之發現，且盛加宣傳。學術貴發明，宜也，然亦不宜妄從，不宜輕信。培根爲實驗科學之祖，馬丁路德爲新教之祖，俱反對哥白尼地動之說者，然世之言之者少。赫胥黎非公教之科學家也，對教會之處置伽利略一案，則認爲非常適當，世之言之者亦少。余以今年爲伽氏逝世三百年紀念，故樂爲敍述其與近代科學輸入我國之關係，以貢之我國之科學研究者，並爲附述伽氏治學經過之崖略，儻亦讀者所樂聞歟？

望遠鏡傳入中國考

——伽利略逝世三百年紀念文之一——

明信州鄭仲夔撰耳新八卷，七卷記曰：「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眡天上星體，皆極大；以視月，其大不可紀；以眡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見；又能點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按瑪竇（P. Mat. Ricci）卒於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距荷蘭眼鏡商之子發現凹凸鏡可以瞭遠僅十年，距望遠鏡之正式發明僅四年，而伽利略在威尼斯製成之第一架天文望遠鏡，則在瑪竇卒前一年，故謂瑪竇何況望遠鏡，殊不可信。

望遠鏡未傳入中國前，其發明之經過已介紹於中國。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陽瑪諾（P. Emmanuel Diaz）著天問略曰：「近世西洋精於曆法一名士，務測日月星辰奧理，而哀其目力尫羸，則造創一巧器以助之。持此器觀六十里遠一尺大之物，明視之，無異在目前也。持之觀月，則千倍大於常觀……。待此器至中國之日，而後詳言其妙用也。」

讀此，則知瑪竇卒後五年，望遠鏡猶未入中國。蓋當時人極崇拜利瑪竇，故凡聞一異說，見一奇器，必以為瑪竇所創，耳新所載，僅一例也。而所謂「近世西洋精於曆法一名士」

者，伽伽利略也。其後羅雅谷 P. J. Rho 撰五緯曆指，新星解第八曰「近年西土有度數名家造有窺筩遠鏡，能視遠如近，視小如大，其理甚微，其用甚大，具有本論。」所謂度數名家，當亦皆伽利略也。

然則第一座望遠鏡果於何時入中國耶？曰：在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前。湯若望 P. J. A. Schall von Bell 遠鏡說自序，作於此時。若望以天啓中入中國，第一架望遠鏡殆即彼所攜入，而著書介紹於國人者。次年，王徵所著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凡例內所引參攷書目，已有「望遠鏡說」。是見其書一出，即爲國人所樂誦也。

當時之望遠鏡製造如何？用法如何？效力如何？遠鏡說記曰：「以玻璃製，其平非平之圓鏡，曰筩口鏡，亦曰中高鏡，或曰前鏡。置於筩口；又以小窪鏡，亦曰靠眼鏡，或曰中窪鏡，後鏡，置於筩後，二鏡之長短比例相合，即可視物。鏡爲兩面，但筩可隨意增加，筩筩相套，可以伸縮。又以螺絲釘釘住，即可上下左右。但視鏡止用一目，而以視二百步外之物爲例：遠達六十里。可以觀月、觀金星、觀太陽、木星、土星、及宿天諸星。視太陽及金星時，則加青綠鏡，或置白紙於下觀太陽。此外，則可用以航海，用以在暗室畫圖，而尤可用於戰事。以上皆節錄原書。關於望遠鏡在戰事上之用途，爲今日極需要者，而我國至今猶感缺乏，豈意三百餘年前即已傳入

中土耶？故不憚煩瑣，錄其原文曰：「若能遇兵革之變，無論白日，即深夜皆彼穴光用之，則遠近敵營悉覩人馬，器械輜重，便知其備不備，而我得預為防，宜戰宜守，或宜安放銃砲，功莫大焉。」

遠鏡說出版後三年，徐光啓即奏造望遠鏡三座。（增訂徐文定公集卷四，崇禎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修改曆法修正歲差疏，條用儀象若干事曰：「裝修測候七政交食遠鏡三架，用銅鐵木料。」報可，同年九月開曆局。蓋當時邊事頗急，光啓欲用以禦侮也。然光啓不僅主張共用，且主張自製。製成與否，固不易確言，但其識力之卓越，實不可及！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正月初二日所上疏，亦言及大銃與遠鏡之關係，並主張保守秘密，「未可易學，亦不宜使人人能之。」（增訂徐文定公集卷三）

徐光啓奏造遠鏡後二年，即崇禎四年（一六三一），遠鏡即由教士盧安德 P. Andr. Rudomina 傳入福建三山（口鐸日抄卷二）；次年由艾儒略 P. J. Aleni 攜至桃源，（同上卷三）；又次年乃流入漳州（同上卷四）。

同時，望遠鏡並傳至朝鮮。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二十四曰：「崇禎四年七月甲申，陳奏使鄭斗源回自帝京，獻千里鏡、西砲、自鳴鐘、焰硝花、紫木花等物。其千里鏡者能窺測天文，覘敵於百里外云。……西洋人陸若漢者，來中國贈斗源者也。」按朝鮮遣慰使鄭斗源等三十九人，乃於崇禎三年十月，由登萊巡撫孫元化伴送至京。時陸若漢 P.

J. Rodrigues 佐元化幕，故得以千里鏡等貽朝鮮使節。（參見崇禎長編卷三十九崇禎三年十月辛酉條。又仁祖大王實錄卷二十三，崇禎三年七月己卯條。）

崇禎四五年之間，鄞人朱宗元著答客問，中有一段辨華夷之別曰：「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是望遠鏡或望遠鏡之名已傳入浙中也。

稍後，中國且利用遠鏡以結隊觀測月食矣。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八月十六夜月食，陰晴難料。先期督修曆法李天經題奏差官齎器，分赴山海關登州，會同撫臣測驗。山海關差鄭明著朱光大往，登州差陳于階及朱國壽往。時望遠鏡既已傳入中國，則所謂「器具」者，望遠鏡必為其中之一。況登州即係元化與陸若漢所在地，遠鏡更所素備。故登州之行，雖不能無宗教關係，蓋元化與于階皆係教友，若漢則司鐸，然以觀測月食，需借助於望遠鏡，或為更大之原因也。（見陳垣近著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是年日晷、星晷、窺筩（即望遠鏡）俱已製竣，湯若望奏聞，上命太監盧維寧魏國徵至曆局試驗。後又命若望親齎進呈，督工築臺，陳設宮廷。上亦步臨觀看，頗為嘉獎。（見正教奉褒第一冊十六頁及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〇頁上）

至西曆一六三八年，則望遠鏡亦傳入日本，時當日本寬永十五年。木宮泰彥著中日交通史引長崎志與長崎集曰：「自寬永十五年（一六三八）以來，在長崎港西南野母崎之日

上設遠見番所（望遠鏡棚），置遠見番（望遠役），備遠望鏡，使常注視海上，見有異國船進長崎，立即在報事處上，高懸「異國報告船」黑字大旗，迅速報告奉行所。」余以為日本之望遠鏡亦由我國傳去，蓋寬永十二年後，日本對我國之貿易，已限制於長崎一港，而遠見番所則正設立於長崎也。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一六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畢方濟 P. Fr. Sambiasi 上疏，奏陳明曆、探礦、通商、購銃四事，並進星珍奇，除星屏、輿屏、西琴、風簧、自鳴鐘、火鏡、滴香、沙漏、白鸚鵡而外，且有「千里鏡一具」。（見正教奉褒第一冊十七頁）

順治元年（一六四三）清人入京，湯若望又以渾天、星球、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及輿地屏圖進於廷，請以西法治曆，得安居京中。（見東華錄順治朝第二卷，正教奉褒第一冊二十三頁及吳自在鑫筆記）

「聖教入川記」載張獻忠在成都擄獲利類思 P. L. Buglio 安文思 P. G. de Magalhaens 二神父後，即命以紅銅製天球儀。每有所舉，必偽稱奉天之命。每仰觀上天，以千里鏡眺望，百官亦莫不視為至寶，放誕不經之說，乃紛繁而起。（節錄原書）則清初望遠鏡且已遠至西川，亦云速矣。

明末清初，遠鏡在中國，已非罕見之物。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之二，天類條曰：「以

遠鏡細測天漢中細星，如郎位鬼尸之類。」又通雅三十四器用：「今西洋有千里鏡，將玻璃爲之，以長筒窺之，可見數十里。又製小者于扇角，近視者可使之遠。」以智蓋說望遠鏡與顯微鏡爲一也。按彭貽孫客舍偶聞記丙東范潞公之言曰：「洋人有一扇墜，範銅爲之，長一寸有奇，闢之出一鑑，如大錢，文不可辨，以顯微鏡視之，則謂天黃赤道里度，纖悉必具。」可知以智所說有誤也。通雅三十五曰：「神機鎗有伏狼機，大將軍，百子諸製，後得紅夷砲，稱爲神器，可發二十里遠，西洋以銳尺量之，測遠度之，發無不中，惜今未有盡其用者。」所謂測遠，不用望遠鏡而何？

正教奉褒（第二冊，十七頁）記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二月二十日禮部題爲洪若 P. J. de Fontaney 等五人攜帶渾天器，象限器，千里鏡，量天器，天文書籍等物，應將洪若等交與欽天監，問明果否通曉曆法。本日奉旨，此等物件，即令與伊等使用云云。

五人之精於天文學，日人後藤末雄氏譯言之。曰：「路易十四容納其首相郭爾伯 Colbert 之主張，凡遣派耶穌會教士至中國，必先諮詢於耶穌會長老坎斯氏 P. de la Chaise 與天文台台長加西尼氏 Cassini 赴中國之教士務必兼具宗教的修養，與科學的造詣，二者缺一不可。於是乃任命算學教授路易葛爾氏與耶穌會教士洪若爲中國傳道團團長。依據上述標準，選派團員，人數既定，法王又以特旨，使之加入國家科學會爲會員，授以觀察望遠鏡及使用其他精細器械之術。」又曰：「……其後康熙帝又從兩教士（按指白晉

P. Bouvet 及張誠 P. Gerbillon）習靜力學，尤喜天文學。欲觀察天文現象，頗渴望購鏡之所謂 遠鏡。兩教士乃函致分赴各省傳教之洪若等三人，令所攜之天文觀察機，寄送來京，以備帝用。」（康熙大帝與路易十四，載日本史學雜誌四十二編第三號周景濂譯人文月刊第七卷第五期）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松江教士潘國良（名瑪諾）P. Em. Laurifice 至杭州接駕，後又隨御艦同行至蘇州。十九日乃在蘇州「齎方物六種趨獻，侍衛進奏，傳旨大西洋人，不比別人，收進。上覽畢，收小千里鏡，照面鏡，玻璃瓶二枚。侍衛引國良行九叩首禮，謝恩而出。」（正教奉褒第二冊九十四頁）是時，去望遠鏡之發明已八九十年，必已大加改良，此所謂「小千里鏡」，必相當精巧也。

當時，望遠鏡雖已為進上方物之一，然因教士挾以遍行國內，民間亦當有得之者，於是亦早見諸文人說部及記述矣。耳所載即其一例。趙翼簷曝雜記卷二有西洋千里鏡及樂器條曰：「堂之旁有觀星台，列架以貯千里鏡，鏡以木為筩，長七八尺，中空而嵌以玻璃，有一層者，兩層者，三層者。余嘗登其臺，以鏡視天，赤日中亦見星斗，視城外則玉泉山寶塔近在咫尺間，磚縫亦歷歷可數，而玻璃之單層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兩層者悉倒，三層者則又正矣。」此文描寫甚詳，讀之如身臨其境。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亦記曰：「有千里鏡，可見數十里外。」書末附「澳譯」一篇，有千里鏡之「西洋話」，譯音曰「諫尼

[illegible]」，與義大利文 Cannegia 之音極似，但澳門紀略所據者似當爲葡萄牙文也。

王大海海島逸誌言記千里鏡曰：「千里鏡能觀遠景者，無足稱奇。有折曲管者，能觀其室之偏隅，房中幽隱之處，無不遍及。其佳者每管價值數千金。用以禦敵，可望敵營中，能週知其虛實，女牆衣壁，人數多寡，洞見底裏，誠鬼工之奇技也。」海島逸誌著於乾隆五十八年間，望遠鏡值數千金一具，亦云價昂矣。（乾隆五十九年，英國尚貢有「千里鏡二枚」，見粵海關志卷二十二，貢船二）

邵大緯薄海番域錄古甚二曰：「香山澳（按即澳門）……有千里鏡，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舟船檣桅，可睹三十里外。」按最初傳入我國之望遠鏡已可眺六十里外，薄海番域錄著於道光元年，其眺遠限度，必大有進步，「三十里外」一語，當有錯誤也。

達衷集卷上福州事情有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三月英商胡夏米上閩浙總督稟，謂「此英國船所帶進口係西洋布、羽紗、大呢、綿花、時辰表、千里鏡貨等，雖然極妙樣，却價錢更低，[illegible]者可得利。」可見其時千里鏡已可在市肆中購得。

時國人且已撰文闡說望遠鏡之學理而不徒誇其新奇怪巧。歙縣鄭復光作遠鏡說，略例亦引曰：「湯若望遠鏡說，用一凹一凸，頗用其理，而作法不詳。今洋製多用純凹，因悟[illegible]得其法，今說其略焉。」其正文曰：「遠鏡創於西洋，（原注見疇人傳）言其理者，湯若望遠鏡說；言其妙者，一見於陽瑪諾天問略，一見於南懷仁儀象志，一見

於轍進賢星鏡。（中略）一種純用凸　，外用一淺凸，內用微深凸，合爲一筩，筩從三面鏡起，至六面止，而優劣不與焉。洋製佳者多如此，爲後出一種，而諸書皆未及，惟皇朝禮器圖有之。」復光此文附見海國圖志卷九十五，蓋道前所作也。

復光所著有鏡鏡詅癡五卷，鄭移叢收入。其書專述各種鏡類，而首之以說理，曰：原色、原光、原景、原線、原目；其次則原鏡，鏡資、鏡質、鏡色、鏡形；又其次則論圓理，圓凸、圓凹、圓疊、圓率；然後乃分論眼鏡，顯微鏡（指老花眼鏡也），火鏡、取景鏡、放字鏡、諸葛鐙鏡、三稜鏡、多寶鏡、萬花鏡、測高遠儀鏡、視日鏡、測日食窺筩鏡，最後乃及「遠鏡」。遠鏡後之火輪圖說，則附言也。

鏡鏡詅癡包含甚廣，有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張穆題詞，謂「乙未冬，初晤浣香於銀溝客館，從之學算，問鐙溫溜，無夕或間。一日，夜深月上，出自製遠鏡，相與窺月中嵌黑點，四散作浮萍狀，□懽呼叫絕。」浣香復光字也。據此，則復光固亦能自製遠鏡者。乙未爲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距今百有餘年矣。因中英雅片戰事之役，復光仍未能一用其技。題詞又曰：「丑寅之交，海疆鴟張，或頗詑其善以遠鏡立船桅上，測內地虛實，惜未能出一技與之敵者。穆因從臾當事，延浣香幕中，以所錄副本（即指鏡鏡詅癡）爲券，當事既不甚措意，未幾，撫局大定，議亦遂寢。」蓋即指此。又曰：「浣香雅善製器，而測天之儀，脈水之車，尤切民用。」足見復光實百年前吾國一奇才也。據復光自

序，鏡鏡詅癡「適十余然後成稿」，亦可見其審慎也。其書分遠鏡為觀象遠鏡，窺筩遠鏡及遊覽遠鏡等三種。又記曰：「皇朝禮器圖儀上窺表，有施遠鏡者，其作法不詳。梅餘蔦先生曾以家藏遠鏡一具見示，中有鐵絲十字，下託一銅球，疑為儀器事件。近見西洋堂肇出儀器，大小兩具，各安一筩，誠如所疑，故名窺筩鏡，取其專長名之也。」則復光固亦與西人有往還也。

但其後又有張福僖者譯「光論」一小冊，入靈鶼閣叢書。自敍云：「明天啓間西人湯若望著遠鏡說一卷，語焉不詳。近歙人鄭浣香先生汶光著鏡鏡詅癡五卷，析理精妙，啓發後人，顧亦有未為盡善者。……咸豐癸丑艾君約瑟聘予在滬譯天算格致諸書，光論此其一種也。」汶光即復光也。

望遠鏡既為人所好，於是亦入於吟咏；澳門紀略上卷形勢篇有釋今種作澳門詩曰：「窺船千里鏡，定路一盤針。」吳漁山（歷）以名畫家入教修道，詩亦清絕，所著墨井集，舊僅有傳抄本，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上海聖教雜誌輯「吳漁山晉鐸紀念專刊」，乃為發表，有「試觀千里鏡」一首，曰：「自分潛修不出廬，窗前草色任秋蕪，未忘故舊黃花處，此鏡懸看得也無？」

太平天國提倡科學，注重物質建設，「千里鏡」與「火船、火車、鐘錶、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量天尺、連環鎗、天球、地球」等同列為「中寶」（上寶為宗

教，（宣讀乃後有詩註）（見洪仁玕選譯王重民校錄太平天國九年儒貢改新詩，載逸經第十七期）

劉成禺記「利瑪竇入九十八年聞見口授錄」（逸經第三十一期）曰：「光緒初元，予領徐家滙天文台。當時以遠鏡測天文，長不過尺餘，今日儀器購入，中外學問，無能求進步否耳。」

望遠鏡之流入中土，已三百餘年於茲矣。顧此次抗戰中，軍中猶時感缺之，革新文時，蓋不知幾番擲筆長嘆也。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

十餘年前，余始讀徐霞客先生遊記，即疑其或曾沐受西洋近代文明之薰陶。蓋霞客生當歐洲科學初入中國之際，晚徐光啓二十四年而生，去李之藻之生亦僅二十一年；其逝世也，在光啓後八年，之藻後十二年，實皆同時人也。及民國二十二年，徐文定公光啓逝世三百年，吾友天津工商學院教授法人裴化行司鐸 P. Henri Bernard, S.J. 撰「現代中國文化之前驅徐光啓」一文，趙石經譯，發表於上海聖教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有云：「然其（按指徐光啓）與同時士大夫，往來周旋之情跡，時人殊多不曉；惟地理家 P. Martini 在其地理書上，註明中國學術發明之日期，而亦不及其詳細情形。近來新文化運動家丁文江先生，復詳論足令人敬仰之一大人物，名徐霞客者，一五八六年生於江陰，卒於一六四一年，為中國有名之探險家。特其畢生所遊，足跡徧江蘇、浙江、福建，似與徐公暨耶穌會傳教士有所接觸，其遊歷之宗旨，實欲為中國打倒人所崇拜五嶽垂山之重大迷信。P. Martini 曾依據其日記，以編纂其有名地圖，則此徐霞客之履歷，殊有討論之價值。（不幸一六四四年之慘劇，遂為學術界一帷幕，而今日之智識界，只記得明祚末運，所受滿清人殘酷之痛史而已。）」

裴司鐸此文中，可資研究者有二：一為霞客與當時耶穌會士之接觸，一為 P. Mar-

tini 依據旅客遊記而編纂地圖。裴氏對前者未作肯定語，而於後者則言之鑿鑿。試先言後者。

（一）旅客遊記與衛匡國中國新圖志

P.Martinus Martini S.J.，漢姓衛，名匡國，字濟泰。義大利人。生於一六一四年（萬曆四十二年），殷[illegible]逝世後二年入中國，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卒於杭州，葬在武林門外老東嶽附近之大方井。費賴之 P.Pfister S.J.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有衛氏專傳。近人馮承鈞節譯本，無衛傳，蓋原書所收凡四百八十四人，馮譯則總五十八人耳。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匡國被派赴羅馬報告傳教事宜，乃自福建航海至菲列賓，乘荷蘭船至歐洲，繞過愛爾蘭北部，經英國而抵挪威，復遍遊德比二國。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在阿姆斯特丹印行「中國新圖志」，拉丁原名作 Novus atlas Sinensis。原書余未寓目，據費賴之所記，其書為圖十七巨幅，為文一百七十一頁。收中國全圖一，各省分圖十五，附日本圖一。又序言二十六頁，略述遼東情形及各省疆域、人口、田賦、民情、特產、植物、古蹟名、工藝、珍奇、山河、古蹟等。為當時歐洲人有關我國著述中之最稱詳備者。出版後，風行全歐，有各國譯文多種。匡國又為首創 Sina（支那）一字即「秦」之譯音者。見洛佛爾 M.B.Lauter 著支那名稱考 The name of China（通報一九一二年，二集十三冊，七二九頁）所著拉丁文「韃靼戰記」De bello tartarico。於清軍入關及南下情形，所記至

詳，直言不隱，足補我國正史之闕略。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一年）在比國盎凡爾斯，德國科倫，義國羅馬同時出版，次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法國里昂刊印法譯本。蓋為歐洲第一部中國政治史也。P.Sommervogel,S.J 所著耶穌會士著述目（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巴黎出版）云「匡國書中所有中國圖，皆採自廣輿記。廣輿記述中國地理，二十四卷，成於十七世紀初葉。」（原書第五册，第六百四十七行）按四庫收蔡訂廣輿二十四卷，清蔡方炳撰。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因明陸應暘廣輿記，而稍刪補之。大抵撮鈔明一統志，無所考正。此云成於十七世紀初，必指陸書而言也。可知匡國全書乃本廣輿記而成，其中一部份曾參考霞客遊記而已。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匡國復來中國，遺著有中文及拉丁文者多種。當其去世之年（一六六一）猶在杭州刊印逑友篇，視利瑪竇交友論尤為廣泛，蓋皆好與士大夫遊者。匡國友多奇人，逑友篇序者蘭谿祝子堅先生石，即以文詞而以醫術遊江湖間者。方以智浮山前集卷之四流寓草有示祝詩。光緒蘭谿縣志卷五文學有傳。匡國嘗於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設教堂於蘭谿，子堅即於是時奉教者。今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處藏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蘭谿教友祝石等六人請第一任中國籍主教羅文藻到蘭谿宣慰教友書，自稱已八十三歲。（譯文載一九三三年寧波出版公教文雙月刊第一、二期）余歲辦學鈔本稱匡國「慷慨豪邁，往還燕趙晉楚吳粵，啓誨甚多，名公鉅卿，咸尊仰之，希一握手為幸。」蓋與霞客之豪情逸興相彷彿，匡國雖不過其人，而

猶得讀其文，並用以爲繪圖之助，非偶然也。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記匡國曾至漳州，並往福儒士家發現一舊拉丁文聖經，霞客友多漳州人，則匡國得見遊記，亦自有因。蓋匡國「中國新圖志」一書必成於順治七年回歐之前，距霞客去世不及十年，時遊記尙無刊本，尙不與霞客家人或友朋有舊者，豈易獲得？天津工商學院藏有匡國之世界廣輿圖，二十六年一月四日該院出版滙光四卷四十二期有攝影。明末清初教士所繪世界圖或中國圖，無稽廣輿圖者，亦可見匡國受廣輿記影響之深也。惜裴司鐸遠處津沽，無從質證，二十六年春在杭州相値時，倉促中亦未商榷及此。翹首北望，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

衛匡國根據霞客之遊記而作輿圖，不愧爲霞客身後之知己；霞客何幸而有此域外之友？裴化行神甫謂霞客或曾與當時教士接觸矣，則匡國之知有霞客遊記，或卽得諸先來教士之介紹，否則，匡國初來華夏，遊記傳鈔者雖衆，亦不易爲新來遠客寓目也。艾儒略之卒於閩也，適在匡國自閩返歐前一年；或謂匡國所獲之霞客遊記卽來自艾儒略手者，亦不無見地。故霞客生前與西洋教士之關係，實値得吾人加以探索。

（二）霞客遊記與康熙時西教士測繪之中國全圖

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至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天主教教士奉命測繪中國全圖，衛匡國之「中國新圖志」卽諸教士之重要參考書也。衛書與霞客遊記如有直接關係，則康熙圖與霞客遊記之有間接關係，似亦無可否認。但余以爲二者間有直接關係。亦屬

記中繪圖教士之一雷孝思 P. Regis S. J. 記曰：「吾人時時以作一完善之輿圖爲期，每抵一省，即不甚重要之城鎮，亦必躬往勘視，諮詢地方官及士紳，査閱該城之史地圖籍。」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霞客族孫鎮作遊記序曰：「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時距繪圖僅五十餘年，而遊記已如此風行；當時教士係奉旨繪圖，各省員司，殷勤異常，地方官與名人巨公，必以此書進也。

丁文江先生霞客年譜曰：「知金沙江爲揚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現也。惜無繼先生而起者，爲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縣志及遊記中。直至康熙中派天主教教士，製全國地圖時，始再發見金沙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數典而忘祖，亦吾國學者之恥也！」以余度之，西洋教士蓋即據霞客所記而以之入圖，非再度發見也。謂中國人不知江源者，乃後世之歐人，非當時繪圖之教士也。

年譜又曰：「以各江之分水嶺，定山脈之來去，與近世地學家言，不全符合，此乃十九世紀以前言山脈者之通病，康熙中製中國地圖之天主教教士，亦正犯此弊，不足爲先生病也！」細玩丁先生之語，似繪圖教士與霞客同犯此弊，爲不謀而合；寧知教士所繪者，即本諸霞客所記，又安得而不同入歧途？

（三）徐霞客與西洋教士之關係

吾人讀霞客遊記，但見其與禪侶過從甚密，余並疑其漫遊時或作僧裝也。崇禎十一年

十一月初十日在富民縣老和尚洞記曰：「余至此，土人猶以為老尙也。」則絕不見其與西洋教士有何往還。當時西洋教士有否關於霞客之記述，吾人孤陋寡聞，不敢置言。丁先生為霞客作年譜，嘗鉤稽羣籍，列舉霞客之友朋，而謂：「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略也。」余不敏，請師丁先生之意，一述霞客之友朋與當時天主教人士周旋之跡。

霞客遊跡雖廣，而交友不多，乃在此少數人中，與天主教人有關係者得九人：即張瑞圖、何喬遠、曾楚卿、劉履丁、鄭之玄、張燮、陳繼儒、黃景昉、鄭鄤是也。瑞圖、喬遠、楚卿、之玄、燮、景昉皆曾為先生太孺人秋圃晨機圖題詠者，喬遠又嘗為先生所建名宦張侯廟作紀序。履丁則為先生介紹錢謙益，而又與先生相遇於西歸之後，並葬先生於江陰之馬灣者。繼儒則為先生父母作傳，並為先生母作八十敍者。鄭鄤則先生自漳浦徒步訪之於羅浮，又訪之於常州者。鄤亦為黃道周贈先生詩作跋。九人中除張燮不能確認外，餘八人皆曾與天主教教士或教友相識。霞客生當利瑪竇至澳門後二年，教會傳佈未久，則此比例數，已極可觀。霞客交友又多閩人，閩省開教遠在霞客入閩前數十年，而當霞客第一次遊閩後九年，第二次遊閩後五年，第三次遊閩前三年，即天啓五年（一六二五），西儒艾儒略（字思及，Aleni）應葉向高之邀，自杭州南下，止於福州，遍交省中名士，一時教務之盛，甲於全國。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卒於延平。著漢文書籍頗多；若三山論學

記則與向高析疑辯難之作，口鐸日鈔則儒略及其他三教士與閩中士大夫談道筆記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閩中諸公贈詩抄本一册（中文部一〇六六號），題晉江天學堂輯，皆爲贈天主教教士者。吾友向覺民先生達嘗以傳抄本見貽，贈詩者凡六十九人，皆一時名流，第二第三兩首則張瑞圖、何喬遠所作，第六首曾楚卿作，第二十三首劉履丁作，第五十一首鄭之玄作。五人皆霞客良友，瑞圖、喬遠、之玄皆泉州人，履丁漳州人，楚卿莆田人。又皆儒略教化最盛之地。據口鐸日抄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至十一年（一六三八）儒略所到地爲福州、三山、福唐、莆陽、桃源、龍潯、仙谿、清漳、溫陵、建州、龍江。崇禎七年（一六三四）　略在泉州及興化授洗二百五十七人。萬歷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迭在泉州掘獲古代所遺十字碑三座，（見張星烺先生著泉州訪古記，地學雜誌十七年一期）從者益衆。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建寧縣正堂左光先告示中所謂「西而公卿臺省，外而院司守令，莫不敬愛景言；所題贈詩文，刻於崇正集者甚衆，而艾思及先生，在西儒中尤稱拔萃，所著書皆驚心沁耳，懷迷破夢，相國葉公，敦請來閩，敷鐸宏宣，八閩都邑，咸建聖堂，以虔昭事。今幸振鐸來茲，本縣亙質所學，尤深讚嘆云云。」（見正教奉傳）即指此也。光先爲名臣左光斗弟，事蹟見明史本傳。崇正集之全名爲熙朝崇正集，題「皇明閩景教堂輯」，亦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中文部六八七五號云。崇正集有葉向高贈西教士及池顯方贈儒略詩，皆見帝京景物略。景物略刻於崇禎八年（一六三五），

耶穌會士艾儒略等五人贈教士詩亦必在崇禎八年前後，而天主教大行於閩也。

又據耶穌會士列傳稱儒略在閩，足跡遍泉州、福安、建甌、邵武、汀州、漳州、興化。授洗最多時，年達八九百人。學者稱「西來孔子。」三山陳侯光著辨學芻言自序曰：「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標號甚尊，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潔，闢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即指儒略而言也。黃貞請顏壯其先生闢天主教書亦云：「爾來有天主教中人利瑪竇會友，艾姓，儒略名，到吾漳，而鈍漢逐隊皈依，深可痛惜！更有聰明者，素稱人傑，乃深惑其說，堅爲護衛，煽動風土，更爲大患。」深惑其說者有人傑，亦以見儒略聲氣之盛。崇禎十年十一月初一日福建巡海道施邦曜告示有云：「窮鄉僻壤，建祠設館，青衿儒士，篤信醉狂，堅信其是而不可移。如左黃吳伯溢，以縉紳之後，甘作化外之徒；黃尙愛等，因鄉而起，堅爲護法之衆：（中略）此等情狀，似不舉天下而入夷教不已！」（以上皆見破邪集）施邦曜明史有傳，其言亦足證爾時福建教務之發達。

霞客友朋多好談域外事者，或亦足爲霞客曾與西洋教士接觸之旁證。張燮著東西洋考，爲明末中西交通史上之大名著，其卷六紅毛番即和蘭國條云：「奉天甚謹，祀所謂天主像」。是張燮蓋亦必嘗與西士晉接，或嘗聞其說者。

何喬遠著名山藏一百十卷，中有王享記中國鄰邦及南洋諸地，並及香山澳之佛郎機。

稱讚之交艾儒略，至於以詩文相酬，殆在求得域外關題智識。蓋艾儒略嘗於天啓三年（一六二三）撰職方外紀，卷首附有萬國全圖，志爲利瑪竇輿圖及龐迪我圖說作增補也。蓋利龐之作，皆圖重於文，而艾則文重於圖也。其書凡五卷，又卷首一卷，四庫著錄，天學初函，守山閣叢書，墨海金壺，清朝藩屬輿地叢書均收入。明清作家如：方以智通雅，查繼佐罪惟錄外國列傳，尤侗外國傳，陸次雲八紘譯史，王大海海島逸誌，俱曾抄襲其說，亦以見其流傳之廣也。

陳繼儒與杭州楊廷筠極相得，廷筠乃教中所稱中國開教三大柱石之一，與徐光啓李之藻齊名，官至京兆尹。嘗欲疏薦繼儒，繼儒絕意進取，遂不强，繼儒乃稱爲「眞知己」。繼儒所作壽楊淇園御史文中，有「數年以來，公與其蹤跡甚疏，而洞察本懷甚悉」之語。廷筠奉繼儒爲內學師，繼儒則奉廷筠爲國學師。職方外紀即廷筠所刊刻而爲之序者。繼儒亦嗜海外見聞，所刻寶顏堂祕笈，收海語，海槎餘錄，瀛涯勝覽，四夷考，備倭圖記等，皆記異域事蹟。又爲利瑪竇撰交友論，並爲之序曰：「此書眞可補朱穆劉孝標之未備。」可見其推重之深。

黃景昉與鄭鄤，俱天啓二年進士，丁文江先生疑二人皆由文震孟及陳仁錫介紹於霞客者。景昉嘗爲玉山論學記作序，極推艾儒略，曰：「以余所交如思及先生，號爲西儒，泊儼然大儒風格，是則可重也。」

鄭鄤曾爲黃道周贈霞客詩作跋，亦霞客所極敬佩者。鄭氏有云：「石齋過毗陵，爲余實霞客之奇，徒步三千里，訪之墓下，當事者假一郵符，卻勿納，時聞余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余於羅浮。往來海上，眞有卓契順之風。」按霞客以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訪道周於漳浦墓次，又赴羅浮訪鄭鄤。是年遊記止於四月三日。同年七月鄭鄤爲王徵畏天愛人極論作序，並爲評點。徵字葵心，號了一道人，亦奉天主教，聖名斐理伯，譯刻西儒耳目資及遠西奇器圖說等。畏天愛人極論乃其純宗教書籍。張維彥爲徵作墓誌，有「公邇西學，與利瑪竇之門羅諸賢，造天主堂以居之，著畏天愛人論，爲前人所未發」語。見康熙陝西通志。康熙涇陽志引其文刪之。張炳璿王公像贊曰：「畏天愛人，雖似嫻耶穌之學，此生平好奇嗜然。」蓋欲爲王徵奉教事蹟諱也。然畏天愛人極論一書之受當時人所注意，亦於此見之。鄭鄤序曰：「王子經濟大手，別所結撰，多奇絕，王子一不自有而獨以此爲日用之課。既極論之，又命予評點以傳。」鄤既爲之序，復爲之評，亦足見其愛好此書之深。畏天愛人極論，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舊抄本，編目爲中文部六八六八號。鄭鄤亦嘗見王徵之遠西奇器圖說，天山自敍年譜（石學彙刊第一集）曰：「崇禎九年……時王葵心爲揚州司李。葵心玄理極精，而有巧思，出奇器圖說相示。予問以木牛流馬，亦云可造。若所爲代耕風磨水漏之類，眞有裨於經濟，欲盡試之，聞起用之報而返。」二人之相得，即此可見一斑。謂鄭鄤不以王徵處所得遠西新奇之說告霞客，孰能信也。鄭鄤之與教友發生關係，尚有早於王

徵者，蓋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霞客補常州府學生員時，其宗師即教友楊廷筠淇園公也。（見天山自敍年譜）

綜上所述，霞客一生，似不能不受西洋科學之影響，而與當時之西洋教士不能無間接之關係。其友好中有八人與教士有直接關係一也；霞客入閩，值天主教大行二也；閩中傳教士皆儒服，著職方外紀三也；墓誌稱霞客不喜讖緯術數家言，故易與教士接近四也；苟霞客一生未嘗與教士相往還，則衛匡國不易於霞客卒後十年內獲得其遊記五也；霞客友朋頗多以海外經濟著稱者，則對當時來自海外之教士必更樂爲從六也。舉此六端，則吾人今日初步研究所得，霞客與西洋教士之關係，雖祇以間接者爲限，然謂其有直接關係，亦頗可信也。惜霞客遊記殘缺，所記亦不全。鄭鄤跋黃道周贈霞客詩，有：「往來海上，與有卓契順之風」一語，足見霞客亦嘗屢爲航海之遊也，然霞客渡海事迹，僅一見於陳函煇墓誌。遊記無一語道及。況雍乾禁教以後，教內外著述中有涉及西來學術宗教者，輒爲後人刪削。今存徐文定公遺墨中，亦有塗改之迹，可爲明徵。雖然，霞客遊記，以鈔本行世者百餘年，鈔本嘗往往爲人所珍，西人尤爲重視。余深信霞客遺文必尚有留於天地間者，安得搜羅殆徧，遍發海內外書藏而求之，則今日僻處萬山中之初步研究，不過發凡起例而已。

按輔仁大學華裔學志第一卷第一期有裴化行法文「中國及其鄰國之科學測繪地圖之路

段（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末）」及 Walter Fuchs 德文「清代地圖的材料」二文之

余僅見其目，不知有否涉及衛艾二氏輿圖及殷谷遊記處也。謹識此以待他日補定。

紅樓夢新考（初稿）

——從研究清中外國物品所得之結論——

方豪

（一）引言

民國三十年秋，余來浙江大學授十七八世紀中外文化交通史，因略及紅樓夢中之外國物品。不意興趣所至，半年間，積稿盈帙，同事與學生，多有索閱者，並應文學研究會及史地學會之約，公開演講二次。余讀紅樓夢不及三遍，且走馬看花，草草翻閱，殊不敢高談「紅學」也。

自來為紅樓夢考證者，主要者有下列三說：一以賈寶玉為清世祖，以林黛玉為董鄂妃（王夢阮沈瓶菴紅樓夢索隱）；一以寶玉為納蘭性德，黛玉乃性德之妻（陳康祺俞樾）；一以寶玉為曹雪芹（胡適紅樓夢考證）。曹雪芹為寶玉一說，最為時人所信服。顧余未草此文之先，即認為雪芹不過憑其先人之筆記及家中之傳說，為之剪裁穿插而已。原書第一回記此甚明，曰：「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

又歷史考古之原則，凡屬傳說，非確證其出於偽造或誤傳，必時間上發生愈早者亦愈可信。董小宛為董妃之說固不足信，然黛玉為董妃寶玉為順治之說，產生既早，吾人在未

證實其爲後人傅會以前，至少亦當姑以其說爲可疑也。自來疑寶玉爲順治之說者，咸以順治帝並未出家爲惟一理由。然據陳援菴先生近年研究之結果，（見所著湯若望與木陳忞，載輔仁學誌第七卷第一第二合期；又語錄與順治宮廷，載輔仁學誌第八卷第一期）知順治確因對董妃鍾戀而結合，又以董妃之早卒而哀傷逾恆，因而由茆溪森和尚爲之剃髮。雖其後又因玉林和尚之勸而重復蓄髮，但順治出家之念，削髮前後，固無時不縈縈於懷也。陳先生曰：「謂順治爲出家未遂則可，謂其無出家之意，無出家之事則不可。」順治與董妃是否即寶玉與黛玉，陳先生不言，而余則確信其有一部份眞實性也。

以上爲余未草此文前，對紅樓夢本事之看法。

雖然，紅樓夢大手筆也；凡偉大之文藝作品，其情節往往風詭雲譎，無從捉摸，然乃必有二點可資探索：一爲世界之小說傑作，必含有一部份之自傳性質；一爲任何之天才作家，決不能完全脫離環境之影響與限制，故吾人欲求知某小說之背景，雖不應刻舟求劍，牽強附會，但亦非絕對不可知者。求證之道，莫若注意其書中之細微情節，以其易於爲作者所忽略，而於不知不覺間透露消息也。故欲尋紅樓夢之線索，若能在書中之外國物品上着眼，追求其在何時傳入？自何地傳入？由何人傳入？應爲何等人家所能享有？亦不失爲研究之一法，而書中之本事，亦可推知其大概也。

以余研究紅樓夢外國物品之結果，乃益信余第一種看法爲不誤。

曹雪芹有删潤之功，惟書中資料則應爲其先人所遺。蓋據胡適之先生考證，雪芹卒於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即公歷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假定其死時爲四十五歲，則雪芹當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如此，則雪芹之修改紅樓夢必在乾隆後。清宗室永忠戊子初稿，乾隆三十三年有弔曹雪芹詩三首，曰：「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成七截三首」。瑤華評云：「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而永忠丁亥悼亡詩，有云：「……墨翁窗讀情詩……」情豈有過此者耶？因出塞圖。……」丁亥爲乾隆三十五年，即雪芹卒後五年，是時紅樓夢尚祇有傳本，但瑤華謂：「余聞之久矣」，可見在曹雪芹生前，紅樓夢已負大名。惟乾隆時，無論在朝廷，在民間，外國物品已司空見慣，至少有若干物品，不應如書中所描寫之爲罕見，而順治時，則宮中之外國物品，亦不能如紅樓夢所記之多，故以外國物品論，則紅樓夢最適宜之時代，應爲康熙朝，亦即曹璽及曹寅任江寧與蘇州織造時也。（詳後）據趙嬤嬤與鳳姐所云（第十六回）則賈王二府之豪富，與彼輩及管理外國進貢二事，極有關係；紅樓夢中必有一部份外國物品係得自彼時者，然彼時趙嬤嬤尚在童年，則其非寶玉（曹雪芹）所能親見也可知矣。或曰：器物爲佈景，故事爲劇情，紅樓夢之作，容有以舊佈景演新戲劇之穿插。余曰：此固非不可能者。但舊佈景與新戲劇，究有不調和處，或非曹雪芹所願導演也。況在地點上，在人物上，雪芹自能故弄玄虛，張冠李戴，惟日用品方面，恐不易面面

體到也。

至於順治董妃之說，雖無實據，然在出家一點上，寶玉與順治確相類似；而以外國物品言，紅樓夢中之洋貨，皆臣民亦不難獲得，（或取得於進貢之先，或自宮中流出）要不能與宮廷無關。余故以為紅樓夢所記者，乃順康雍三朝之朝野軼聞逸事，而曹雪芹備人之生活史，自亦佔一重要位置也。

本文主意說明，請進而為紅樓夢中之外國物品作一統計，然後再究其來歷，及書中人物與外國人之關係。最後，則下若干結論。論中參考困難，研究不易無遺漏，因名之曰初稿云。

（二）　紅夢樓中之外國地名注

紅樓夢中所有外國地名，除西洋等名外，惟暹羅（第二十五回等）、俄羅斯（第五十二回）、波斯（第六十二回）等三國確為有其地者。其他如瓜窪國（第十回）等皆出於虛構，但觀書中口氣，可知作者亦如當時其他小說家無異，以瓜窪為一渺茫荒遠之地稱已。原文曰：「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至於女兒國（第十七回）、茜香國（第二十回）、眞眞國（第五十二回）、西天大樹國（第一百〇一回），則抄襲陳說，非必眞有其地者。可知作者所見西洋物品雖不在少，然對於域外地理知識，則淺薄異常。此固顯而易見。

者。

（三）紅樓夢中外國物品統計

1. 外國呢布類

西洋物品之最經見者，為各種衣料，包括毛織物、絲織物及棉織物。如鳳姐翡翠撒花洋縐裙（第三回）、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第六回）及大紅洋縐襖（第九十回）等，不勝枚數。寶琴自謂八歲時曾在西海沿上，見一眞眞國女孩，身穿洋錦襖袖（第五十二回）。此事雖出寶琴謊造，但作者知有洋錦一物，則為實情。李紈有哆囉呢對襟褂子，寶玉有哆囉呢狐狸皮襖（皆見第四十九回）及荔枝色哆囉呢箭袖（第五十二回）。鳳姐並以哆囉呢為包袱（第五十一回）。洋巾在書中亦不多見（第五十三回等），鳳姐用以包裹銀箸（第四十回），黛玉則包匙筯（第四十九回），頗似西餐格式。寶釵更有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鶴氅（第四十九回），賈母賜與寶玉之孔雀毛氅衣名「雀金泥」者，則係俄羅斯國出品（第五十二回）。賜與寶琴之鳧靨裘，則為野鴨毛製成，或亦俄國貨（四十九回）。榮府榮禧堂王夫人房內大炕上鋪有猩紅洋毯（第三回）。至所謂茜香國汗巾（第二十八回），乃琪官欺哄寶玉者，究為何國貨，則不得而知矣。寧國府被抄時，有洋呢三十度，嗶嘰三十三度，姑絨四十度。（第一百五回）

2. 鐘表類

紅樓夢中所有外國用具，鐘表實佔最多數。鳳姐受命管理寧國府之始，對執事人等訓話，說：「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的時刻。」（第十四回）。友人某君語余曰：鳳姐隨從人員亦盡有鐘表，則賈府鐘表之多，可想而知。余笑曰：鳳姐之言不可信也。鳳姐欲以此恐嚇寧國府之婆婆媽媽，使各遵守時間，不致偷懶耳。否則，何以一部紅樓夢中，祗有鳳姐屋內有鐘，不見其身上有表。亦不見鳳姐如寶玉之時時命人取表而看。作者描寫鳳姐之刁詐，可謂至矣。鳳姐亦自知誇張過甚，恐露馬腳，故接着：「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此，則鳳姐來寧國府時，雖隨身無表，亦能知時刻，施賞罰也。榮國府鳳姐屋內之鐘，乃一掛鐘，劉老老初次候見鳳姐時，曾飽受虛驚：「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狠似打羅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是的，却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處呢？……』正發獃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唬得不住的展眼兒。接着一連又是八九下，」（第六回），此外，則惟寶玉怡紅院內有自鳴鐘（第五十一回，五十二回，六十三回，八十八回），乃在寶玉臥室「外間屋裏槅上的」似為座鐘。此鐘不時損壞，常需修理。晴雯曾說：「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第五十八回）。惟賈府中有一最寶貴之金自鳴鐘，則為鳳姐所經管，值銀五百六十兩（第七十二回）。其同時出售之四五箱大

銅錫傢伙，僅得銀三百兩，可知此鐘在當時所值之價，幾等於八九箱之銅錫器具。鳳姐性又貪婪，銀錢出入，恆有尅扣，則此鐘變賣所得，或不止五百六十兩。蓋其時自鳴鐘爲人所寶，必不僅因其爲金製也。

寶玉究有若干表，爲一疑問。原書第十九回及六十三回，寶玉皆命人取表觀看，可知此表不常在其身畔。晴雯謝世後，寶玉曾密向一小婢探詢晴雯臨終時情形。一小婢曰：「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屋裏，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第七十七回）可知當時之表，必附註有子丑寅卯等字樣。而寶玉此表之不在身畔，更得一證。或曰：當時「鐘表」二字係一個名詞，故屢有連用，或互稱者。如鳳姐所謂「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此處「鐘表」二字，必指今日吾人通稱之「表」，而寶玉小婢中之時辰表，或即時辰鐘。蓋小小表上，不易附註子丑寅卯等字樣，小婢能辨其爲「未正二刻」及「三刻」，其爲大鐘可知。寶玉懷內曾有「核桃大的金表」一具（第四十五回）。八十回亦記寶玉看表。可見鐘表二字在當時雖時或連用，時或互稱，惟本義上必有區別，第不若今人談說時之習於分辨耳。又錦衣軍查抄寧國府時，共得鐘表十八件。

2. 其他工藝品

西洋工藝品中有洋漆茶盤（第五十三回、六十二回，）、洋漆几（第三回、五十三回）、

烏洋漆描金自鳴鐘（第四十回），西洋琺瑯天使像鼻煙盒（第五十二回）。原文描寫此盒頗為精緻，曰：「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又有十錦琺瑯杯，（第四十回）及荷葉形反射鏡，鏡上有「洋鏨琺瑯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第五十三回）。此今日舞臺上習見之物，不意紅樓夢中竟先二百年用之。惟彼時無電燈，僅用以反射燭光耳。榮禧堂有一玻璃盒[illegible]為陳設品。（第三回）大觀園有一舟，「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第十八回）寶玉則以水晶缸盛水菓。（第三十一回）

寶玉房內有大穿衣鏡一具，鏡有鏡套，熱天即少放下，（第十七回、二十六回、五十六回，）嵌在門上，有西洋開關，原書稱「西洋機括」，劉老老曾誤觸機關，門遂自啓，門後即寶玉臥床所在。（第四十一回）。余頗疑此門裝有彈簧，故劉老老能一觸即開。賈母八旬大慶，粵海將軍鄔家送一架玻璃圍屏，在禮物中列為第二。（第七十一回）晴雯曾謂寶玉不知弄壞了多少玻璃缸。（第三十一回）。寶玉[illegible]視黛玉而後，因天雨不便夜行，黛玉即命以玻璃毬燈燃燭送去，寶玉自謂：「亦有這麼一個。」最奇巧者乃一（亦有作一雙者）金質西洋自行船，為寶玉寢室陳設品之一。（第五十七回）。其年寶玉賀壽生日，鳳姐所送禮物中有一件波斯玩器。（第六十二回）不詳其名。

4. 外國飲食品

寶玉被父親責打後，王夫人皆以「木樨香露」及「玫瑰清露」各一小瓶，交寶玉自飲，每一碗水，祇須用清露一茶匙。此二瓶皆有鵝黃籤，係進上所用。余斷其為西洋物品。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第三十四回）。螺絲銀蓋，非當時中國所能製造。玫瑰露又見於第六十回。芳官欲得玫瑰露送柳五兒，寶即命襲人取出出，已祇半瓶，寶玉自云「不大喫」，是此露即得之王夫人，而為寶玉所飲者。惟此處乃一「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與三十四回所云「三寸大小」不合。余疑「五」字為「三」字之誤，緣五寸之瓶，已不小矣，當為「三寸來高的小玻璃瓶」。柳五兒與伊母見「裏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喫的西洋葡萄酒。」寶玉平時飲西洋葡萄酒，即由此透露，此酒之帶胭脂色，亦可以此見之。黛玉病中，寶釵曾送一包潔粉梅片雪花洋糖。（第四十五回）。鳳姐亦曾以暹羅貢茶兩瓶贈黛玉，黛玉頗為欣賞，寶釵亦然。寶玉雖亦有此茶，惟覺其尙不及尋常之茶。（第二十五回）。又暹羅豬及魚，詳後第七節。

5. 外國藥

鼻煙在當時亦視同藥品。上文第四節所引第五十二回之鼻煙盒，即係寶玉為晴雯療頭疼者，酸辣與當，惟用後，太陽穴仍未止疼，寶玉乃主張「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遂命麝月往鳳姐處取貼頭疼膏子藥名「依弗哪」者。「依弗哪」原名不詳。其形狀與用法倘

略有記。據謂「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絞了兩塊指頭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敍述過簡，無法窺知其底細也。

6、外國動物

寶玉院內有一「西洋花點子哈巴兒」狗，晴雯等曾借以譏嘲襲人。（第三十七回）。黑山村莊頭烏進孝，某年年終，送呈賈珍之帳單內，有暹羅豬二十個及孝敬哥兒頑意兒之「西洋鴨」兩對。（第五十三回）。薛蟠五月初三日生日，請寶玉參加宴會，有胡斯來及程日興二人所備暹羅進貢之豬魚。（第二十六回）。

7、西洋美術

紅樓夢之建築，純為中國式，惟怡紅院進門即有一大幅西洋油畫，作女童來迎像，栩栩欲生。劉姥姥曾誤以為眞女童。原文亦刻畫入微，異常生動。曰：「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的迎出來。劉姥姥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姥姥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却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姥姥自忖道：『怎麼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第四十一回）。此外，則有鼻煙盒內琺瑯製成之黃髮帶翼天使像。（見前）。晴雯並知西洋織補法，在當時名曰「界線法」。曾為寶玉修補孔雀氅，寶玉嘆為「眞眞一樣」；並

預先即說：「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惜紅院所有女郎，亦惟晴雯獨擅此法（第五十二回）。

8. 其他洋貨

紅樓夢中又有若干物品，不能確定其爲舶來品者，或係仿製，亦未可知。第二十八回記榮國府東邊二門前有小厮在甬路邊處踢球，爲焙茗所遇。不知是否皮球。又襲人送與芳官之花露油及鷄蛋香皂，亦不能必其爲外國所製也。至於賈母等所戴眼鏡，在當時已甚普通，不復以外國貨目之，但鏡片必來自歐西也。第十九回賈妃曾以牛奶賜寶玉，寶玉乃留與襲人。但竟爲李嬤嬤所飲。牛奶又名糖蒸酥酪，在當時視爲珍品，賈妃未賜前，寶玉已曾有之，亦送與襲人。故曰：「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一部紅樓夢中，得飲牛乳者，寶玉一人而已，襲人與李嬤皆受寶玉之惠而得分嘗者。襲人說：「他喫了倒好，擱在這裏白糟塌了。」珍惜之意，溢於言表。此牛乳似爲外國貨，或仿西式而製者。

上述諸件而外，亦有混稱「洋貨」而無詳細說明者。第六十七回記薛蟠自江南帶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第二箱有自虎邱帶來之自行人，此自行人必係西洋玩具，購自蘇州者。

（四）紅樓夢外國物品之來歷

紅樓夢中之外國物品，有爲外國進貢用者，如暹羅茶、暹羅豬；有爲臣民進上用者，如木樨香露、玫瑰清露；（按廣州十三行爲清代內地洋貨一大來源。皇朝文獻通考市糴考四：「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尙書福康安，兩廣總督舒常奏稱，洋行商人潘文巖等情愿將洋貨內如鐘表等類可以呈進者，每年備辦，懇懇監督，代爲呈進。」）有購自江南者，如薛蟠帶來之洋貨及自行人；亦有莊頭送來者，如兩對西洋鴨。至於其他洋貨，究係何處而來？鳳姐曾說：「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按指接駕）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第十六回）可知當時各國進呈之品，能達到宮中者實不甚多。進貢者必先賄賂海口及沿路各關卡之員司。讀蕭若瑟著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知利瑪竇之進呈萬曆帝方物，途中亦曾爲太監馬堂留難苛求。又如嘉慶和珅檔案（錢臚香先生手鈔本，白蕉補輯，見人文七卷一至五期）所載和珅被籍沒之家產中，所有洋物，亦多爲貢品，且與紅樓夢中所載大致相同。茲先約摘述如下，計有：

大自鳴鐘十九座　小自鳴鐘十九座

洋表一百餘個　洋錢五萬八千圓

瑪瑙煙壺一百餘個　五色大呢八百板

鷺羢一百千板　五色羽緞六百餘板

五色嗶嘰二百餘板

根據右述情形，余已敢斷定紅樓夢中之洋貨，什九為貢品，故為宮廷用品。今試擇主要物品，爲之一一考求。

1. 鐘表

自鳴鐘由利瑪竇帶來我國，爲最早傳入之西洋物品之一。但紅樓夢中之鐘表，俱極華富。沈初西清筆記卷三，記「內府一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手執管於盤中，畫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鐘響寂，則書竟矣。」紅樓夢係此類鐘，可奇也。清汲修主人著嘯亭續錄卷三曰：「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製造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爲玩具。純皇帝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乾隆時，自鳴鐘已普及於士大夫家，且和珅家中有大小自鳴鐘三十八座，洋表一百餘個，遠在榮寧二府之上，余故斷定紅樓夢之作必在乾隆前也。

今人讀紅樓夢，於其自鳴鐘計時之法，往往不解。若一閱南懷仁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刊印之儀象志（亦曰靈臺儀象志）及儀象圖，即不難恍然也。據儀象志六十五圖，可知當時之鐘爲長方形，上半部（大半部）爲一大圓圈，周刻子丑寅卯等十二時，中僅一針。下半部（小半部）左右分列二小圓圈，右計分，左計秒。計分者註有一刻，二刻，三刻，四刻，每刻十五分，與現在通行之鐘同，故一刻與二刻，二刻與三刻，三刻與四刻之

時，各有五分、十分，十五分等字樣，觀鐘者必先察其爲何時，然後再觀其爲何刻，何分。取例言之：紅樓夢六十三回之子初二刻十分，則爲晚十一點四十分，蓋子正爲午夜十二時，子初則猶未到十二時，二刻爲三十分，加十分則四十分矣。裴化行 H. Bernard 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　二〇五，二〇六，二〇七，二一〇，二一八，二二六，二七七等頁，均述及初期教士攜鐘表來華之情形。詞長不錄。其二〇八頁記一五八三年二月四日星期六（萬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義教士羅明堅 Ruggieri 在肇慶府「大自鳴鐘整理得甚是準確，但是爲應和中國人的習慣，要把歐洲的二十四小時改爲十二個時辰，把亞剌伯字改成中國的名字，每天又分成一百段，每段分成一百分。」按如此分法，極不合數學原理，余疑譯者有誤，惜手頭無原著可查。讀沈景倩萬曆野獲編卷三十「華夷自刻之異」，即可知改西洋一日二十四時爲十二時，實利瑪竇創之也。靈臺儀象志固仍以六十分爲一時者。　印大綠蒲海蕃域錄卷二，謂澳門有「定時台，巨鐘覆其上，立飛仙台偶，爲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圖盤，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齧指某位。」蓋其時各地自鳴鐘無不標子丑寅卯者。所謂擊鐘之飛仙，則天使 Angel 也。天使通常皆生翼，故印大綠名之曰飛仙。乾隆五十八年王大海所著海島逸誌卷五閒見錄記定時鐘，曰：「一日十二時，分爲二十四點，子時爲一點，巳時末爲十二點，午時又爲一點，至亥時末又爲

十二點，合一日爲二十四候，是亦一道也。其鐘大小不一，小者徑寸，大者高數尺。」蓋其時十二時與二十四點已並用矣。

正教奉褒第二册（一一四頁）載：「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六月三十八日上傳徐日昇（Pereira 葡人）至御座前，賜牙金扇一柄，內繪自鳴鐘，樓臺花樹，御題七言詩曰：晝夜循環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晴不改衷腸性，萬里遙來二百年。」可見康熙帝愛好自鳴鐘之一斑。二百年當爲一百年之誤，蓋利瑪竇之進呈自鳴鐘在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卽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距康熙三十三年纔九十三年也。王氏東華錄記康熙三十九年冬十月，以皇太后六秩聖誕，命皇四子等備進獻禮物，內有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鳴鐘一架。按一千四百四十分，卽二十四小時也。淸宗室永忠（聖祖曾孫）志學草丁未初稿（乾隆五十二年）有謝賜時辰表吟蜜瓜原韻。則乾隆間宗室得表亦尙非平常事也。

2. 自行船與自行人

自行船爲寶玉房內所有，西洋貨也。故宮畫刊三二六期，有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進貢之首飾箱表擺影，其表每上弦可走八日，其上有活動船，殆卽與紅樓夢自行船同一構造也。惟與紅樓夢撰著之年代相較，似稍後耳。粤海關志卷二十二，暹邏里亞國條，記雍正三年教王伯納第多所貢物品中，有「四輪船」一隻，必自行船之類也。自行人則爲薛蟠

自虎踞樓來，以理度之，亦當爲洋貨。

自行樹與自行人之製法，蓋皆利用自鳴鐘之法條而成也。西清筆記所載內府自鳴鐘，有銅人能執筆作字，即自行人之類也。西清筆記又載：「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闔，至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啓扉，轉身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闔扉。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面粉衣繪，前置洋琴，啓銅人鑰，則兩手泛執棰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合節，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棰於琴，兩手下垂矣。又製飛雀，呼噪逼真，西洋工匠之巧如此。」按故宮週刊三二六期有樂鐘，每小時奏樂，背面有小鳥跳躍，並撲其翅；又有「丫人打琴」；與上述雀及銅人鼓琴同。至道光間，則此等巧製，已不罕見，且有在市肆出售者。道光外交史料卷三頁六，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請禁夷商以違例貨物私易官銀出洋摺云：「夷商每歲必務爲新奇可喜之物，雜相眩惑，如多寶箱，自鳴雀，風琴，不可枚舉。」

然此種法條轉動之機器人實早已傳入我國。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Pfister: Notices bioget bibeiog...... 法文原本第一冊一一三頁記比教士金尼閣 Trigault 於一六一七年春（萬曆四十五年）由法國皇室 Cosme de Médicis 贈以一無比之自鳴鐘，鐘上雕一人首羊身之怪物（Satyre）持弓發矢，每時發一矢以報時。又原書第一冊二五三及二五四頁記葡教士安文思 G. de Magalhaens。某一日以一自行人獻於康熙帝，其人不

報言時，內裝法條，能自行十五分鐘，右手執一出鞘之劍，左臂懸一盾。某日文思又獻一鐘，每小時報時後，即奏樂一曲，各時不同，最後，則如萬砲齊鳴，聲亦漸降，若向遠處退却，終於不聞。藏葉在宮中，時為康熙帝創製新奇工藝品，與一普通工人無異，欲以此博康熙之歡心，卒教會得穩固而廣傳耳。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四月初五日，文思卒，初六日帝降諭曰：「今聞安文思病故，念彼當日在世祖章皇帝時，管造器具，有年上意。其後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盡力。況彼從海外而來，歷年甚久，其人質樸風著，雖負病在身，本期療治痊可，不意溘逝，朕心傷憫。特賜銀二百兩，大緞十疋，以示朕不忘遠臣之意。特諭。」（正教奉褒第二冊七十三頁）可見安文思之供職清廷，實始於順治時。後康熙帝又派侍衛趙隆等三員送葬。可謂榮矣！

安文思能製自行人，但在其後，又有瑞士籍修士林濟各 Stadlin 者，以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冬抵北京，入宮當職，所製奇器，其數尤多。蓋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德教士紀理安 Kastner 回歐洲，為清廷羅致善製機件之修士，林濟各即應徵而來也。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卒，帝亦賜銀二百兩，大緞十疋。（見費賴之原書第二冊六二〇頁）

乾隆時，宮中已有鐘房，專以招待西洋教士之管理鐘表者。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處所藏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記實（見前）原文曰：「又因他（按指西洋教士華名 西澄元者，

文中亦稱西老爺，西名 Adeodat，爲傳信部所遣，見後）在朝爲在花園裏作鐘作玩意，兩位天天見萬歲，萬歲很喜歡他，很誇他巧，常與他說話。如意館內有三位西洋人畫畫，兩位作鐘，共五位。萬歲常向他們兩個說話，就是畫畫的郎老爺，官名士寧，聖名若瑟，很有體面的。萬歲很愛他們，他有河道[illegible]監頂戴，王公大人面前，有體面，西老爺也是如此。……西老爺在如意館內鐘房，常見萬歲，萬歲常和他說話，看他做的，很誇說他的法子很巧。欽差未來之先，萬歲對西老爺說過好幾次，你們快快完西洋房子，你們的西洋大人來了，我叫他看我的西洋房子裏的陳設，都是大西洋的很好的東西，又有好些都是西老爺做的，很巧很妙的玩意排設。」西澄元住鐘房，又專製鐘及玩意，亦值得注意。蓋寶玉之鐘，時有損壞，常需修理，（曉嵐曾有此言，見前）余嘗爲寶玉覓修理之人，以爲必係當時在宮中之西洋教士也。

乾隆間又有法籍教士楊自新 Thébault 者，以乾隆三年（一七三八）至中國，亦居於宮中鐘房，嘗製一自行獅，能走一百步，與活獸無異，法條則藏置於獅腹。其後又作一獅一虎，能行三十步至四十步，據稱乾隆帝所囑。自新卒於一七六六年一月十八日，即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費賴之原書第一冊七九三頁）

楊自新卒後三年，即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法籍司鐸汪達洪 J. M. de Ventavon 記曰：余來華後一年（按即一七六七年）即以鐘表師資格被召入宮，然余實可稱爲機械師，

置皇上所需精巧之機器，且非鐘表也。在余抵此後不久逝世之瑞自鳴修士，曾製一獅一虎，能自行三四十步，余近正製二人，能手持花瓶而行。余已工作八月，惟尚須一年，始克完成。余以是能屢見皇上。……余因常須入宮故不能與其他同事同居京內，余因職務關係，常居海甸。國內之大吏與王公，時時請西人為彼等修理鐘表，鐘表在中國為數頗多，而再能修理者僅二人，一為傳信部司鐸，一即余也。〔見彙編之原書第廿二冊九一四頁）所云傳信部司鐸，即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記實文內之西澄元。又晁俊秀 Bourgeois 亦記曰：帝見汪達洪為渠所製之二器，極為滿意，乃溫語嘉勉。所用宮詞，為中國皇帝所不輕發者。（見同上）

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英使 Williamson 貢一樂器八，能奏「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字，乾隆五十年汪達洪為之改造，俾能奏滿蒙字。（見週報一九一三年二卷九頁）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後，教士閔明我 Grimaldi 與理格 Herdtricht 並均被任為宮中管理儀器及關於機械之職務。法籍修士陸伯嘉 Brocard，以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抵中國，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卒，在華十七年，皆在宮中製造鐘錶及物理器具，與皇帝及大臣所愛好之雜器。又有波希米教士嚴嘉祿（亦作顏家樂，嚴嘉樂）Slaviczek 以一七一七年一月二日（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抵京，彼善數學，音樂及機械專家，在宮中製彈琴六座，為帝及近侍大臣所嘉賞，並精於製造或修理鐘表風琴。雍正十三年（一七

三五）卒於京。又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卒於北平之法籍司鐸蔣友仁 M. de Benoist 於修與汪達洪同時在宮中担任鐘表及機械工作，不及一年即去世。（見費賴之原書三七二、三九二、六五五、九七四頁）又法國陳增爵修士巴嘉祿（J. Paris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來華，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卒於北平，墓碑稱其「在內廷修理鐘表，效力有年」。民國十七年北平法文公教月刊十二月號有巴嘉祿傳，謂一七八七年乾隆帝自英國得一機器一架，置於行宮。帝願在京中亦有一具，巴修士遂奉命與一傳信部教士 Adéodat 同作，歷一年餘始告成功。計高四五尺，能作漢滿蒙藏字，以頌皇帝。（此據一七八九年十月十七日羅尼閣 Raux 函，見通報一九三三年二四四，二五二頁）

丑、洋漆器物

洋漆器物，在清初不特為歐人所寶，清帝且以之賜外國使者。梵蒂岡圖書館 Borg. Cin. 516 有雍正帝（五年一七二七）賜葡萄牙使臣麥德樂 Metello 回國時之禮單，共七箱，在第四箱內有洋漆柿子盒一對及洋漆蓋碗四件，第五箱則全箱為洋漆線徑一對。洋漆在當時，既如此可寶，則紅樓夢所記，殆非清室莫屬矣。

洋漆器皿之作為欽賜西人禮物，至乾隆而猶然。羅馬傳信部檔案處，在一七五五年至一七五六年卷宗內，（第二百二十頁）有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葡王若瑟第一遣巴石諾 Don Fr. Xav. As. Pacheqoy Sampayo 使華紀實一文，述是年端午節「萬歲爺送了伯爵

羅亞王裝箱香袋、扇子、小荷包，紗葛布絹，頂好洋漆的傢伙，各樣頂細磁器傢伙。」

4. 鼻煙壺

鼻煙在清代，頗爲盛行，然其始亦惟宮中及太臣可得享用，故鼻煙壺之製造，異常精緻，而質料亦俱極名貴。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葡使麥德樂所進方物三十箱，第一號箱內即有金鑲琊瑯鼻煙盒一個，金鑲蜜蠟珊石瑜瑪瑙藍石雲母鼻烟盒六個，奇樣銀鍍雲母琺瑯鼻烟盒四個。又第九及第十號箱內，亦各有鼻煙六瓶。可見雍正時，西人尚以鼻煙及鼻烟盒爲貢品，其非平民或尋常士大夫所能享用，不難想知。而金鑲琊瑯鼻烟盒尤可與紅樓夢所記相印證。「葡使貢物文獻現藏梵蒂岡圖書館 Borg. Cin. 516。洪亮吉七招自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尚鼻煙，皆刻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卷施閣集）杭世駿謝谷馬君傳：「君迴翔江湖，疊蒙恩賚，賜御書、石刻、貂緞、荷包、鼻煙壺等物。」可覘乾隆初年之風氣。

乾隆十八年來華之葡使，於四月初九日在圓明園「進了萬歲他本國王帶來的禮物，共有四十八抬，禮物是這些金絲緞、銀絲緞、銀器、自來火、大鳥銃、小鳥鎗、各樣香料，各樣葡萄酒、各樣葡萄燒的蒸的香露、各樣藥料油、寶劍、寶石、各樣鼻烟盒，玻璃器皿等物。大概共值二十萬上下價值。」（見上）是乾隆時，鼻烟盒猶爲貢品，而吾人亦可知和珅家中所有二百餘瑪瑙鼻烟壺之由來矣。

5. 西洋衣鏡

紅樓夢記賈玉屋內有大衣鏡一具，此物在彼時亦惟皇室有之。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荷蘭貢物中有照身大鏡二面。（見池北偶談）三十九年冬十月，帝獻祝皇太后六秩聖壽之禮物中，有千秋洋鏡及百花洋鏡各一架。（王氏東華錄康熙六十六）高士奇蓬山密記記康熙癸未（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三月二十六日「上入宮，經筵畢，召臣士奇至養心殿。……上命近侍前觀新造玻璃器具，精瑩端好。臣云：『此雖西器，其成否有關政治。今中國所造遠勝西洋矣。』上賜各器二十件，又自西洋來鏡屏一架，高可六尺餘。」其時能得康熙帝如此厚賜者，不可多得。

6. 玻璃器物

據上引蓬山密記，知康熙時中國已能自製精良玻璃用具，頗以其成本太高，不能普及民間。故清初外國進呈與清帝致贈之禮物中往往雙方皆有玻璃器物。池北偶談卷上記康熙丁未夏（六年一六六七）荷蘭國甲畢吧王油煩嗎綏極，遣陪臣卑獨攀呵閩等八員入貢，除西洋小白牛，荷蘭馬，哆囉尼絨以外，又有玻璃箱，大約卽榮禧堂玻璃盒之類也。甲畢吧亦作噶羅巴，噶留巴，噶喇巴，卽爪哇也。（朔方備乘卷二十九北徼方物考，玻璃鏡條註曰：「臣秋濤謹案張玉書外國紀曰，俄羅斯康熙十九年來貢玻璃鏡。」康熙五十九年除夕，（一七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帝在中和殿宴教皇使節嘉樂 Carolus Tournon，嘉樂所進

禮物中即有「玻璃器皿」。壬寅年正月十八日（一七二二年二月十四日）帝賜「數化燈三對，卜滌溫鳴爾鬪燈三對，還有磁器二箱，琺瑯二箱，日本漆器二箱，玻璃器二箱。」（見梵蒂岡圖書館 Borg. Cin. 439,511 戴保下千總陳良總撫標千總袁良棟稟帖）而乾隆十八年來華之葡使，所進物品中，亦有「玻璃器皿」一項。（見前）其用玻璃器皿在清初非常人所能有也。寶玉與黛玉皆有玻璃球燈，而正教奉褒第二冊記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二月十一日帝南巡至杭州，「侍衛趙伍（按爲兩人）來堂即拜天主聖像，禮畢，傳旨欽賜銀兩，與賜濟南天主堂一樣的。鐸澤（按即當時在杭州之殷教士殷鐸澤 Intorcetta）獻方物八種，隨侍衛趙往上獻。上閱畢，傳諭云：不收他獻，恐人家心裏不安，收玻璃綵毬，餘著帶回。」不知此玻璃綵毬是否寶玉黛玉之玻璃毬燈相類也？又康熙二十五年荷蘭貢物內有大琉璃燈一圓，聚耀燭台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見前）澳門紀略卷上官守篇「外船之來以嗶嘰、哆囉嗹、玻璃、諸異香珍寶。」可見玻璃器物，實當時之重要舶來品也。

7. 西藥

清初在華教士，不乏以醫藥爲傳教入手之門者。惟平民對西醫，忌特甚，鮮敢身試。然康熙帝則服西藥求西醫，乾隆帝亦嘗爲第五子訪西醫也。

正教奉褒第二冊（一一三頁）載「康熙三十二年五月，聖躬偶然違豫，張誠Gerbillon

自進 Bouvet洪若 J. de Fontaney進金雞挐（按即今譯奎寧）。上派四大臣試驗，給瘧者服之，即愈，四大臣又自服，亦無恙，奏聞，上遂進用，不日即康豫。上欲旌張誠等忠愛，因於六月初九日賜皇城西安門內廣廈一所，並派大臣督工修整，以便修士居住。」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 xxviii, P. 52 記允礽廢立後，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臟衰弱，心跳過速，臥病幾死。羅德先 Rhodes修士進藥並愈遂榮任內廷御醫。德先爲法國都魯斯 Toulouse 人。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入中國，先居廈門，旋奉召入京。帝嘗以不治之症諭之，雖不立愈，廷臣俱欽服。嘗自製藥品，求者甚衆，曾爲康熙帝治疾二次，一次心悸症，一爲上唇生瘤。帝嘗作十次旅行，歷時各在半年以上，修士均隨侍左右。帝頗感激，乃賜耶穌會士價值二十萬佛郎之金錠云。（費賴之原書五五五至五五七頁）以上兩項材料所記心臟衰弱及心悸症，必同爲一病。

康熙時京中有一著名西洋外科醫師，即法籍修士樊繼訓 Frapperie。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入中國，曾爲康熙小孫在病危時授洗，年約三四歲。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十一月二日修士卒，年僅三十九歲。（費賴之原書五六三頁）正教奉褒謂繼訓奉派內廷行走。四十二年陰曆十月十五日「上諭赫世亨：『據大阿哥所奏，樊繼訓病故，似此外科，委實難得，且人品亦優，深爲可憫，朕甚悼之。爾齊集西洋人等，傳此旨意，將大阿哥所付賞賚之物以賜之。特諭。』十六日，赫世亨偕廣儲司員外郎安泰，及茶膳房人員，齎

帑金二百兩，大緞十匹，賚至西安門內天主堂。」安泰亦修士，精醫，見後。

又有羅懷忠修士 Fr. da Costa 曾從名師習藥及手術。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七）入中國，在京中爲教內外人治病逾三十年，地方人士及大小官員均亟其術。立施診所一處，義務治療。又不時奉召入宮，但尤樂與貧者親。病者或難於行，則躬往顧視。卒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〇）（費賴之原書六三九——六四〇頁）據正教奉褒（第二冊一二八及一三六頁）懷忠係康熙五十四年以精明外科醫理，奉召進京，內廷行走。卒後，帝賜葬銀二百兩。

安泰修士 Rousset 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九）入中國。康熙帝最後數次巡行，修士曾扈從。精醫，藹然可親，清晨與午後，往往戶限爲穿。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卒。（費賴之原書六六二頁）任廣儲司員外郎。（見上）

以上四修士，羅德先嘗爲康熙治疾，獎諭訓曰醫術在內廷行走，卒後得旨褒揚，可謂優異。羅懷忠亦因精明醫理，奉召進京，又不時奉召入宮，安泰與羅德先又皆從帝出巡，其爲御醫也無疑。此外乾隆間在京中行醫者尚有二人，一爲修士羅啓明 Fr. de Mattos，十六年（一七五一）入中國，至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去世。一爲巴新修士 Bazin，三十年（一七六五）入中國，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去世，巴修士乃乾隆帝專聘爲第五子醫[illegible]署，後即在宮內供職。（費賴之原書八六八，九六二至九六四頁）

二、木樨香露與玫瑰香露

從植物中取露之法，我國古本有之，惟紅樓夢所記者則爲外洋貨，或爲仿外洋而製者。明末西洋教士龐迪我 Pantoja 曾以製露之法傳徐光啓。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徐光啓家書中有云：「龐先生教我西國用藥法，俱不用渣滓，採取諸藥鮮者，如作薔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臟腑肌骨間也。」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熊三拔 S. de Ursis 著泰西藥露說一卷，民國二十四年友人向覺明先生發現，乃一鈔本。附鄧玉函 Terrenz 所著泰西人身說概後。關於蒸溜及製造藥爐等器，均有圖說。玉函本人亦精醫，在帝京時曾自撰「嘗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將遍而譯取之，以驗成書，未成而卒」。南懷仁 Verbiest 西方要紀述藥露尤詳，曰：「……其名玫瑰者最貴，取煉爲露，可以調飲，可當藥。」是即紅樓夢中所稱「玫瑰香露」也。又曰：「醫有內外二科，內科又分爲二：一者以草木爲藥者，亦有兼用金石煉藥之藥者。……有製藥一家，專煉藥草之露，如玫瑰薇露之類，特取其精華，而棄其渣滓，則用藥寡而得效速。不害脾胃而漸漬消除。中國嘗有用此法者，如生紫蘇煉爲露，置酒中少許，飲之，則悪氣頓除而身生快，比用本草更速而驗矣。當時稱露者猶今人稱水也，故藥露即今人所謂藥水。尤侗外國竹枝詞，歐羅巴曰：「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響自高低，阜城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註曰：「國中玫瑰花最貴，取蒸爲露，可當香

藥。」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謂：「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計，永片油以匣計。」西洋貢獻，在當時亦為貢品，康熙二十五年之荷蘭貢品，即有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罎。（見前）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葡使麥德樂進貢方物之第二十箱「內裝水晶箱一個，內裝各品藥露五十四個小玻璃瓶。」（見前）第二箱所裝者即為此五十四小瓶藥露，別無他物，且箱內有箱，而內箱又為水晶所製，可見其珍重也。乾隆十八年葡使禮物中亦有「各樣葡萄燒酒蒸的香露，各樣藥料油」（見前）可見乾隆以前，藥露在中國，厥亦惟宮中有之。正教奉褒第三冊記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三月十一日帝巡幸至山東濟寧，西班牙教士利安寧 Em. de S. J. Baptista「將西洋土物四種，趨往獻呈，上收取水晶瓶一對。奉溫諭，收一件猶如全收了。」錄此以爲葡使進呈之水晶箱作參證也。

9，葡萄酒

以葡萄爲酒，我國漢時已有之，「葡萄美酒夜光杯」，最爲國人所樂誦。惟當時之葡萄來自甘肅西部及新疆一帶，遠則產自西域，而寶玉所飲葡萄酒，則紅樓夢亦說明其爲西洋物也。西洋葡萄酒最初惟教堂中有之，西洋教士時以之進呈御用，而皇上亦偶或賜與大臣同飲，大臣以得葡萄酒爲榮，視爲異數也。關於葡萄酒之史料甚多，今茲不過摘錄一二耳。

康熙二十五年荷蘭貢品中有「葡萄酒兩桶」。（見前）故宮博物館出版文獻叢編第十二輯，有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三月江西巡撫郎廷極奏報西洋人殷弘緒進酒摺，及同年三月二十六日馬若瑟進酒摺，史料旬刊第三期謄天七十三頁有兩廣總督趙弘燦奏西洋人進洋酒等物摺，奏文過長，茲將當時各西士進物之種類及瓶數，列表如後：

饒州殷弘緒　西洋葡萄酒六十瓶
　哈爾谷斯默一瓶
　珠穀臘八錫瓶（按即巧克力糖）
建昌馬若瑟　格爾默斯一瓶
　洋酒四瓶
臨江傅聖澤　洋酒八瓶
撫州沙守信　洋酒六瓶
九江馮秉正　洋酒六瓶
贛州畢　安　洋酒二瓶
　德利亞爾噶一盒
南昌穆泰來　洋酒二瓶
廣州穆德我等　酒壹箱

洋痢藥箱
又 畢登庸 酒壹箱
又 景明亮 酒壹箱
藥露瓶

殷弘緒 Fr.Xav. d' Entrecolles，馬若瑟 J. de Prémare，傅聖澤（為傅聖澤之誤）Foucquet，沙守信 E. de Chavagnac，馮秉正 J. de Mailla（以上皆法人）[illegible]安，不詳。穆泰來當為 A. de Simoens，費賴之（見上）原書第一冊三九七頁記彼於一七一〇年至一七一一年（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年）在南昌，與文獻叢編發表之奏摺相合，而其外國名字中之 Bo字譯為穆姓，尤為可能。亦葡人也。穆德我，不詳；畢登庸 da Costa，葡人；景明亮不詳。

次年，兩廣總督趙弘燦，廣東巡撫范時崇，又奏有西洋人李國賢交到進皇上葡萄酒壹百瓶，云係西洋人何大經所遺，外書一封，與京中天主堂紀姓者。按李國賢亦作國正，葡人，原名 Osorio，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謂一七〇六年後，即不詳其事蹟，據此，則彼在一七一〇年（康熙四十九年）固仍在人間也。何天經亦葡人，原名 Pinto；在京之紀姓，應為紀理安，德人，原名 Stumpf，其人頗為康熙信任，亦常扈駕出巡。（以上見費氏原書四六四，四六五，四七三等頁。）

康熙四十八年四十九年何以再諭許洋人進西洋酒？正教奉褒第二册記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七〇九年三月六日）上諭：「西洋人自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利類思在廷効力，俱勉力公事，未嘗有錯。中國人多有不信。朕向深知，真誠可信。即歷年以來，朕細訪伊等行實，凡非禮之事，斷不去做，豈有過犯可指。前者朕體違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補之物。高年飲此，如嬰兒服人乳之力。諄諄泣懇。求朕進此，必然有益。朕鑒其誠，即准所奏，每日進葡萄酒幾次，甚覺有益，飲膳亦加。今每日竟進數次，朕體已經大安。念伊等愛君之心，不可不曉諭朕意。今傳衆西洋人，都在養心殿，叫他們知道。欽此。」梵蒂岡圖書館（[illegible]）亦有同樣之文獻，惟詞句略有不同。其主要之語句如：「一一朕體違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好葡萄酒，乃為高年人大補之物，即如嬰孩子飲乳之功，諄諄泣奏，求皇上進葡萄酒。朕即准其所奏，每日進葡萄酒幾次，甚覺有益，飲膳亦好。今每日竟進數次，朕體已經大安，念爾等為朕之誠心，不可不曉諭。」實此一諭，而洛當西士即納進酒，足見當時國勢之盛。且此諭下於正月二十五日，而三月間即廷樞即奏報趙弘燮進酒，硃時間上亦云進矣。據趙弘燮奏摺，是年正月二十八日趙昌傳旨與直隸總督弟男子侄：「以後凡本處西洋人所進皇上所用物件，並啓奏的書字，即速着妥當家人，騎包程騾子，星夜送來，不可誤了時刻！欽此！」康熙下諭與西教士之進葡萄酒正當曹寅卒前三年，斯時曹寅江寧織造。又文獻叢編第十二輯並有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二十

毛曰「奨請以曹寅之子曹顒仍爲織造」，亦可推寅卒於是年，且可知曹顒剛在江南通志中所得曹寅任江寧織造於康熙五十二年之說，誠不可靠也。附記於此。

上海徐家匯藏書樓吳漁山三餘集鈔本，有代[illegible]西先生謝恩賜飲葡萄[illegible]曰金，有句云：「丹陛臚呼二遠臣，葡萄滿賜一杯春。」陳垣先生撰吳漁山先生年譜列於康熙二十八年。此所謂葡萄漿者必非西洋葡萄酒也，否則，又何必以西洋之物轉賜西洋人？且若二十八年康熙已獲嘗葡萄酒，何能待至二十年後方須非常徵求也？

惟當時帝王對外人所獻之物，頗具戒心，觀於康熙上諭，彼對葡萄酒必待近侍飲久之而後進，可知也。故外人亦不敢冒昧送呈。實則，清初士大夫，凡與西士有交往者，欲嘗葡萄酒，亦非難事也。戰前，陳援菴先生曾得清初名畫家王覺斯（鐸）之立軸，上書贈湯若望詩一首，述及在若望處飲葡萄酒事。陳先生曾用送友好，余亦得一軸，戰後遺失，詞句亦不復記憶。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彭孫貽撰客舍偶聞記南東范吏部孫公在湯若望處飲葡萄酒而大醉事，蓋猶在順治間。其詞極有趣，亦爲錄出：「湯若望……取西洋蒲桃酒相餉，盛一匣餽饗，又一匣出玻璃瓶，高可半尺，大於碗，取小玉杯二，瑩白無瑕，工巧無匹。謂吏部范公曰：聞公大量，可半杯。若復斟少許相對，吏部以爲少，若望笑曰：此不可輕飲，以舌餂濡之。孫公如言，纔一沾舌，毛骨犁然若驚，非酒非香非味，沁入五臟，良久遍體，裸裎分飲半杯，仆不能起。若取而取弱各半一樽，身柔綏，須扶乃登車。後從曾讀[illegible]

的佳釀。」

順治帝曾飲西洋葡萄酒與否，不可考。惟康熙四年荷使來華進貢方物，其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諸類所載者，有「紅寶白露葡萄酒四十八瓶」（見前），而乾隆十八年荷使亦進有「各樣葡萄酒」（見前）。其爲舶來品可知。

10、暹羅茶

掌故叢編第二輯載理藩院諭旨一道，略曰：「據管同會暹羅國事務大臣等人同暹羅進貢使臣，問該國所稱女兒茶原有甚麼用處？該兒茶如何做成？其色同否？還有風與香是何物？出產何處？再有閑話著問者，一並細細寫記，報上來罷。」鳳姐以暹羅貢茶送黛玉，必此物也。寶玉謂平時所飲者有女兒茶，但第十七回寶玉考證「女兒棠」之來歷曰：「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則女兒茶亦應有其名矣。

康熙時，西洋人經暹羅而來中國，或由中國而往暹羅者，頗不在少，然精暹文者，則遍查不得。

11　孔雀氅與鶴氅

紅樓夢中之外國衣料，若洋縐，若洋錦，若哆囉呢等，猶爲當時豪富所可染指，非絕難得者。惟寶釵之鶴氅與寶玉之孔雀毛氅，即在其他同時代之書中，亦無同名之物品。天

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二〇九頁）記一五八三年一月六日（萬曆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肇慶府廣東總督陳瑞「以二位司鐸遠道來臨，覺得是中國的最大榮幸，並且因爲他們有求必應，又求他們差人從澳門給我十件最美麗的羽鍛來，以爲送入北京作禮品。」殆即孔雀氅或鶴氅之類也。二司鐸者羅明堅與巴範濟 Pasio 也。王士禛香祖筆記亦有一條曰：「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毳毛織成。」或曰：羽紗羽緞，皆毛織物，今稱嗶嘰是也。但康熙二十五年荷蘭貢品分列「鳥羽緞四疋，新樣嗶嘰緞八疋，中嗶嘰十二疋」；康熙三十九年冬十月，帝獻祝皇太后六十聖壽之禮物中，亦分列「羽段一九，哆囉呢一九，嗶機段一九」，可知非一物矣。嗶機即嗶嘰也。

12 西洋畫

西洋畫在清初頗爲習見。魏叔子集（魏禧）答曾君有書曰：「王生來，承賜泰西宮畫圖，甚奇妙。藉懸勺庭中，日觀之，常若欲入而居者。」其他記都中天主堂西畫者尤多。如汪啓淑水曹清暇錄卷四，謂阜城門天主堂「堂中佛像，用油所繪，遠望如生。」而乾隆十八年徐崑撰遯齋偶筆卷下則謂天主堂壁畫曰：「上層供繪人物，或三五歲稚子，神態俱活，皆有肉翅能飛。」又曰：「盈尺孩童，圓渾活跳，洵稱絕筆。」嘆賞之情，與劉姥姥在大觀園中見洋畫時，誠無二致。其他如姜紹書之無聲詩史，鄒一桂之小山畫譜，王士禛

之漁北隅談，趙翼之簷曝雜記，袁棟之書隱叢說，顧起元之客座贅語，吳長元之宸垣識略，張庚之國朝畫徵錄等，不能備述。但西洋畫之大有佳者，皆為宮中所得。乾隆時且徵西士如郎世寧 Castiglione 艾啓蒙 Sichelbarth等，居如意館，專司繪畫。高士奇蓬山密記述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三月二十一日至暢春苑觀劇處，「高台宏麗，四周皆樓，設玻璃窗。上示壁間西洋畫。」四月十八日帝又對士奇言：「西洋人寫像得顧虎頭神妙。因云有二貴嬪像，寫得逼真，爾年老人在供奉，看亦無妨。先出一幅，云此漢人也；次出一幅，云此滿人也。「十九日，賜士奇西洋畫三幅。可見康熙時已有西士為宮中嬪妃畫像，而西洋畫得入宮中者，為數亦必不少。

（五）紅樓夢人物與外國人之關係

一部紅樓夢中，所有人物不為不多，品類至繁，外國貨物亦充斥書中，獨外國人則從未出現，如有，則亦惟寶玉口中之俄羅斯裁縫，寶琴口中之眞眞國女孩而已。惟俄國裁縫，寶玉明言無處可求，而眞眞國則又因眞無其國，故強名之曰眞眞。是以激昂言之，紅樓夢中實無外國人也。惟第十六回，鳳姐說：「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指接駕）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可知王氏祖先必有及見外人者。但上述四省，惟滇省為暹羅及安南進貢路線，餘三省皆為西洋人朝貢必經口岸。吾人讀上節論外國物品之來歷，知當時外國

貢之來源不外二途：一爲外國使臣進貢，一爲外國教士送呈；以理度之，紅樓夢撰人應與外國人有接觸，但紅樓夢之外國地理知識旣異常膚淺，而書中亦並無外國角色。胡適之先生考曹雪芹家世，以爲與紅樓夢最有關係者應爲雪芹之祖曹寅，寅字子清，號楝亭，正白旗漢軍。能詩，藏書甚富，又嘗刻古本二十餘種，曾任蘇州織造四年，江寧織造二十一年，同時並兼任四次兩淮巡鹽御史。寅任江寧織造時，適值康熙帝最後四次（第三次至第六次）南巡，即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及四十六年（一七〇七），皆以織造署爲行宮，寅遂有四次接駕之機會，紅樓夢第十六回曾由鳳姐與趙嬤嬤提及此事。按康熙南巡，凡有外國教士之處，教士皆趨謁聖駕，獻呈物品，但此四次則不見有外國教士在南京接駕之記載。南京教士之接駕，可考而知者，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及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兩次。二十三年接駕者爲法教士汪儒望 Volat 與畢嘉 Gabiani。帝並索閱耶穌像，畢嘉乃進呈十字架，上有耶穌被釘像。帝注視良久，仍還畢嘉。（見費賴之原書二八二及三一七頁）正教奉褒第二册八十六頁記述尤詳。二十八年陰曆二月二十五日畢嘉與洪若在上方橋冒雨跪迎，二十六日晨，二人赴行宮（即織造局）請安；二十七日晨，帝賜白金；亭午，二人赴行宮謝恩，並獻方物十二種，蒙收半數。帝又取求風溫表二具，並詢問晚間可見老人星否。二十八日晨二人再趨謁行宮，以前晚測驗所得之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繕具黃册，進呈御覽。三月一日，帝

賜行賜二教士袞古珍饌三盤，並傳旨不必往行宮謝恩，即在天主堂前謝恩可也。初五日，二人趕抵揚州灣頭送駕，帝命畢嘉隨侍御艦而行，並賜綢緞四色。（摘錄正教奉褒第二冊九五至九八頁）耶穌會士通訊集 Lé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IX.P.493亦記曰：康熙帝入通濟門，畢嘉與洪若跪迎於秦淮河上方橋上，（在通濟門與夾岡門之間）。帝騎馬，侍衞騎隊凡二三千，儀仗甚盛，所費不貲。以織造局為行宮。洪君記曰：帝居南京時，曾遣人往行宮，帝亦日遣一二侍臣來堂，並派人問南京可見老人星否。答以入晚即現，帝乃於某晚特至觀星臺測望。按康熙問老人星事，王氏東華錄亦有記述；而康熙以織造局為行宮一事，乃得外文材料為參證，亦甚可喜也。顧頡剛先生謂「康熙南巡，除第一次（按即康熙二十三年）到南京駐蹕將軍署外，餘五次均以織造署當行宮。」今據當時躬逢其盛之西教士紀載，則第一次南巡，康熙亦以織造署為行宮也。余近於友人夏樸山先生處，得見道光本張穆編閻潛丘先生譜（八十五頁附註）知曹寅之父名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與顧頡剛氏在江南通志中查得曹璽自康熙二年即任江寧織造官不合）則汪儒望、畢嘉、洪若等在南京接駕，正曹完璧任江寧織造時也；畢嘉與洪若既屢往行宮（織造局），曹完璧豈有不見西洋人之理？惟是時遠在雪芹删改紅樓夢之前六七十年，雪芹祖曾祖之事，宜乎其不詳也。如以曹雪芹為賈寶玉，則曹璽當為賈政，曹寅為賈代善，而曹璽正為榮國公矣。（按閻潛丘先生年譜，尚有關於曹寅材料，今從略）

然曹寅四次接駕時，南京雖無西教士與其盛，但修士羅德先既隨康熙作十次巡行，而修士安泰亦在最後數次巡行時同行，曹寅至少當能與此二西人晤見也。

又按道光前，宮中修理鐘表者，概由歐洲司鐸及修士任之。最早者可推及明末之湯若望，最後者或即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去世之法國巴嘉祿：汪達洪又謂國內之王公鉅卿，時時請西人爲彼等修理鐘表，（皆見湧西節）然則榮寧二府鐘表之修理，亦不能不借手於當時之西洋教士矣。曹雪芹生時，家道已中落，或不能及見西人，況康熙最後一次南巡時，雪芹（寶玉）未生，故鳳姐亦自恨不早生二三十年，目覩盛典也。但自曹頫（賈政）以上，固應與西士有往還也。

（六）結論

一、此書一部份內容雖爲曹雪芹之自傳，然其間實雜有清初宮廷暨達官貴人之男女情史。此說尚早有人言及，但觀書中外國物品之記敘，乃益可徵信。

二、寶玉雖爲雪芹之寫照，但亦不以雪芹一人爲限，自陳援菴先生證明順治帝有出家之念及落髮之事後，可知寶玉爲順治化身之說，亦非無因。而寶玉對於信用西藥之態度，則復與康熙帝極相彷彿；寶玉房內之自行船，似亦非康熙帝不能有。

三、書中一部份老年人物必曾與西人有交往，但曹雪芹既不及見西人，書中亦無外國角色，對外國地理知識，又極模糊，然其祖曹寅，曾祖曹璽則偶有晤見西人之機會，倘

實材料必得自雪芹先人，由雪芹删改而成，而雪芹在書首，對此點亦言之確。

四、書中之西洋物品，皆非出於虛構者；物品之來源雖非一途，但來自西洋教士者必佔多數。蓋貢使寥寥可數，而又稍留即返，不若教士之常居中國，並有在「內廷行走」者，且教士絡繹而來，故西洋物品之傳入宮中及顯宦之手，亦源源不絕也。

五、與書中歷史事實有關者，曹璽亦爲主要人物，不應漏置曹寅也。

（附識）關於外國貢物之史料，不能盡述，本文所引，僅以與紅樓夢中外國物品有關，及近年在國外新發現之一部份罕見史料爲限。粵海關志記清代各國貢品甚詳，本文亦不盡引。

（附錄）

1.順治出家問題（見陳垣撰「湯若望與木陳忞」第二章第三節，載輔仁學誌第七卷第一第二合期）

順治出家之說，不盡無稽，不過出家未遂而已，順治之知有佛法，自憨璞聰始。憨璞聰者百癡元嗣，費隱容孫，容與木陳俱密雲悟嗣。密雲曾著辨天說，費隱曾著原道闢邪說，皆闢天主教，淵源所自，木陳與憨璞固與天主教夙不相容者也。

順治十四年十月初四日，憨璞召對萬善殿。上問從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傳，日對萬機，不得閒暇。如今好學佛法，從誰而傳。對云，皇上即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

善根，大智慧，天然種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學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其說甚誤，爲帝所喜。又能結納太監，有自作詩爲證，已見前篇。木陳重修城南海會寺記云，海會寺剏於嘉靖乙未，至順治丙申，歲久寺頹。都人士謀欲鼎新，乃請今憨璞聰公住持是刹，禪衆川趨，宗風大振。丁酉上狩南苑，因幸寺，延見聰，復召入禁庭，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明覺師號。日昨上謂忞曰，朕初雖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憨璞始。憨璞固大有造於祖庭者也。

自是而後，玉林琇、茆溪森、木陳忞、玄水杲先後至京，有三世奏對錄。三世者，琇爲一世，森二世，聰杲三世也。北遊集載上一日語師，朕再與人同睡不得，凡臨睡時，一切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着，若聞有一些氣息，則通夕爲之不寐矣。師曰，皇上夙世爲僧，蓋習氣不忘耳。上曰，朕想前身的確是僧，今每常到寺，見僧家明牕淨几，輒低回不能去。又云財寶妻孥，人生最貪戀擺撲不下底。朕於財寶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覺亦風雲聚散，沒甚關情。若非皇太后一人罣念，便可隨老和尚出家去。師曰，剃髮染衣，乃聲聞緣覺羊鹿等機，大乘菩薩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諸宰輔，保持國土，護育生民。不厭拖泥帶水，行諸大悲大願之行。如祇圖清淨無爲，自私自利，任他塵劫修行，也到不得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現身帝王，則此番召請耆年，光揚法化，誰行此事。故出家修行，願我皇萬勿萌此念頭。上以爲然。

此順治想出家之最初見於記載者也。時在順治十七年春夏之間，董妃寵方盛，何以忽萌此念。或疑其體力不支，故為此消極之計，亦頗有見。北遊集載上一日語師，老和尚許朕三十歲來為祝壽，朕或可望。若老和尚來祝四十，朕決候他不得矣。師曰，皇上當萬千歲，何出此言。上彈頰曰，老和尚相朕面孔略看，攜侍臣曰，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軀，如何挨得長久。師曰，皇上勞心太甚，幸撥置諸緣，以早睡安神為妙。上曰，朕若早睡，則終夜反側，愈覺不安，必聽樵四鼓，倦極而眠，始得安枕耳。師曰，乞皇上早珍重，天下臣民幸甚。

按是年順治才二十三，自以為可支持至三十歲，則體力亦屬大虧。本年八月，經有董妃之痛，經此打擊，勢不能支矣。湯若望回憶錄云，此後皇帝便自己完全委託於僧徒之手，他親手把他的頭髮剃去，如果沒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時，他一定可充當了僧徒了。據湯若望所記，與續指月錄玉林琇傳所載，微有不同。然順治將髮剃去，則為歷史。續指月錄云，玉林到京，聞森首座為上淨髮，即命衆聚薪燒森。上聞，遂許蓄髮乃止。據此，則是茆溪森為上淨髮，非上自剃之也。玉林語錄載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內西苑萬善殿，世祖就見丈室，相視而笑。世祖謂師曰，朕思上古，惟釋迦如來捨王宮而成正覺，達磨亦捨國位而為祖，朕欲效之何如。師曰，若以世法論，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聖母之心，下以樂萬民之樂。若以出世法論，

皇上宜永作國王帝王，外以護持諸佛正法之輪，內住一切大權菩薩智所住處。上意欣然聽決。

此文最可注意者，為相視而笑四字，蓋是時上首已禿也。雖許蓄髮，而出家之念未消，故復以為問。玉林所答，與木陳略同，不外帝以痘崩，出家之事遂不果。故謂順治為出家未遂則可，謂其無出家之意，無出家之事則不可。而論者猶多謂一夫一妻之制，皇帝必不能行。則試問出家易乎，一夫一妻之制易乎。既可以出家，棄妻子棄天下如敝屣，獨不可守一夫一妻之制乎。必不然矣。

2.順治出家（見陳垣撰「語錄與順治宮廷」二，戊，順治出家。輔仁學誌第八卷第一期）

順治出家，為自來一種傳說，彼據清涼山讚佛詩等模糊影響之詞，謂順治果已出家者固非，然謂絕無其事者亦未為的論。續指月錄玉林傳注明謂森首座為上淨髮，湯若望回憶錄亦記董妃薨後，皇帝把頭髮剃去，則順治實曾落髮。惟康熙本茆溪語錄並無此項記載，蓋此舉為玉林所不滿，順治之髮，既已去而仍留，故茆溪門人亦諱之，惟卷三羅人琮撰塔銘，載茆溪臨終偈中，有一度字，稍透漏其消息，真可謂一字千金矣。偈云，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強遭瘟，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惱，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國裏度天子，金鑾殿上說禪道，呵呵，總是一場好

矣。龍藏本亦附此碑銘，惟度天子作見天子，金鑾殿上作萬善殿中。見與度意義頓殊，見天子可有萬人，度天子只一人，顯為有意改易。若黑豆集正源略集引此偈，無此二句，亦以見天子事屬平常，故略去，而不知原本乃作度天子也。一字之微，關繫史實若此，讀書能不多聚異本哉。

按陳先生第一文所根據者為「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及楊丙辰譯德人魏特著湯若望傳；第二文（引文）所根據者為康熙杭州圓照寺刊本「敕賜圓照茆溪森禪師語錄」。

清初宦遊雲南之猶太人

開封猶太教寺（即一賜樂業教寺，昔亦名清真寺）舊有牌坊一，坊有橫額（註一）曰：

敬天祝國

右題：

大清康熙拾柒年孟 冬三月吉旦

左題：

文林郎知雲南雲南府

誥贈宜良縣知縣奉政大夫 趙光裕立

福建兵巡道按察司僉事

上海管教士開封猶太教文獻考P. J. Tobar S. J. 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第九頁疑「僉事」下遺「趙映乘」三字，蓋坊上尚鐫有其他二猶太教捐助人之銜曰：（原係橫列，首三行三字，餘皆二字）

賜進士誥封奉政大夫分巡福建漳南兵備道按察司僉事趙映乘

恩進士誥封文林郎知雲南雲南府[illegible]縣知縣加一級趙映斗立（多南雲二字）

光裕、映乘映斗父，以子貴，贈封如子官。管教士不知此例，乃有上述之疑。牌坊之

陰，光裕亦題一額曰：

尊經修紀

右題：

大清康熙十七年孟冬之吉

左題與前同，但『知雲南』下少『雲南』二字。

光裕曾否隨子映斗到滇，不可必，姑繫於此。

舊寺第二門有額（註二）曰：

敬畏昊天

右題：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季春吉旦

左題：

文林郎知雲南府宜良縣趙映斗謹題

殿外側窗旁，並有映斗題聯（註三）曰：

識得天地君親師不遠道德正路

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聖賢源頭

映斗為映乘弟，康熙二年重建清眞寺碑言之甚明：『大參趙映乘著聖經紀蹟，乃弟映

斗復著明道序十章，經文於是備，宗旨於是明」。映斗蓋亦善文而通經者。碑文曰：「迺弟映斗[illegible][illegible]入汴，相與從荆棘中，正其故址。」復曰：「計自滄桑之後，趙承基，映斗，正其址以啓其端，趙映乘，高登魁等，捐資起建以成其事，有功於寺。」映斗蓋可謂開封猶太教復興之祖矣。

今試舉滇省志書中有關映斗各條述之：

雍正雲南府志卷十一官師志二，昆明縣知縣「趙映斗，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拔貢，康熙二年任。」

又同志同卷：「趙映斗，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拔貢，康熙六年任宜良縣知縣。」

光緒昆明縣志卷五官師，國朝官制題名：「趙映斗，祥符人，拔貢生，康熙二年任。」

按昆明縣知縣，在映斗後者爲劉丕雲，遼東人，官生，康熙七年任。並見府志。是趙映斗知昆明縣爲自康熙二年至六年也。

民國續修宜良縣志，卷八秩官志：「趙映斗，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拔貢，康熙五年任知縣。」康熙五年當爲康熙六年之誤。乾隆志卷之二秩官，不著年代。

映斗來宜良之始，値亂後裁所歸縣。但終映斗之任，宜良倘無事故。縣志卷三建置志沿革：「康熙四年，竹子山野賊李忠義等，聚衆攻城，都統何進忠等勦平之。五年裁所歸

縣。」

映光雖猶太教徒，然亦尊孔。民國宜良志卷五，學校志廟學，學宮：「康熙六年，原任守禦所張雲程，知縣趙映斗，教諭馬任，及紳士周澤溥，汪光燦，邴志洸等，建啓聖祠。旋遭兵燹。」乾隆志卷之一學校，學宮，僅曰重修，無「建啓聖祠」四字。雲南府志亦載其重修文廟。卷之九文廟（宜良）：「本朝康熙六年，知縣趙映斗，教諭馬任大重修。」

映斗之知昆明縣宜良縣，並見雲南通志卷一二八秩官志二之十，官制題名十一。民國宜良縣志卷八秩官四題名，載知縣王寧道，康熙十年任。故康熙九年映斗題額仍署知宜改縣。可知映斗宦遊於滇，始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終於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康熙二年前，康熙九年後，映斗是否在滇，蓋不可考。

清初雲南有與猶太教八種相善之名宦名李光座者，開封康熙二年重建清眞寺碑記即彼所書，自署「欽差道士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書丹。」

寺中亦有光座題額（註四）曰：

無象法宗

右題：

福建布政使司分守興泉道右參政李光座題

左題：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秋吉旦

此猶管教士法文本排列而言，康熙九年等字樣應在右側。陳援菴先生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東方文庫本）疑「無象法宗」四字當作「法宗無象」，蓋因為傳寫倒置之誤也。

光座亦祥符人，與趙氏兄弟為同里，又與映斗同官雲南，與映乘同官福建，趙氏兄弟似不能不受其提攜，况李亦一賜樂業大姓，開封弘治碑之十七姓，康熙碑之七姓（俱詳原文）皆以李氏為魁首，故或疑光座亦一賜樂業人，陳援菴先生非之。然光座敬教之事，寂無聞，但與一賜樂業關係之深可斷言也。則光座在滇事蹟，儻亦為留心雲南猶太教史者所樂聞乎？

雍正雲南府志卷十一官師一：「李光座，河南祥符人，已丑進士。順治十七年任雲南督學，豐度端凝，衡鑑分明，試士得人，西南文教，由此振興。」

光緒雲南通志卷一二五秩官志四之一名宦上：「李光座，河南人，順治己丑進士，十六年任雲南學政，試士得人，西南文教，由茲振興。」

又卷一二七秩官志二之十官制題名上：「李光座，順治十七年任，詳名宦。」

道光通志卷一二六秩官志四之一名宦上，同，但引舊志。北平圖書館有康熙志，藏於滬上，不獲及考。光座任雲南督學，有順治十六年十七年二說，未詳孰是，然尚待攷察。

文教，要爲治本省文化史者不可不知，而映斗在宜良，與士紳修文廟，殆亦爲其流風所被歟。

論曰：雲南雖山國，而宗教獨盛，佛教無論矣，回教之瞻思丁，也里可溫之馬薛里吉思，天主教之和德里（或譯奧代理各），皆嘗來此佈化。猶太教重保守，故映斗在滇於教之學功不著，然亦安知非吾人孤陋寡聞有以使之然乎？管教士稱映斗爲中國猶太人，蓋稱言其漢化之深也。豪寓滇僅數年，於滇中史事都無所曉，茲篇之作，承通志館吾家國瑜先生借閱志書，情實可感，邦人賢達，幸辱教之。

（註一）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抄本。並見一七二一年 P. Domenge 所繪清眞寺圖，現藏巴黎聖熱納維愛物學校圖書館。

（註二）同上。

（註三）同上。並見一八五一年耶穌教牧師史密司調查團報告書 The Jews at Kae-Fung-Foo 及河南米朗傳教會司鐸拓本。

（註四）是額不知原懸於何處，爲 E. Deveria 據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抄本所錄

附重修宜良縣學宮碑記

原任宜良縣守禦所三秦張公諱雲程

文林郎宜良縣事大梁趙公諱映斗

重修宜良縣學宮碑記

宜良儒學教諭三韓馬公諱任大

宜良縣典史昆池何公諱興邦

原碑現存宜良縣城內雉山小學閱書室內，廣二尺四寸，高六尺，碑額嵌入壁內，不可見，亦無年號。其左有康熙六年助修學宮姓名碑記，右爲乾隆二十一年宜良縣學宮永遠碑記。

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

民國十餘年時，國人言出洋留學史者，往往起自光緒朝。自舒新城著近代中國留學史，始上溯道光二十七年赴美之容閎。後張星烺撰歐化東漸史，向達編中西交通史，更遠及清初，然語焉不詳。余年來以關於此類之史料，按圖所獲，逐一劄記，並更蒐集而整理之，草爲是篇，唯內容以歐洲爲限，然納玻利之華書院之華生，其數達一百有六人，而亟作以限於參考材料，僅查得半數。題曰『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糾而正之，端在大雅。

(三) 留學生小傳通例

(1) 鄭瑪諾

「鄭字維信，廣東香山澳人。自幼往西國，在羅馬京師習格物窮理超性之學，並西國語言文字。深於音樂，辨析微茫。康熙十年辛亥入京，十三年甲寅卒，墓在阜城門外滕公柵欄。」(註一)

費賴之 P. Pfister 曰：吾人對於鄭瑪諾所知者，僅其墓碑記文耳。其西名曰 Emmanuel de sequeira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生於澳門，與衛匡國 P. Martin Martini 同往羅馬，時年尚幼。後入耶穌會，晉司鐸，為華人中入會之第一人。其神哲學皆卒業於羅馬公學。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回華。教難後，隨 P.Grimaldi (閔明我) P. Heratrcht (恩理格)至北京，閱二年卒，年僅三十八歲。時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五月二十六日也。(註二)

(2) 沈福宗

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隨柏應理 P. Couplet 至歐，入里斯本初學院，後似曾至羅馬求學。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偕 P. Stumpf 同舟回華。(註三)向達君謂：「此外十八世紀到歐洲去的中國教士，還有許多。在馬[illegible]賢以前同柏應理到英國的，有江寧人 Ching,

Foua Tsoung」（註四）嘗同爵一人，惟云十八世紀，則誤也。沈曾到英，韋拙作拉丁文傳入中國考。有西名曰 Michel Alfonso

（3）樊守義

樊幼時曾遊學羅馬，歸國後，跋涉冀魯關外等區，歷年久遠，劬勞卓著。卒時年七十一歲。（註五）樊名亦作守利（和），又作詩義，字利如。絳州人。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二）六月十三日生。求學都靈羅馬等處。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入耶穌會，至里斯本。與 P. Provana（艾遜爵）回國。艾卒，帝欽召至京，探聞消息。旋即在北京附近傳教，北達長城，南迄山東。雍正乾隆年間，與奉教宗室蘇努極相得。雍正三年（一七二五）爲蘇努之幼子及閤蘇感化而準備入教者四十人行洗禮。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蘇幼女及某夫人亦受洗於樊手。後並喬裝商人，遍歷滿洲。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付洗者計成人二百九十八名，嬰孩三百十五名。乾隆八年（一七四三）至正定威縣，十八年（一七五三）二月二十八日卒。（註六）

（4）吳露爵王雅敬谷若翰殷若望

露爵松江金山人。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生，馬 賢 P. Ripa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回歐，露爵亦同至納坡利。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三月十八日晉司鐸。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八月卒於羅馬。（註七）

雅敬為江蘇浦東川沙人。康熙末曾至羅馬，後回國，未幾即謝世。川沙莊尤升先生家藏耶穌救世主木刻像有雅敬題辭，書法絕佳，時為乾隆元年。（註八）

聖家書院名錄云：王若亞敬，川沙人，馬國賢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遣四童赴義大利求學，王任教師。四人中谷若翰最長，王陪行至義，殷與谷二人以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一月十七日卒業。五月十五日至羅馬傳信部受試，主考者紅衣主教 Cord. Petra 及神學專家三人，成績優異，紅衣主教擁抱二人，並稱願擢殷若望為主教，若望答曰：予尤願為信仰而流血，以代紅衣主教之紅衣。三日後，教皇亦賜召見，溫語祝賀（見P.D'Elia著(atholic natice Episcopacy in China P.49)同年九月十日五人同返祖國，殷若望則以次年十一月十五日卒於湖南湘潭，尚未抵指定地也。谷則傳教四川，後至直隸。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北京。王回國後以傳教員終其身。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北京。或云墓在南京，殊難致信。蓋南京非其故鄉，而太平軍後，亦不易訪見也。吾人對王氏所知者盡於此矣。且與川沙人傳述亦合，唯其人實非司鐸也。（註八）

宜昌趙聖修主教 EP.Noel Gubbels稱殷係直隸人，為聖家會之第一華籍司鐸。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生。一七一四年（當為一七二四年之誤）與馬國賢同赴歐洲。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晉司鐸。次年十一月十五日就葬。（註九）向達中西交通史稱：「馬國

寶曾帶了五位中國青年到意大利，後肄業於學院。（中國學院即聖家書院）其中著名的是顧約翰（John Ku）和殷約翰（John In）兩人。蓋即谷若翰與殷若望也。

（5）劉必約等八人

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三月，納玻利復有中國青年學生八人卒業。時教皇方以中國教會之衰落及西洋教士不能自由傳教為深憂，乃命召八人至羅馬，委紅衣主教四人加以甄試。試畢，教皇大為嘉獎，當在教廷齊集八人面前，對納玻利書院，盛加稱譽。其後，郭督陝籍 Vitale Kouo（中國姓氏不詳）成都之趙多默，湖廣之趙西滿，Chan Tcheou（常州?）之Paul Tchay 等四人回國工作。又 Vitale Kouo之年事較高，乃預前為主教，並指定為未來之川省總主教。（見李安德著拉丁文日記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八年，二四九至五〇頁）

（6）康某劉保祿藍方濟陶某及曹貌祿

康生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乾隆五年（一七四〇）離國，年纔十二，習法文，進步奇速，同學咸樂與之遊，其熱誠亦為人敬重，獲獎甚多。十三年（一七四八）入初學院，得疾，偕同友劉保祿並錢德明 P. Amiot 回國，在舟中六月。十五年（一七五〇）六月三十日晚七時卒，時舟在孟加拉附近。嘗以拉丁詩作旅行記，長至二百頁，不乞助字典，為錢德明所珍藏，嘆為奇才，稱與歐洲大詩人作品相等。

劉保祿，宣化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入會，回國後，傳教北京附近，曾至東北長城及山東等處，蘊同寂友，又嘗至熱河。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八月一日，返北京。其後不詳。

藍方濟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一七九六年七月三十日）卒，在會二十七年，傳教四十二年，此墓碑語也。籍直隸，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八月二十三日生，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十月二十九日入會，神哲學修業期滿乃晉司鐸。時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偕 P.Roy 歸國。次年八月十五日抵澳門，入湖廣。五年後被逮，吏與天主教善，不加害，旋至京，嘉慶元年（一七九六）七月三日卒。

陶與藍同時回國，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四月三十日 P. Roy 由 Ile-de-France 致書某君曰：諸同志皆足為他人楷模，見者咸以聖人目之。陶君助余尤多云。回國後，曾在澳門逗留數月，旋入湖廣；餘不詳。

曹，粵人，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十月十八日生。入會晉鐸回國，俱與藍同。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至湖廣，助 P. de la Roche 名若翰（?）。深入各地傳教。卒期不詳。（註十）

（七）楊德望與高類思

楊以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二月八日生於北京，偕高類思（見後）受業於蔣友仁

P. Benoist門下。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二人同至法國，習法文拉丁文，並初級科學等於La Fleche公學。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三月十日入耶穌會。後至大路易學院研究神學。又至昧增爵會繼續攻讀。時法國大亂。國務院祕書長 M. Brison 及 M. Cadet 二君，對二人之進步，殊爲驚奇。旋更習彫刻，參觀里昂布廠，金銀製作公司，及St. Etienne 軍火廠，受皇家賞賜甚夥，有一手提印刷機及 Bertin 所贈之貴重書籍。三十年（一七六五）由 Lorient 回國。高迪愛 M. Cordier 謂法王曾賜二君各一千二百 Livres。楊後至北京及江西等地傳教，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又返京。旋赴廣州。再至江西。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春，被捕入獄，吏以普通教友目之，不入奏。押解回籍，約卒於嘉慶三年（一七九八）。

高類思與楊德望同回國。回國後亦任事北京。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十月初入湖廣，餘不詳。其卒年當在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後，卒地以湖廣爲近似。（註十一）或曰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卒，約在北京。（註十二）向達君謂「十八世紀時法國的經濟學家杜爾克 Turgot 同中國姓高姓楊的兩位青年往來密切，杜氏的中國問題集 Questions Sur la Chine 和富庶之生產及分配的考察 Reflection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二書，即是爲高楊二人而作的」。（註十三）

遺路以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生，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或次年）P. Cibot 韓伯英及方守義 P. d' Ollières 來華時，有一中國少年同行，回國後二年卒。費賴之以為或即道路也。費氏書之增訂者以道路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卒於北京，年代不合，費氏之假定，殊難成立也。（註十四）

（9）唐永貴與田廣益

唐爸傳教於湖北穀山茶園，行迹不詳。墓在大堂山麓。墓碑記為甘肅人。生於嘉慶庚午（一八一〇），卒於咸豐辛酉（一八六一）與高金德 P. Caprilli 同行。（自歐洲來華）教士特來湖廣傳教者，據李主教道函，別有方濟各會士一名，聖家會士二名，中一名為華人田廣益也。二人同於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往歐。（註十五）

（10）張蘊華閻玉亭沈靜漁

張字則祿，甘肅涼州人。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生，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七月二十八日抵納玻利。三十年（一八五〇）三月十三日回國。傳教蘇州，常熟，崑山，松江，上海之金家巷，高橋，南橋等處。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十二月四日卒於上海，葬聖墓堂。

玉亭，山西榆次人，與張同赴歐洲，同返祖國。傳教松江及上海董家渡，張樸橋，吳巷等處。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至湖北，十年（一八七一）六月二十六日卒，葬在武昌西

紅山。有大德。

沈宇光輝，湖北天門人。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生，道光十四年（一八四三）七月十七日抵納玻利，與張閣同時回國。在江南傳教，改姓古，足跡遍常熟鹿苑，上海，鎮江，川沙，浦東，松江之馬橋，及崇明等處。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回湖北。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三月十一日卒，葬在武昌西紅山。（註十六）

（11）陸霞山

江蘇崑山人，自納玻利升司鐸回里，宣化湖北。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卒於漢口，見江南小修院記。（註十六）張星烺謂：「道光三十年，有蘇人陸霞山與同志二三人，航海而經緬甸，印度，阿非利加、法蘭西、西班牙、抵意大利那波利府，肄業於聖家修院八年。至咸豐七年返棹回國，充楚北司鐸」。（註十七）所云同志二三人，不可考。道光七年（一八二七）生，字樂默。（註二十一）

（12）黃廷彰

廷彰字琴溪，又字濟國，又字芝紳，亦作之紳，江蘇海門人。道光十五年（一說十八年）生。二十九年在南京修院攻讀。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八月十一日至納玻利，為趙主教Mgr. Fr. Xav. Mairesca 所遣，同行者三人，韓君與定至新嘉坡抱病而回，沈君留學亦學未成而返。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六月（或曰次年四月十八日）回國。佈教湖北。十三

年（至一八七四）安徽江蘇。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七月十三日在廣德州南羅鎮爲敗類所害，屍亦被焚。次年五月五日遷葬上海，蔣超凡爲之傳焉。（註十九）

（13）郭棟臣

字松柏，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出國，居十二載，卒業後返國。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復由傳信部召往該國執教，歷十載，門下士卒業而歸者凡七人。十四年春（一八八八）譯眞福和德理傳Odoric並遊記告成，自序於納玻利文華書院。民國二年赴羅馬參與公斯當定皇護法後一千六百年紀念，民國十二年卒。

（三）留學事業發起人傳略

（I）栗安當衞匡國柏應理

栗安當華姓氏亦作利安堂。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四月二十日生於西班牙Palencia。十六歲進方濟各會。航海至菲律賓群島，入我國，傳教福建之福安。後因教務派赴羅馬，來至其地。又嘗傳教於安南之Fourane被命爲中國監牧，至山東服務。因教禁被逮，解京入獄，既而戍廣州，卒於其地。（註二十）

衞字濟泰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生。義人。來華後，在杭州傳教。時在順治初。清兵南下，頗受優禮。後上浙閩溪，並至漳州。順治五年至七年（一六四八——一六五〇）居寧波。偕當地名士朱宗元譯書。旋回歐。十五年（一六五八）復返。越三年，卒於杭。墓

在方井而。著述友論及靈性理證。（節錄福浙江天主教史）

柏應理，字信未，比人。天啓二年（一六二三）生，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來華，傳教豫鄂浙等省，而居江南尤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回羅馬，同行者沈福宗、吳漁山。漁山至澳門而止。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復返，至印度洋，颶風作，舟簸，一箱自高處下墜，中柏首，受重創，遂不起。（註二十一）

（2）馬國賢與文華書院

馬，義大利納玻利人。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教皇遣德理格M. Pedrini．由遣使會P. Bonjour 及馬國賢等五人來華，爲宗主教多羅 Tournon 擢陞紅衣主教。四十九年多（一七一〇）奉召進京。雕琢繪塑，皆馬氏所長，爲帝所重。雍正二年（一七二四）請歸，上允之，賜馬貢緞磁器等，氏乃挈幼童四人同行，既抵國，乃以設學培植華生奏教宗暨國君，迭經阻折，始獲許可，遂設院於納玻利，名聖家修院，亦名中國學院（註二十二），或作文華書院。綜該院宗旨，不僅培植華生，凡有志來遠東傳教之西人及土耳其人，均可入院。學生由教廷傳信部贍養，畢業後授予學位。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十二月二十七日院爲義政府所沒收，此年留學之河南時炳文，湖南唐國元及袁永隆三人，遂轉入傳信部大學。該院以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七月二十五日正式開學至停辦止，凡一百三十六年，肄業華生達一百有六名，義生一百九十一名，土耳其生六十七名。（註二十三）詳見

撤作拉丁文傳入中國者，

（3）吳君

吳，法人，原名P. Pierre Foureau，華字多祿。雍正十年（一七三二）隨趙加彼P. Poussel及熊當信P. Contancin來華，越二年，奉召進宮，旋以身弱不能傳教，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奉命返國，建立修院，專以科學授華生，並與以道德上之陶養。當年即有劉保祿等五人同抵巴黎，即介紹入大路易學院Lauis le Grand。吳氏尙欲續招華生，爲會長所反對，後由沙如玉P. Chalier及Neuvialle設法收回成命，華生乃得繼續赴法，直至耶穌會被解散後始絕。華生多居巴黎及La Flèche兩地。吳以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卒於巴黎。（註二十四）

（4）趙方濟主教

趙原名Fr. Xav. Maresca。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生，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月十九日入聖家會，晉司鐸，後即任教授。十八年（一八三八）來華，至湖廣，取名馬眞德，字自修。二十六年（一八四六）至江南，更名趙方濟。同年受任副主教。翌年祝聖。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因[illegible]回納玻利。同年十一月二日卒，瘗文華書院。（註二十五）

（註一）道學家傳，即聖教信證，附錄韓霖張賡等，見青年會季刊二卷二期。

（註二）Notices biog. et bibliog. vol. I. P. 381

（註三）Id. Vol. I. p. 475

（註四）中西交通史第八章頁一一四。

（註五）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七，頁一〇四。

（註六）Notices Vol. II. No 30又陳垣著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輔仁學誌三卷二期抽印本）。

（註七）Clergé Chinois au Niang—Non Sous les Ta Tsing p. 42.

（註八）聖教雜誌二十二年四期插圖，又 Clergé Chinois d. 57—58

（註九）Trois Siecles d'apostolat, p.202

（註十）Notices Vol. II, 861 862,877,878,880,

（註十一）Id. Vol. II. p. 920

（註十二）Trois Siecles d'Apostolat. p.190

（註十三）中西交通史八章頁一一六，及李永霖著經濟學者杜爾克與中國兩青年學者之關係，載北大社會科學季刊一卷一期。又 Notices Vol. p.920

（註十四）Notices Vol. II p.903

（註十五）成和德著湖北襄陽屬教史記略，又 Trois Siecles d'Apostolat, p. 398

（註十六）Clergé Chinois p.48,62,90,又聖教雜誌十二年三期。又 Trois Siecles

d'Apostolat p.406

（註十七）歐化東漸史一章四節四十頁

（註十八）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p.213 404

（註十九）Clergé Chinois……p.16，又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八，頁二七八，又聖教雜誌十二年三期九年一期又 Trois……p.406

（註二十）Chartin：Les missions franciscaines p. 35—39.

（註二十一）墨井集卷一頁十二節錄

（註二十二）和德理傳卷下頁四五，又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下頁八八，又燕京開教略中篇頁五三，又 Trois……p.199

（註二十三）Clergé Chinois……p.3 etc.

（註二十四）Notices Vol. II. p.733

（註二十五）Clergé Chinois……p. 4 又八十年來之江南教史。

拉丁文傳入中國考

一　序言

拉丁文者，以拉契烏 Latium 之方言，成古羅馬之國語，故亦稱羅馬文。凡歐洲拉丁民族文字，悉所孳乳。歷史攸久，八紘稱獨尊。十七世紀前，歐陸學術政治外交法律，靡不用之，固蔚然西方國際語也！今日科學名詞猶採用拉丁文，足驗其流風餘韻。西人恆以拉丁區稱文物昔盛之所，亦非無因。顧自羅馬帝國之亡，以拉丁爲日用語之民族，漸歸式微，而拉丁遂以「死文字」見稱。偶有習者，亦多失其故舊，乃有所謂「低級拉丁語」者，或譏爲「庖廚拉丁語」焉。獨天主教以教理爲萬世常法，其詞語尤須確切弗移。爾欲求文義之不歧，惟「死文字」可奏斯功。況古代經典載籍，既多以拉丁文撰記，亦不可不一以

貫之。拉丁文遂爲拉丁禮之天主教會所襲。用迄於今茲。凡舉祭行禮及教律、教規、教務會議、與夫教廷教區之文告悉本之，教中人至名爲「母語」。故拉丁文之傳入我國，亦以教士爲媒介而與教會之關係特深。歲辛巳，余來浙江大學講中西交通史及拉丁文，以拉丁文東漸與中西文化溝通，有不解之緣。爰爲是篇，將求教於並世賢達。

二 拉丁字與中國音韻學

基督教之始入我國，其有文獻可考者，死[illegible]先於景教。景教盛行於敘利亞一帶，故教中以敘利亞文爲主。現存漢譯景教遺經，俱非直接譯自拉丁文者。元代，天主教士東行，始有翻譯拉丁文經籍者。然拉丁文影響及於我國文化，厥在明清之際，而與我國音韻學之關係尤著。

利瑪竇「西字奇跡」 方明末耶穌會士之來華也，通語讀書，爲當務之急。顧以漢字之繁，音讀之難，以西人而借助於西文之拼音，藉便記憶，亦情理之常。惟初期耶穌會士，雖分隸義葡等國，而利瑪竇P. Matthaeus Ricci 實羣龍之首。利，義人也，義人讀拉丁音較準，教士又莫不習拉丁文，故以拉丁字拼漢音，則音可一，前人之勞，亦裨後人。機當時教士拼音，雖不盡同，要其以拉丁音爲原則，固顯而易見者。

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五）瑪竇著「西字奇跡」一卷，即以拉丁音注漢字者。Theophilus Bayer所著「中國大觀」Museum Sinicum 謂瑪竇曾梓行「大西字母」Ta

或即指「西字奇跡」也。（見費賴之P.L.Pfister「入華耶穌會士列傳」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P.40）梵蒂岡圖書館有藏本。洛佛爾Laufer「中國基督教藝術考」Christian Art in China（通報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發表）謂別有題「程氏墨苑」者，實一書異名。按「墨苑」爲程幼博大約所刻書畫集。瑪竇嘗以宗教畫四幅贈大約，並題拉丁字注音其上，合所附短文，得三百八十七字，爲字父（即母聲）二十六，字母（即韻母）四十三，次書四，聲調符號五。近陳援菴先生影印傳世，題「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瑪竇注音法既出，國人頗驚新奇，乃有錯綜摹繪，顛倒排當，以誇耀於人者，亦以見受人注意之深。「口鐸日抄」（卷一）記崇禎四年（一六三一）福建教友陳孔熙等，向盧安德司鐸P. Andreas Rudomnia參較西音，亦一例也。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西字奇跡」刊行後二十年即天啓六年（一六二五），瑪竇同會士金尼閣P. Nico Laus Trigautt亦譔「西儒耳目資」問世。同治三年（一八六四）Douai刊印Dehaisnes著金尼閣傳Vie au P. Nicolas Trigautt P. 208謂「尼閣致書P.de Montmorency曰：余應中國教友之請，曾以漢文編一字典，（余不感漢文困難），凡三冊，使漢字與吾邦之元音輔音字接近，俾中國人得於三日內通曉西洋文字之系統。此一文典式之工作，頗引起中國人之驚奇。彼等目覩一外國人矯正其文字上久待改善之疵病，自覺難

能可貴也。此書且爲吸引偶像教人（按指佛教人）進入天主教網罟之餌。前禮部尚書某公。捐貲刊刻，並作一極有價值之序，爲之增色」。所謂某公，當指張問達，其任官禮部者，問達父也，尼閣偶誤爲其本人。其書視瑪竇所編者條理尤密。凡字母二十九，內自鳴者（元音）五，同鳴者（輔音）二十，不鳴者（中國不用之輔音）四。又以自鳴五字相結合，並與 l m n 三字結合而成「自鳴二字子母，」及「自鳴三字聲母」各二十二，「自鳴四字曾孫母」一。以元母、子母、孫母、曾孫母爲五十列音，是爲字母，以二十同鳴字爲字父。字母有清濁上去入五聲調，及中音次音記號各一。並創作「萬國音韻活圖」，「中原音韻活圖」，「音韻經緯總局」，「音韻經緯全局」，「四品切法」，「列音韻譜」等。其書始作於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夏，完成於六年春，凡三易稿。四庫存目，稱其「殘闕頗多，並非完書」。民國二十二年，北京大學與北平圖書館重爲影印。今人研究此書，多側重其漢音西譯之功，而不知當時中西人士固亦嘗以之爲西音漢譯之準衡也。今天主教通用譯名，往往與新譯大異，而與尼閣之書多雷同，可以見也。

國人之研習拉丁注音西儒耳目資既出，國人歡迎甚。張問達、王徵、韓雲、張緟芳、皆爲之序，問達更負剞劂之費，皆熱心其事者，而徵爲尤甚。嘗作山居自咏曰：「奇人幸得奇遇，資人耳目元音譜，啓我靈函聖蹟圖，但開口，皆奇趣」。「資人耳目元音譜」云者，即西儒耳目資也。徵與雲俱教友，或謂問達亦在教。徵譔西儒耳目資釋疑云：「今

觀西號，自鳴之母，號不過五，同鳴之父，號不過二十，及傳生諸母之類統計之，才五十號耳。背一記憶，一日可熟，視彼習等韻者，三年尚不能熟；即熟矣，尋音尋字，尚多不得便過者，誰難誰易，而甘自逐焉？且余獨非此中人乎？閻愚特甚，一見西號，亦甚了了，又況聰明特達之士，「高出萬萬者乎？」用力提倡，可謂至矣！乙亥年徵譯遠西奇器圖說，乃並記號亦用羅馬字。曰：「號必用西字者，西字號初似難記，然正因其難記，欲覽者怪而難索，必求其得耳」。今守山閣本奇器圖說，已將羅馬字悉易甲乙。余近見安康張氏鵔刻本，猶仍其舊。然王徵以難引轉之法，並不久傳。梅文鼎勿菴曆算書目奇器補詮條謂：「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水諸製，並有裨於民生，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中略）其以西字紀識者，易之，便觀覽也。」文鼎熙朝，殆不謀而合也。或問王徵果諳拉丁文乎？曰否。徵自序遠西奇器圖說錄最曰：「雖余僻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爲余指授西文字母字父二十五號，刻有西儒耳目資一書，亦略知其音響乎，顧全文全義，則茫然其莫測也」。四表，尼閣字。徵之所知，蓋止於切音而已。

尼閣之書，爲人所重，迄清初百餘年而未衰。方以智先生早窺之，亦明末接受西學之鑽深者，見所著通雅及物理小識。通雅（卷五十）有切韻聲原一編，述及尼閣及耳目資者凡四次，可窺其深研拉丁切音之迹。韻考一節，皆舉金尼閣字父字母之說，即所謂旋韻圖，亦頗師尼閣之意。又謂「外國腔音獨多」，中土音韻詳正，華嚴、悉曇、回回、泰西、可以

互推一術之心目中之泰西，拉丁而已。只智又曰：「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　若爭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成字，不尤愈乎？」可見其醉心拉丁字之深。

楊選杞著聲韻同然集，於拉丁拼音之術，亦有所知。嘗師金民閣法，創宏聲字父十五，宏聲字母十三，中聲字父二十七，中聲字母二十，細聲字父三十一，細聲字母二十四，總為字祖三十一，大韻二十五。又仿其音韻活圖法，作同然圖，宏聲圖，中聲圖，細聲圖。（參見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方楊二人而外，清初有劉獻廷者字繼莊，尤嗜外國字。梁份懷葛堂集（卷二）劉氏家藏墨苑序曰：「余友劉繼莊於書無不讀，家貧甚；而藏弆金石圖書特富。其家先生得墨苑一書，愛惜甚，藏於燕久矣。丙寅，劉子偶客吳門，過友人所，偶視架上書，偶披視，則墨苑也。書纔半部。劉子偶曰：客中閒，請以全帙假。友人曰諾。居無何。以他端不果。劉子亦以他端不復請矣。（中略）一日，門人挾書置几上，則墨苑全帙，亟披視，則前見其半者。既竟，則固劉子所家藏也。一時傳為異事」。繼莊愛好墨苑，何一至於是，梁序語不及此。近人王勤侯作劉繼莊先生年譜初稿（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四卷四・五期）敍此文，亦於其念念不忘墨苑之故，亦未道破。以余觀之，必與書中所收利瑪竇注音字有關。繼莊所學，得於泰西者頗多。詳廣陽雜記。雜記（卷二）曰：「劉孔當後為名進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附琉球紅夷字，田夫家有其書，付見之。余見此，不

勝驚歎。前在甲夫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雖字叶韻，不關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金而求，募賊以稱者，乃面失之於康甲夫也。紅夷之字，必用蠟底諾語，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蠟底諾即拉丁，紅夷則荷蘭也。此文雖考證不甚精確，固已開風氣之先。雜記（卷三）並述及「太西蠟頂話」，蠟頂亦拉丁之異譯也。所著新韻譜，亦受金尼閣影響而作者，惜已散佚。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十八劉繼莊傳，謂：「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音、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同集卷二國書賦，亦有句曰：「龍龕之鏡未諳，蠟頂之話誰遡？」祖望以蠟頂入曲，想見當時文人對拉丁字興趣之濃也。

康熙禮重西士，於西洋科學，皆略開一二，淺嘗輒止，於拉丁文亦然。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使齎原文及譯文進呈。帝諭大學士等曰：「此乃喇提諾，多鳥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托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聲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者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東華錄康熙七十六）關於此諭，俞正燮俄羅斯事輯謂俄羅斯書東合拉提諾、西合托忒爲珠克，而兼譯蒙古清漢文。魏源俄羅斯聘盟記謂拉提諾爲西洋字體，托忒者蒙特字體，爲

珠克者唐古特字體也。何秋濤朔方備乘卷十三俄羅斯學考附俄羅斯國兼用各體文字考辨之，曰：「拉提諾為一種字，託多烏祖克為一種字，鄂羅斯為一種字，合而計之為三種文。魏源分托忒為一種，烏珠克為一種，其誤顯然。又西洋在俄羅斯西，厄魯特在俄羅斯東，則當云西合拉提諾，東合托忒烏珠克。俞正燮所云，亦屬筆誤」。喇提諾，拉提諾，皆拉丁之異譯，喇嘛則俄羅斯東正教之教士也。見圖理琛異域錄等書。秋濤並謂：「拉提諾則西洋公共之字體，俄羅斯教門技藝，皆學西洋，宜其諳習於是也。」又作拉提諾字體考，註：曰「亦作臘底諾，喇提諾」。自前論觀之，康熙似亦有志以羅馬字拼音，為漢字音韻闢一新徑。惟康熙於拉丁所詣不深，故亦有願莫遂。但其騎態固躍然紙上也。

四　拉丁字注音之遭反對　拉丁拼音法，好之者雖衆，排擊者亦隨之而起。熊士伯等切元聲（卷八闢西儒耳目資）曰：「切韻一道，經中華賢哲之審定，固有至理寓乎其中，知音絕少。因其不知，遂出私智以相牽鑿，過已」周春松靄遺書小學餘論：（卷下）「明季西人金尼閣竊等韻之餘緒，撰列音韻，究不過得其粗者。切脚下一字全不理會，幾類洞庭切。又讀字悉依中原音，且有依其國土音者，而古音且盡廢矣。於字母外，更造字父字孫之說，尤為不典」。然尼閣之法，流傳甚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貴陽聖保祿學堂猶印行「十八字母」一小冊。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四川汪朝恩司鐸著「五音集字」，據康熙字典，按拉丁拼音，重為編排，成十巨冊，又集字鑿聲二冊，其拼音則皆以漢字出之。

按察使牛樹梅爲題序。其書用力雖勤，而見者甚罕，以言影響，殆絕無也。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盧戇章著「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及「一目了然初階」。民國二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遂有所謂「羅馬字母」派者。其後如劉孟揚著「新纂新華字」，錢雄灌「新字母發明書」，李澄祥著「全球五音字母」，不可悉計。民國十七年，大學院公布國語羅馬字後，論著尤多。十九年成立國語羅馬字促進會。次年，俄人德拉古諾夫 Dragunov 擬作中國羅馬字拼音法式，二十年遂與三五華人成「拉丁化的中國字母」，同年九月在海參崴舉行第一次「中國字拉丁化會議」，積極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二十八年上海出現「拉體新字」，則仍爲羅馬字，而以廣韻爲標準音也。

三　國人研習拉丁文小史

天主教人之學習拉丁文　元大德八年（一三〇五年一月八日）大都總主教若望孟高未諾 Ioannes de Monta Corvino 寄函阿薩里亞(Gazaria)修士教長曰：「余收幼童一百五十人，自七歲至十一歲不等，父母皆崇奉異教，幼童未受教育，亦無信仰，余悉爲付洗，教以希臘拉丁文」。是爲國人最先習拉丁文者。

明末，天主教東漸，適當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後，拉丁文在歐洲，光日中天，盛極一時。義大利之拉丁文學運動，更彌各國而上之。羅馬米郎，文風最高。利瑪竇出身之羅馬學院，尤執牛耳。故當時來華西士，於拉丁文之造就，多非今人所望塵能及。

西士輸入中國之拉丁文，雖爲僅見，受國人之注意亦深。帝京景物略（卷五）遞利瑪竇墓碑曰：「後虛字大角，所供縱橫十字文」。以敬十字者習用拉丁文，乃稱之曰十字文，其書新詠可考。愚案劉侗晚村文集（卷六）友硯堂記曰：「八角研，餘姚黃太沖名宗羲所贈者也（中略）其銘，即用六朝同文俗語，而中刻耶穌三角丁圓文。其質則欽之進尾也」。太沖詩云：「[illegible]的嘆尾從西士，傳之朗三僅之我」。朗三即梅朗中，精西洋算法。三角丁圓文者，眼前式字者。稱以耶穌者，亦以拉丁文爲教會常用語，與景物略之稱十字文，其意同。是其時西士，迎人所好，亦嘗以拉丁文鐫刻物品，而爲餽贈之需矣。雖然，此非西士之本意也。拉丁文之可以爲來華西士用者，在灌輸學術與教理。第彼時拉丁文與漢文之互譯，類由西士自任，由國人爲之口授筆錄。緣拉丁文學習匪易，當時從西士問學論道者，多中年以上人，祇能倡錄。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乃請教宗准以漢文逐譯聖經，舉行彌撒，誦讀經典等，司鐸得以漢文舉行教禮。教廷詔如所請。乃因循未譯文，時日遷延，國人亦漸有諳拉丁而任爲司鐸者，其議遂寢。

　　免用拉丁文之議，雖功敗垂成，似屬可惜。然教會欲植基於中國，培植通曉拉丁文之中國教士，實爲根本之圖。蓋教會之斡旋，其性質近於一時之通融，非可以垂諸永久者。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范禮安（P. Alexander Valignani）在肇慶收四人入耶穌會之初學院（Noviciatus）。入初學院者，或終身爲修士，或志在昇司鐸，凡志爲司鐸者，拉丁文

乃必修之科。三十三年(一五九五)粵人鍾明仁亦入韶州初學院。三十一年(一六〇三)澳門人邱良禀繼踵而至。先是，范禮安並於二十二年(一五九四)立院於澳門，利瑪竇以澳門爲亡命者之逃藪，國人所鄙，遂於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建院於北京。閱十載，南昌初學院亦告成立。天啓四年(一六二四)更築新院於杭州。三十餘年間拉丁文在中國植基運動，不爲不宏。乃曾幾何時，都歸中輟。至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南懷仁P. Ferdinandus Verbist上書會中視察員，請在中國內地復設初學院，並在澳門專立華人初學院。然閱時不久，各省修道院Seminarium卽相繼成立。修道院者，天主教教士之養成所也。分高初二級，高級修院亦曰大修院，專攻哲學，神學，旁及聖經，教律，教史，教儀，聖樂等，多以拉丁文講授。初級修院亦曰小修院，則以本國文，拉丁文，第二外國語，自然社會科學等爲主。然以拉丁文艱深難解，往往佔時獨多，西南諸省乃以是稱小修院爲「納丁學堂」。(見高隴主證，黔疆諸證)。故小修道院者，實教中人治拉丁文惟一處所。

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畢天祥P. Appiani以中國教會禮儀之爭方烈，西蜀去各省較遠，相安無事，欲立修院於成都，未果。五十年(一七一一)穆天尺P. Mullener思在湖南常德立院，亦未遂。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天尺被簡任四川主教，乃節衣縮食，設講席於成都。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教士劉加略P. Hamel艾若望，(亦名萬德勝)P. Gleyo及梅某P. Moyo樹修院於滇北龍溪。劉司鐸原任教於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y之

Virapatna 修院。艾司鐸則爲暹羅修院之創立人。逾四年，遷四川宜賓落壤溝。其地距城二百華里，去瀘溪七十里，地介二省，便逃竄也。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燬於教難。時羅主教RHD. D. J. Ludovicus Florens.爲院長，率學生二人，自雲南間道入越南，甫抵其地，主教即罹疾終。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葡萄牙遣使會士Lazaristas改澳門耶穌會若瑟院爲本會修院，授拉丁文、中文、哲學、神學、數學，葡后出帑修葺院舍，贍養全院師生，稱王家學院。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後，即爲全國遣使會碩果僅存之修院，國內欲求拉丁文深造者，咸萃於此。至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始告停辦。

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北京教會已有讀拉丁文者十五人。蓋三年前遣使會士羅廣祥P. Raux與吉德明P. Chislain入京接管耶穌會事業時，已致意於此矣。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即開辦修院。十一年，京中忽兆教禁，修院亦　然弦誦，未六載，復遭禁阻。

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察哈爾西灣子及江西南昌之三橋修院，相繼成立。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三橋修院遷南城之九都。同治二年（一八六三）遷九江，既而復返南城。

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原澳門讀拉丁文之浙籍學生三人返省，續在嘉興硤石之東輻浜肄業，是爲浙江有修院之始。旋移定海，再遷寧波。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貴陽亦成立修院，即所謂納丁學堂或納丁書院也。

五口通商以還，國內修院逐漸開設，遍於各教區。民國二十九年統計，全國小修道院暨先修班（通稱備修院）凡一百九十所，學生五千一百十四人，皆必讀拉丁文者。其以拉丁文講授各科之大修道院，計三十六處，學生八百七十人。

歷代教會會議，亦極重視拉丁文。嘉慶八年（一八〇三）之四川會議錄，爲中國教史之著名文獻，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傳信部命令全國奉行。其第七章第三節，命修院學生必須精諳拉丁文，能作通順文字。除每日授課外，年有考試二次。每年或每二年必由主教親行覆試。四川會議之預會者教士十四人，屬法國籍者一，餘皆川黔人也。民國十三年第一屆全國會議，亦規定（第六七二條第四目）在小修院「教授拉丁文，作攻讀神哲學之準備。應採用拉丁文全盛時代之名著，教父暨聖教禮典中之詩歌，並節取司鐸日課中之文字」。其他各教區會議，亦無不注意及此。不多贅論。

、拉丁文之傳授，教會雖重視若此，惟以二三百年前設備之困難，師資之缺乏，暨各教育之外，蓋別有他途。一爲出國之研究，一爲私人之教讀。國人首膺主教任者，閩人羅文藻，即以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至菲列賓習拉丁文者。又十載，（順治七年一六五〇）粵人鄭瑪諾司鐸，則更遠航羅馬。自是繼起者代不乏人。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南京人沈福宗，名彌格爾，隨柏應理 Philippus Couplet 至歐，自法至英，並到牛津大學，晤東方學大家 Hyde。Hyde遺書中有福宗之拉丁文通信及棋譜，升官圖，度量衡制與漢文及

拉丁文對照之應酬語。四十八年（一七〇九）陝人樊守義亦遊覽都靈、羅馬。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供奉書院教士馬國賢P. Matthaeus Ripa偕吳露爵、王雅敬、谷若翰、殷若望四生，走納玻利創中華書院，西名聖家書院Collegium Sanctae Familiae。于允謙序西彼得略，謂「康熙中意大利建文華書院」，殆即指此。原作者金永森自敘亦曰：「聖祖仁皇帝天縱多能，靡術不究，尤留心外國事。當時建文華書院於意大利，遣子弟出洋學習。」馬國賢以雍正二年離華，謂書院成於康熙，誤也。或者動議於康熙，實現於雍正歟。國賢爲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教廷遣來宣佈宗主教多羅Carolus Maillardus ae Tournon被擢爲樞機主教者。又嘗供奉書院，故西返時，曾攜有同。謂書院係教廷所建之說，殆亦起於此乎。文華書院不以華人爲限，凡有志來遠東傳教者，悉可就學，而土耳其人亦在收容之列。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歐洲學者Marian, de Guignes, Hauterayes等，以中國民族是否起源於埃及而生劇辯。會M. Needham得埃及女神半身像於都靈，像有文，頗類漢字，乃就梵蒂岡圖書館某北京籍館員詢焉。其人爲譯成拉丁文。蓋康熙末年，北京已有一拉丁中華字典凡三十六冊。（見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序）可知當時國人已有因諳拉丁文而服務於教廷圖書館矣。而其人必與文華書院有關，亦無可疑者。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院中華有二人應英政府之聘，充使臣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之譯人，李雅各（同鐸郎）即其一也。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義政府改文華書院爲亞洲學院。中國

二年復改為王家東方學院。本來面目，蕩然無遺。計自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七月二十五日正式開學，迄於停辦，凡一百三十年。停辦後，學生併讀於聖家修會者又二十七年，前後收華生達一百有六人，義籍學生一百九十一人，土耳其學生六十七人。

納玻利聖家書院而外，義大利境內，別有招收華生攻讀拉丁文之處所，是即教廷傳信部大學，亦稱烏爾巴諾大學 Collegium Urbanum。華生之肄業該大學，實始於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民國二十五年，舉行華生留學傳大百年紀念，計前後得華生十九人，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卒業之池某，且遠赴加爾各答，為教皇服務。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學生郭從堂並首獲神哲學博士學位，顯係七為一門際哲學，學生國籍多達三十。近年國人前往者，多先在國內修拉丁文，求能直接聽講也。

其在東亞，國人亦嘗遠適暹羅、安南、緬甸、印度、馬來，治拉丁文矣。方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巴黎外方傳教會 Missio ad Exteros de Paris 之成立也，即籌立學校於東亞。一以便歐洲教士學習土語，一以便遠東修士攻讀拉丁文與其他必修課目。康熙三年（一六六四）艾若望司鐸乃在暹羅 Juthia 設校。緣其時暹羅為遠東惟一可以自由傳教之地，外人亦得任意居留。又以地點適中，交通便利，中國等處學子，俱易前往。文獻叢編（第十五輯）載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山東巡撫明興奏獲西洋吧嚨哩嚨解京摺，謂「朱行義供認係福建莆田縣人，名朱里官，素習天主教，教名喚得肋斯（中略）該犯自幼曾到噶喇

國天主堂居住，因能說西洋話，認得西洋字，是以人亦稱為神甫」。神父必知拉丁文，國人認得西洋字而稱神父，其必為拉丁文也無疑。中國神父到暹羅讀拉丁文，此一例也。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緬暹交鬨，學校被毀，越二年乃一遷 Chantaboum，再遷印度本地治理，三遷安南東浦寨。嗣又擬遷菲列賓，為西班牙人所拒，不果。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遂奠新基於馬來之檳榔嶼。檳榔嶼修院之成立，四川主教徐德新 Beatus Episcopus Dufresse之力最多。十六年（一八一一）該生得二十八人，其他各地來者寥寥無幾，一時有中華修院與四川修院之目，謂以川人獨多也。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貴州教會派學生二人前往，後又續派三人。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滇省亦有人往。餘則來自馬來、安南、暹羅、緬甸等處，至今存在。民國二十八年統計，學生之在檳榔嶼者，猶有十五人。歷年總數，則不可考。據康熙四十一年至咸豐八年四川本籍司鐸錄 Catalogus cleri indigenae in provincia Se-Tchouan 1702—1858 所記，一百五十六年中，曾居暹羅者十三人，在本地治理者十八人，往留學檳榔嶼者七十八人。又民國十一年時，該院有學生一百零七人，計緬甸人四十六，暹羅人五，麻六甲人四，安南人九，我國學生四十三，內川滇人各七，黔省八，粵省十八，桂省三。苟合二百餘年來全國各省遣往之學生計之，其數必有可觀。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有馬司鐸者，川人也，自本地治理轉學加爾古答，曾振鐸貴州，稱文大公，以其博學能文也。（見Gourdon: Beati Martyres Provinciae Se-Tchouan

in Sinis p. 73; (Catalogus cleri Indigenae in Provincia Se-Tchouan, p. 21)

上述數處，爲十七世紀以來國人在海外研習拉丁文人數較多之所。其僅少數人前往者，除上引羅文藻鄭瑪諾諸人外，若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去非列賓之馮若望，乾隆五年（一七四八）赴巴黎之劉保祿等五人，十六年（一七五一）遊學法國各地之楊德望高類思，更僕難數，不能一一舉也。

國人讀拉丁文，亟須乘長風，破萬里浪，遠適異域，其最大原因，實由於教禁。苟有不能出國者，則往往私相傳授。而普通教友之有志通拉丁文者，旣不能入初學院與修道院，更惟有私淑之一途。曾德昭P. de Semedo記曰：「張賡亦浙人，與李之藻楊廷筠相熟，在京時，因利瑪竇勸而受洗禮。奉教甚篤，曾習拉丁文，凡年中各瞻禮之特種經文，咸能念誦。」（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 Nos 1—8,1930,PP. 170—171）其拉丁文之出於私授，無可疑者。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主教羅文藻授吳歷、王其淵、劉蘊德爲司鐸，時蘊德已屆耳順之年，歷五十七歲，其淵最幼，亦四十五歲。皆能以拉丁文行彌撒禮。蘊德官至欽天監監副，其拉丁文傳自治曆之西士，可必也。其淵以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入杭州耶穌會初學院，時年已四十有二，拉丁文必在院中探討。歷爲名畫家，字漁山，號墨井道人，所著三餘集，有「西燈」一詩，曰：「燈自遠方提，天從寰宇分。試觀羅瑪景，橫讀辣丁文。蛾繞光難近，鼠窺影不分。帶看西札到，都專佃本聞。」詩名西燈，而

其十則拉丁也。陳援庵著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文，以爲道人與羅馬應有通信。道人能讀西札，其拉丁文造詣，必不平庸。然據羅馬主教上國信部樞機主教書(id. 1925, No. 1. p. 17發表)道人等三司鐸皆僅知嫺誦拉丁而已。能爲拉丁文發音，卽可晉任司鐸，此固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教宗亞歷山大七世 Alexander VII 所准也。唯道人祝聖司鐸前，居澳門三巴寺(卽聖保祿堂)七年，則拉丁文之琢磨，固將如也。然道人嘗從魯日滿 P. Francis Cus de Rougemont 及柏應理學道，謂日滿與應理爲道人拉丁文問業師，當亦可能。三餘集更有和姑蘇沈范二子雜詩七首其一曰：「近究西文學，竟虛東下帷。殘篇多鼠跡，新簡亂蠅飛」。又六十吟曰，西學日究猶未足，何事努力不少壯」。道人成司鐸後，傳道三十年始謝世，三十年之簡練揣摩，拉丁文必斐然可觀。學貴有進，將鐸之始，雖止呼嚼成誦，亦何傷也。

康熙以後，教中私習拉丁文之風，遍於各省，而雍乾嘉道諸朝爲最盛。教人之爲地方官拿獲者，西洋書與十字架同視爲惑衆之具，刑罰綦重。於是山藪林箐，銷聲斂跡。然在上者禁教愈嚴，在下者規避責任，隱匿不報者亦愈多。惟教家求逃遁之利便，則往往集居於濱河之地，或深入窮鄉僻壤。今日全國各省奉教七八世而至十餘世者，比比皆是。數十戶至數百戶之老堂口，亦所在多有。而三百年來傳習拉丁文之私塾，亦皆爲此類老堂口所附設。堅苦卓絕，有足多者。今各省歷史較久之修院，殆無不淵源於是也。

教外人士之研治拉丁文　國人之習拉丁文者，不僅天主教人已也。拉丁文之正式用於中國官書，殆始於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之中俄交涉。朔方備乘（卷首）記曰：「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應於格爾必齊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鄂羅斯，喇地訥，（原注臣秋濤謹案皇朝通志作拉提諾，一作臘底諾）蒙古字於上」。西清黑龍江外紀：「喇地訥作喇第諾。蓋康熙中俄劃界，訂尼布楚條約，教士張誠P.J.Fr.Gerbillon徐日昇P.Thomas Pereira充譯員，遂建議以拉丁文為交涉時之正式文字。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其俗素奉天主教，文移俱用蠟諦諾字。蠟諦諾者即今中國所傳西洋字也。大抵風俗與西洋國不遠，故遣使時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喇提訥、喇第諾、蠟諦諾、亦拉丁文之異譯。楊賓柳邊紀略曰：「阿羅斯錢銀質（中略）一錢必嵌數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臘底諾話。臘底諾者西洋諸國之官話也」。彼時國人於拉丁文之知識，已不為淺矣。

雍正初年，俄羅斯館即附設拉丁文班，聘俄人為教習，且有俄國幼童負笈來華。文獻叢編（第二十七輯）俄羅斯檔載：「雍正五年，尚書圖理琛等議奏，現在住京俄羅斯喇嘛僅止一人，再請咨取喇嘛三名，並學習俄羅斯孩童四名，會俄羅斯拉提諾文字人二名，均住該館，並照以前來京俄羅斯喇嘛，給予廩餼，俟學有成效，再行酌量回國」。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記是年「准俄羅斯館內設立廟宇，令在京之俄羅斯僧一人居住，並准該國所遣俄羅斯僧三人，俟送到時，一併給與口糧食物，聽其於廟內行俄羅斯教，禮拜念經，無

嚴禁止」。此俄國教士被稱喇嘛之由來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則信其為真學喇嘛，皆與據錄所傳誤也。朔方備乘卷十三俄羅斯學考謂：「康熙二十八年俄羅斯察罕汗遵旨定界議和後，由所遣人進京學習國書，俟通曉文理後換回。此俄羅斯國遣子弟來京讀書之始」。及自雍正五年圖理琛等請派會拉丁文人及俄國幼童，俄國即「遣官生魯喀偰多德宜宛喀喇希木四人來學，即舊會同館監學焉」。(見同上)會典內閣又規定外藩各部應用文字，「西洋諸國用拉體諾字，遇有陳奏事件及表文，皆譯出具奏。(中略)拉體諾字，寫西洋堂人譯寫」。道光三年松筠綏服紀略曰：「綏服習用國書，北海之疆陲」。原註曰：「時俄羅斯既已遵奉彼文約束其邊界人等，永不滋事。(中略)遇事即繙清文兼俄羅斯及西洋字話繙寫馳遞，應有印證，以免舛誤，著令永為定例」。西洋字即拉丁文也。理藩院則例又曰：「薩那(按係俄國使臣)所留在京學藝之學生四名，通曉俄羅斯拉替努字者之二人，亦令在此處(指俄羅斯館)居住，給與盤費錢，支領銀兩等件」。拉替努亦即拉丁之同名異譯也。

據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十月三十日龔當信P.Cyrus contancin與P.Souciet書則「是年三月，帝立學校一所，收滿漢青年子弟，命讀拉丁文，以法國耶穌會士主其事，巴多明P.Dominicus Parrenin掌全校事宜，宋君榮P.Antonius Gaubil副之」。十年(一七三二)六月十三日君榮亦有函致P.Souciet曰：「拉丁文班情形尚佳，學生多能操拉丁語，成績頗優」。同時A.Rémusat亦記曰：「北京設西洋館，招滿州青年學習拉丁文，備與俄國皆折

銜之任也。巴多明管總其事，近乃不起，朱君榮遂繼主職。君榮嘗充拉丁文及滿文譯員。中俄交涉後，西洋館之重要益見。君榮譯聖彼得堡議院之公文爲拉丁文及滿文，又譯清廷之漢滿蒙文爲拉丁文。（中略）中俄文字懸絕，誤會曲解，在所難免，雙方各執己見，積不相讓，交涉停頓凡三十載，君榮爲之疏通」。（Pfister. P.672）時又有方守義 P.J.F.M.D.d'Ollières者亦曾任清廷譯員，凡滿漢俄拉丁之譯事悉與焉（id. P.904）錢德明P.J.J.M.Amiot記西洋館繼續存在者迨十五寒暑，但學生中迄無任譯員者（id. P.507—508）按會典內閣云：「俄羅斯館專司繙譯俄羅斯文字，選八旗官學生二十四人入館肄業」。其兼讀拉丁文者，即此八旗官學生也。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月十六日教士戴進賢P. Ignatius Koegler等奏請教諭疏，有云：「臣巴多明等，蒙命（指雍正帝）教習官生學辣第諾語言文字」。（余藏辯學鈔本）。十三年（一七四八）改明之四夷館及會通館爲會通四夷館，專司翻譯及傳受外國語。命西洋堂人譯爲拉體諾字。所譯各國文字，俱分天文、地理、時令、采色、身體、人物、器用、宮殿、飲食、衣服、方隅、經部、珍寶、文史、鳥獸、數目、通用、香藥、花木、人事各門。故宮博物院藏寫本華夷譯語，凡九十八卷，四千五百　頁，所收文字三十四種，西洋館得六種，第一種即拉氏諾語。寫本來自軍機處之方略館，茲錄其一頁如后：

西洋館

身體門（拉氏諾語）

corpus	身	郭耳補斯
natura	性	納都喇

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俄人Pavel Ivanovitch Kamensky 抵北京。入俄羅斯，攻漢滿文甚勤，並研究風土人情。氏又爲拉丁文專家，遂入理藩院供職，專司歐洲各國公文譯事。（Mc Gr?in著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China。一九三九年教育雜刊第十二期。（按本期所載爲本文之第二段，未完，其前後各期，作者案頭皆缺，尙待訪求）。粵海關志第七册卷二十四咪唎㗌國章曰：「今各國通行字，相傳爲馬邏可國所遺，用二十六字母諧聲比附以成字，各國大略相同，謂之拉丁字，亦謂拉體納字」。魏源海國圖志（第七十六）瑪吉士地球總論曰，「論五洲萬國之語言文字，約有八百六十種。歐羅巴語言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七，一大西洋，一大呂宋，一意大理亞，一佛蘭西，以上四者乃羅馬國辣丁語所分派者也。（中略）一英吉利，其語乃辣丁調多尼亞二國所相幷者也」。蓋自道光以降，國人對外國語文之知識已非往昔所可比矣。及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六）梁任公先生與馬眉叔先生遇，始蓄創辦譯學館之願。任公爲序適可齋記言記行曰：「世之誘君者勿論，其稱君者，亦以爲是嘗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來，可斗量也。吾有以閱君之學，泰西格致之理，導源於希臘，政律之善，肇矩於羅馬。君之於西

學也，論古以知今，察來以返往，因以識治世遞嬗之理，消長盛衰之原」。眉叔於希臘拉丁、法語頗久，乃能使任公欽佩如此。曾惠敏英法日記（光緒四年九月初八日）錄眉叔上書自陳考巴黎大學政治學及文學碩士學位之經過曰：「六月底第一場，場期二日，第一日，以臘丁文擬古羅馬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又以法文譯拔及希臘水戰，臘丁歌章。次日考問輿圖及希臘臘丁與法國著名詩文，兼問各國史學，復得宗師優獎，謂願法人之與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時在堂聽者不下數百人，咸鼓掌稱善，而巴黎新聞紙傳揚殆徧」。時在眉叔遇任公前十八年，其拉丁文已譽聲海外久矣，迨戊戌新政倡行，任公復上書清帝，請設譯學館，並約眉叔兄相伯先生主館事，以相伯亦精歐西古文字也。議將定而政變作，事遂不成。閱五年，相伯創震旦學院，任公已走日本，為「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載新民叢報彙編，其念茲在茲者仍為拉丁文。曰：「士生今日，不通歐洲任何一國語言文字，幾不可以人類齒。而歐洲各國語言皆導源拉丁。雖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補習拉丁。而先習拉丁，然後及其他，則事半功倍，而學益有根底焉。此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論也」。此雖馬氏昆仲之論，任公實心折而倡導焉。「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曰：「最先要求吾教拉丁的是梁任公，任公求教的時候，他已經學過五個月的拉丁。後來繼有蔡孑民、張菊生，汪康年諸位」。錢智修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云：「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學必先通其語言文字。（中略）乃邀約同志胡敦復、貝壽同諸君，請先生講拉丁文、哲學，

先生以來求學者衆，乃就徐家匯天文台餘屋，設震旦學院。（中略）所定課目，大別爲四：曰語文學，曰象數學，曰格物學，曰致知學。語文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是初期之震旦學院，實以拉丁文別樹一幟者。閱二年，相伯以故離震旦，別創復旦公學，震旦之拉丁文，亦於焉終絕。然自是留學歐美者，不乏研精拉丁文之士，而國內大學亦多設課選修，刊印講義，北京大學梅理藹著拉丁文提綱及演習，以法德文釋義，其一例也。

國人學拉丁文雖久，而著述則鮮。有康某者，以乾隆五年（一七四〇）赴法，十五年（一七五〇）因疾回國，是年六月三十日卒於孟加拉附近。嘗以拉丁詩作旅程記述，多至二百頁，而未嘗假手於字典。同行法人錢德明P. Amiot嘆爲奇才，以爲可與歐洲名詩人相頡頏云。

李安德，陝人，嘗就讀澳門及暹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爲司鐸，足跡遍粵閩鄂湘川諸省。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卒。所遺拉丁文日記，起自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迄於二十八年（一七六三），雅潔可誦，且爲極珍史料。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刊印於香港。名Diarium Andreae Ly。

黃伯祿，字斐默，江蘇海門人。中西著述俱富。所作拉丁文中國置產法，中國際法，中西曆日合璧，與法文中國地震考，中國日月蝕考，俱傳誦海外，有聲於時。中西曆日合璧一書，尤爲近人言中西紀年者所必本。民國紀元前三年卒。

丹徒馬相伯先生與弟眉叔，拉丁文皆冠絕一時。相伯名少良，改名良，眉叔名建忠，

俱從義敎士晁德蒞P. Angelus Zottoli遊。相伯作拉丁文通，爲震旦學院教材，以漢籍古詞句釋拉丁文法。眉叔亦以此法，成馬氏文通，然成書在拉丁文通先。淸史稿馬建忠附「馬建忠傳」曰：「建忠博學善古文辭，尤精歐文，自英法現行文字以至希臘拉丁古文，無不兼通。以泰西各國有學文程式之書，中文經籍雖皆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學者論文困於句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乃發憤爲文通一書」。文通書經相伯删改，故其書雖漢籍，而其實則馬氏兄弟研究拉丁文之結晶也。

近溫州張熙北司鐸著拉丁通音研究，雖畸零小册，而功力頗深。以國人關於拉丁文著述之希少，則陳君此書，亦自難能可貴矣。

四　漢文名著與拉丁文名著之互譯

譯入拉丁文之中國名著　艾儒略P. Julius Aleni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曰：「利子此時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悅之。以爲中邦經書，其能認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時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是爲西人譯我國經籍之祖。譯本名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今不存。天啓七年（一六二六）金尼閣亦在杭州刊印拉丁文譯五經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册。稱爲中國第一部神學之書。(Dehaisnes: op. Cit., P. 206)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殷鐸澤P. Prosper Intorcetta與郭納爵P. Ignatius a Costa譯大學與論語，題曰「中

國智慧」Sapientia Sinica，智慧經者，舊約所羅門王之訓言也。書刻於江西建昌。殷鐸澤復譯中庸，題曰「中國政治道德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在廣州付梓，未竣工，又二年，復刻於印度臥亞。以上大學中庸論語三譯本之審定者凡十五人，臥亞付梓行全刊本二次，南京巴黎亦各有出版。(Pfister, p.327)二十六年（一六八七）柏應理[illegible]在巴黎發刊「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亦曰西文四書直解。（孟子闕）蓋得殷鐸澤、魯日滿、恩理格P. Christianus Herdtrich 諸人之助也。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汪達洪P. de Ventavon亦譯中庸，附「通學要言拉的諾語」後。題「西儒汪達洪著授 滿洲球琳敬受」。其書鈔本，偉烈亞力M. Alexander Wylie得於北京，其後歸高迪愛M. Henricus Cordier（高氏著Bibliotheca Sinica，col. 1409）與殷鐸澤譯本合訂入。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衛方濟P. François Noël亦嘗譯中庸，名「不變之中道」Immutabile Medium，抄本，存比國王家圖書館。五十年（一七一一）衛方濟之「中國六經」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亦在今捷克布拉加問世。六經者，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及三字經也。註釋詳明，為前此諸家所不逮。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俄國教士Peter抵北京，譯漢文名著Shih-I "Immutable Truth"為拉丁文。（見McGi[illegible] op. cit. loc. cit.）疑即中庸，蓋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故衛方濟亦譯作「不變之中道」也。國人之知有上述[illegible]主教士譯本，則在道光間。林則徐譯華事夷言，

（曾見兩江總督裕謙奏摺，海國圖志卷八十三，夷情備采三錄入）「孔夫子書，係耶穌居拉丁諸學體譯出，甚少精理，我等皆信其不甚明白之書，以爲中國儒教道理止於此，恐爲耶穌所撰」。「耶穌」即耶穌會士Jesuita之音譯，亦作耶蘇。（見同書）此文蓋自新教人口也。雍正元年（一七二三）白晉P. Joachim Bouvet有易經大意Idea generalis libri I-King之作，今藏法國國家圖書館。（Pfister p. 438）乾隆元年（一七三六）雷孝思P. J.-B. Régis譯易經稱「中國最古之書」，至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始發行世。法國國家圖書館並藏有氏之「易經卷一評釋」Dissertationes et notae criticae in Primam partem Commentarii I-King。將友仁P. Michael Benoist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卒於中國者，曾譯書經，稱「中國最古之年鑑」，亦未刻，原稿存Kazan圖書館。（Cordier，col. 377）詩經之拉丁文譯者爲孫璋P. de la Charme，時在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至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始有印本。劉應主教Rt. D. D. Claudus de Visdelou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卒，遺有禮記譯文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等章，未刻。又書經四卷，六冊，鈔本，藏梵蒂岡圖書館。（Pfister，p. 455-6）春秋之拉丁譯文，則S. Faye所錄，藏於彼得堡研究院集刊者。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在澳門身故之郭中傳P. J.-A. de Gollet譜有鈔本四帙，其第一本爲春秋節譯及書經紀年者與書經中之日蝕。今藏巴黎Ste-Geneviève圖書館。（id. p. 562）孟子之拉丁譯本，出世較晚。道光四年（一八二四）至六年（一八二

九）Stanislaus Julien譯，巴黎亞洲學會刊行。原名甚長，說明孟子為中國哲學家中學說與地位最近孔子者，曾譯為拉丁文與滿文，並於原文之外，附譯註解云云。(Cordier, col. 1405—6）索若粲請傳方濟會以道德經譯本寄法國。(Pfister, p.4—8）但不知是否為拉丁文也。傅聖澤主教RR. D. D. J. F. Fouquet則兩有拉丁文及法文所譯道德經，約成於雍正七年（一七二九）間。(Cordier, col. 1089) A. Reichwein著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交通史略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五章，曾述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某耶穌會士譯道德經為拉丁文，其稿至今猶存倫敦印度事務局India Office。時方濟與聖澤，咸先後謝世，不詳其為何人也。同治三年（一八六四）Stanislaus Julien譯三字經，刊於巴黎。越五歲，納玻利文華書院學生郭若瑟（譯音）亦綴之譯，並附中拉字彙。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國人郭成章與Ph. Fr. de Siebol譯新增字林玉篇，註日本文發音。次年成章又有千字文譯本。(Cordier, col. 1739, 1435—440)。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至八年（一八八二）晁德蒞以拉丁文編中國文學課本曰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凡五巨冊，收四書、五經、三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古文、尺牘、八股文、駢體文、詩、詞、歌、賦、小說、對聯等。或全譯，或不全譯。唯體例雜亂，然拉丁文所譯我國文學作品，就內容言，終不能不以此為最富也。

譯入漢文之拉丁名著　元大德九年（一三〇五）教廷駐京門使官，大都總主教孟高維諾嘗有書致歐洲云：「聖詠Psalmi一百五十首，聖詩Hymni三十篇，及大小日課經二部，余皆已譯為蒙古文」。惜譯本不行世，不知其為蒙文抑漢文也。崇禎九年（一六三六）陽瑪諾P. Emmanuel Diaz (Junior) 聖經直解梓行，文筆贍雅，近年李問漁之新經譯義，馬相伯之新史合編直講，蕭若瑟之新經全集，亦皆拉丁文聖經譯本之善者。相伯先生晚年又有「救世福音對譯」，字斟句酌，最稱精審。惜氛未靖，稿成待刻。利類思P. Ludovicus Buglio於康熙九年（一六七〇）譯彌撒經典Missale Romanum十四年（一六七五）譯七聖事禮典Rituale Romanum及司鐸典要Theologia Moralis，其教中重要經籍。司鐸課典Breviarium Oranum 則原書今佚。De Imitatione Christi 十五世紀為歐洲僅次於聖經之宗教修養書之著者也，理深詞茂。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陽瑪諾譯，名輕世金書。用書誥體，益鄞人朱宗元為之潤色者。惟所譯不全。其後續出譯本，無慮十餘種，而以蔣邑虛師主編為較善。教會經言古西之精譯者，多兼信達雅之長。此固由於教會鄭重將事，而得力於明末名教中人徐光啓李之藻輩者亦多。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印行之聖教日課，集陽瑪諾，伏若望P. Joannes Forez 費奇規 P. Gaspard Ferreira 費樂德 P. Rodericus da Figueredo 郭居靜P. Lazarus Cattaneo 諸人所譯祈禱為一編，流傳至今。惜三百年來，各地翻刻者，頗多竄奪。其譯於乾嘉後者，其辭句亦遜色多矣。清初湯若望P. J. Adam Schall von

Bell譯，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絳州梓行。靈性理證，衛匡國P. Martinus Martini譯，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杭州刻本，即Lessius名著De Providentia Numinis et Animae immortalitate之分譯也。超性學要為天主教神學大師聖多瑪斯 S. Thomas Aquinas所著神學大綱之節譯。凡三十二卷。成於利類思手者凡三十卷，又三卷，安文思P. G. de Magalhaens所譯。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及康熙十五年至十七年（一六七六—一六七八）陸續出版。此外，則乾隆間供奉內廷之畫家賀清泰P. L. de Poirot譯有古新聖經，上海徐家匯及北平北堂藏書樓各有鈔本。全部聖經，所缺無幾。魏繼晉P. Florian Bahr之聖詠續解，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印行。殷弘緒P. Fr. Xav. d'Entrecolles之訓慰神編，書成於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俱為精心之作。

我國天主教經典教書之譯自拉丁文者，並不甚富。則以譯文艱澀，領略為難，故多舍繁譯而從簡譯也。雍乾後，法國教士驟增，自法文譯入之教籍漸出。而譯自義葡英等國者，亦往往有之。民國三十年全國天主教與耶穌教學人合立專社，專事翻譯十六世紀前之經籍，教中拉丁文名著，尤所重也。

教會典籍而外，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之幾何原本，即三十三年前羅馬出版Clavius（書中稱丁先生）拉丁文譯本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V之前六卷。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杭州李之藻與傅汎際P. Franciscus Furtado譯亞里斯

多得De caelo et mundo爲寰宇詮六卷。又三年，復譯亞氏所著辯證法大全之疏解，名名理探，凡十卷，原定計劃爲二十卷。天啓四年（一六二四）畢方濟P. Franciscus Sambiasi口授，徐光啓筆錄之靈言蠡勺，則經院哲學之心理學也。倫理學有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高一志P. Alphonsus Vagnoni所譯西學修身。此四書者皆葡萄牙Coimbre大學講義，爲亞里斯多得哲學之詮釋者。原書在當時俱膾炙人口，推爲傑作。天啓五年（一六二五）西安刊印金尼閣所譯況義，即近人所稱伊索寓言Fabulae Aesopi也。其書原爲希臘文，然尼閣所據者固拉丁本也。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一）衞匡國作述友篇，刻於杭州，蓋即譯西塞羅Cicero塞納加Seneca諸家之交友說者。近上海土山灣書局出版西塞羅文範Ciceroniana Syntaxis et exempla則雜取西氏文例，譯爲修詞範式。其他種語文所譯拉丁名著亦時爲國文者，不具述焉。

五　中國拉丁文典述例

各國文字之傳於異域，文法書與讀書皆爲不可少者。以拉丁文譯爲中國文法書者，衞匡國之Grammatica Sinica，或爲先河。今存格里斯哥大學Hunter博物館。或曰卽柏應理所增訂者。柏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回歐時，曾攜與德國醫師Christian Mentzel研討漢文。其人乃作漢文入門Clavis Sinica未刊。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P. Franciscus Varo著官話簡易讀法Facilis et Perspicua Methodus ad Linguam Mandari

nam addiscendam，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納致利文華書院石印，名「利學指徑」。（Cordier，col. 3913）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彼得堡皇家研究院刊印 Bayer 氏之拉丁文「中國大觀」，其第一册為中國文學在歐洲之歷史與進展暨中國文法等，第二册則為中國及方言。馬若瑟 P. de Premare 以拉丁語寫成馳名歐洲文壇者，嘗著中文概說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成於廣州。其書於漢字之構造及性質，論列頗詳，舉例一萬三千餘則，為西人研究我國文字學之鼻祖。馬氏以其書寄法國學者傅 Fourmont 校閱，乃竊其材料，自著中國文典。嗣由 Abel-Rémusat 為之揭露，真相始白。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麻六甲英華書院重印流傳。其書搜採繁密，譯各國文甚多，至今不廢。汪達洪與駱濟明琳若著「辣學發音拉丁語詁」鈔本。見第四節。（Cordier，col. 1402）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澳門聖若瑟王家學院出版 J. A. Gonsalves 著拉丁字文（原名）Grammatica latina。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貴陽有木刻 Elementa Grammaticae Latinae，胡主教 R.R. D. D. Faurie 著。八年（一八六九）上海晁德蒞著拉丁文字（原名）Emmanuelis Alvarez Institutio Grammatica，俱為中國學生用者。自是，海內各地教會譯作紛起。上海之辣丁文律 Adjumenta 辣丁文入門 Latinae linguae Elementa，辣丁文進階 Latinae linguae Rudimenta。香港之辣丁文範 P. Crouzet：Grammatica latina 重慶之拉丁文字 P. Gourdon：Gram. lat. 北平之 A. Hubrecht：Elementa

Gram. Lat. 及Exercitia Latina各四冊。較晚之P. Monfet：Institutiones linguae Latinae。近山東兗州出版拉丁文學Statistica linguae Latinae曰位雷論，曰文藻，曰詩韻論，曰文章論，皆為後起之秀。其拉丁文初學、詞學、句學、及拉丁文句語彙全本，亦非前此諸家所能逮及。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拉丁西文文法亦刊印問世。

詞書之最早者，有郭居靜與利瑪竇合譔之Vocabulari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aeo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譯曰，按西文字母及中國韻音排列之字典。Kircher(China, p. 118)曰，其書原稿為余所藏，倘得剞劂之資，即可刊刻。其次則為西儒耳目資，詳前。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柏應理記曰：「恩理格之中拉大字典已付印」。然其書迄未發見。（Pfister, p. 366）其書名「文字考」。二十四年（一六八五）Mentzel在德國出版拉丁漢文小字彙 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 Characteristici 及中國字彙式例與文法之建立 Specimen lexici sinici et grammaticae institutio後者未付梓，今藏柏林國家圖書館。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澳門P. Bazilius a Glemona著中拉字典，名漢字西譯，傳鈔頗多。次年，巴多明譯Danet拉丁字典為漢文，大部份為Rayer纂入其自編之字典，原稿存Hunter博物館。乾隆時，北京教士奉旨譯六國字典。六國者，中拉法義葡德是也。漢文屬之魏繼晉。其原稿當存於北京北堂圖書館（Pfister, P. 750）其書與錢德明所譯梵藏滿蒙漢字典，同為鉅著（而

p 846）武昌天主堂藏有 P. Vincentius dell'Aquila 被捕在獄所撰拉丁中華字典，十八世紀物也。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澳門出版范尚人 J. M. Callery 著 Systema phoneticum Scripturoe Sinicae，漢文名字聲綱目，凡上下二集，上集爲序引導言，並述漢字之發音及書法，下集爲正文。其編列不按部首，而循音律，如刀忉釖魛叨舠，悉歸一類。范氏以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東渡，欲赴朝鮮傳教，渠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也。後留寓澳門，二十二年脫離宗籍，二十四年任法國使臣剌萼尼 de Lagrainé 譯員。後返法，任外交部漢文秘書。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卒於巴黎。余所見凡二版，一署中國傳教士，一署都靈科學院會員，皆澳門梓行者。咸豐元年（一八五一）Joach. Alp Consalves 著 Lexicon Magnum Latino Sinicum 漢名「辣丁中華合字典」，亦出版於澳門。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上海點石齋重印，共七七九頁。次年，北京亦再版。諸書復稱珍本，而字數仍達一萬五千有餘。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香港出版方濟各會士 Fr. Hier. Mangieri A. S. Arsenio 著中拉字典，凡一千餘頁。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貴陽童文獻司鐸 P. Paulus Perny 著拉丁中華字典，凡七百三十頁，裒然巨帙，木刻，至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已僅存三本，板亦遺失，乃重刻，費銀一百兩。（Cordier, col. 1588—92, 3907, 1604）余藏有重刻本，現亦罕見。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巴黎出版童氏所著法文拉丁中華會話集，華附註音，名 Dialogues Latin-chinois Traduits mot à mot avec la prononciation

accentuee。光緒三年（西一八七七）河北獻縣出版中拉字典，附法文短註。次年，北平刊行中拉字典，則依據五方元音而編者。十八年（一八九二）獻縣顧賽芬P. Couvreur撰拼補字彙，正字通，佩字韻府及康熙字典等，譯爲中華拉丁字典。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江蘇貝迪榮P. Corentinus Petillon亦編中華拉丁字典，簡明過於前。袖珍本甚便。惜晁德蒞所譯佩文韻府，手稿猶存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民國三十一年夏，余於貴陽獅子壩新建修道院工場內，發現一中拉字典殘本。院長謂將付火，余乃請以惠賜，竟蒙慨允，其書自十三頁以前及四百四十頁以後皆缺，印刷頗佳。其編排法乃以書之上端一漢字拼合成音切，後分平上去入而排列。下端二字蓋猶西文之母音字，計分天，人，龍，羊，牛，獒，虎，駝、蛇，馬，豺，地等十二年，其下因殘缺，不知尚有否。其上則爲土，鳥，雷，竹，虫，石，日，蘭，鵲，系，雲，金，禱，火，蛙，柳，鮑，木，風，斗等十二字。其他中拉拉中字典，稿成未刊，藏於世界各國圖書館者，據Cordier, c l. 1629—27, 3906-9，1592所記，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者二種，在倫敦亞洲王家學會及不列顛博物院者八種，在格拉斯哥Hunter博物館者二種，在斯德哥爾摩王家圖書館者六種，在柏林圖書館者二種，在紐約者三種，在梵蒂岡者七種。舊莫利遜文庫（今東洋文庫）所藏之中拉字典，則爲P. J. Fernandez手蹟，以雍正二年（西一七二四）完成於宗德者。貴陽方修院藏中拉字典鈔本一巨冊，共七九九頁，余於民國三十一年夏見之。第一字爲「cia

淪」，飛機一字為「yün詠」。書末跋曰：此係增訂本，署名 C. S. M.，不詳何人。近年新教會及香港，北平，上海所藏，為數亦必可觀，不暇悉計。其具專門性質者，則有民國十年P. A. Schnusenberg 舒司鐸與P. Th. Mittler 苗司鐸合譯之拉丁中華哲學辭典 Terminologia Philosophica Latino—Sinica及民國十二年 P. P. Bornet 鄂司鐸，P. G. Oliver 何司鐸與國人劉司鐸合編之教理詞典 Adjumenta Missionarii Thesaurus Latino—Sinicus。

拉丁文與漢文編著之詞書，更有旁及其他各國文字者，實拉丁文傳入我國之又一頁獻，亦略述其概。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霞文獻法拉中字典刊願於巴黎。十二年（一八七三）P. Delamarre亦著法拉中字典，稿存香港巴黎外方傳教會。其書并附英漢字及拼音，都一千五百餘頁，宏著也。嘉慶十三年（一八一三）巴黎王家印刷所刊印中法拉字典，廣州法領事德金 U. de Guignes 奉拿破崙命所作也。亦名漢字西譯。原書長四十五英寸，闊三十五英寸，厚十三英寸，碩大無朋。然有重印者，删其法文，名漢洋字典，以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重印於香港，惜燬於火，存者絕鮮。不列顛博物院藏有德拉中字典，Heurnius 著，內容未詳。梵蒂岡藏有拉義中字典，雍正十年（一七三二）P. Fr. Carolus Horatius a Castarano 所作，序末註北京海甸。其稿之成，歷時凡二十九年。自謂於德法義班英荷

之商人，亦有補益。梵蒂岡又藏有拉丁文之中義字典，為廣州西班牙教堂刊印。斯時斯驛王家圖書館藏有拉丁文之中葡字典，出葡人手，收七千餘字。又葡文之中拉字典，字首按部首排列。梵蒂岡殿鈔本字典中，亦有葡中拉字典一種，註釋用拉、葡、班、法諸文，為巴多明贈於俄國駐北京使節者。拉丁文譯班字典，作者P. Franciscus Diaz，時任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稿存柏林國家圖書館。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巴黎印行G. Pauthier編中越（南）拉法字典。西人所作第一部藏文書，則為P. Dominicus de Fano之拉丁西藏字典，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Fourmont曾錄一副本，由Pierre le Grand轉贈法蘭西金石美文研究院。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羅馬教廷傳信部出版奧斯定會士P. P. Horacius della Prna，Cassianus Beligatti di Macerata合著藏文字母，以拉丁文拼藏音。三十八年（一七七三）P. C. Beligatti又以拉丁文著西藏文法研究，同唐古文及西藏文初學。咸豐二年（一八五二）羅司鐸P. Renou著藏法拉字典，未成，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丁司鐸P. Desgodins續編之，得在藏教士之助，書成，乃選赴香港自鑄字、排字、校字，皆一身任之。民國五年康定倪德隆主教RR. D. D. Giraudeau註著拉藏字典，又集上述羅丁二司鐸及蕭司鐸Faves諸人原作而成拉法藏字典，北平北堂藏有拉丁文漢蒙法字典稿本，則孫璋之手著者。孫以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卒。道光十八（一八三八）拉丁文之中韓字典出版行世。其書原稿為朝鮮，郭成章著，P. P.

de Siebold譯，書末並附中韓日名詞表。（Cordier, col. 1603，1590，3008，1637-63，3910，1624，1626，1507又教育叢刊第八卷第七、八合期，p. Goré 古司鐸著，Bibliographie Thibétaine Catholique）其在中國刊行之純拉丁文雜誌，而在歐洲發揮出版者，有北平之Sacerdos in Sinis（民國七年創刊）及濟南之 Apostolicum（民國十九年創刊），皆月刊也。與其他文字合刊者，則爲數頗多，而Collectanea Commissio Synodalis（民國十七年創刊，中文名爲教育叢刊）爲最著云。

六　結論

中國，羅馬爲歐亞兩大帝國，今歐人稱中國曰 China（英文）Chine（法文）Cina（義文）者，皆出於拉丁文之 Sina，其語源則爲 Sin 或 Thin，是爲「秦」之北方音。後漢書西域傳謂：「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蓋中國與羅馬，互以「大秦」稱也。又其時則稱中國 Sera，Seres，Sericum，Cericum。羅馬詩人 Publius Virgilius Maro（公元前七十年至十九年），Quintus Horatius Flacus（公元前六十五年至八年），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四十三年至公元後十六年），地理家 Pomponius Mela（第一世紀時人），自然科學史家 Caius Plinus Secundus（第一世紀時人），歷史家 Anraeus Florus（第二世紀時人）與Ammianus Marcellinus（第四世紀時人），皆有記述，由來遠矣。元後，中西文化之溝通漸盛，傳教士或非教士之

拉丁文遊記者甚多。若馬哥波羅遊記，雖以義大利方言寫成，而在各國譯本未出前，傳譯全歐者，實拉丁文本也。教士柏郎嘉賓 P. Joannes Plan Carpinus，羅伯魯 P. Gulielmus Rubruckus與和德理Beatus Odoricus a Pordenone之回憶錄，大都總主教孟高未諾及刺桐 Zaitum（泉州）主教之報告書，俱爲今日言十三四世紀中西交通史者所必知，而無一非拉丁文也。明末，教士東度來華，於東西學術之交流，功績尤著。衛匡國之韃靼戰紀 De bello tartarico (1654) 及中國新圖誌 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 卜彌格 Michael Boym 之中國植物誌 Flora sinensis (1656) Andreas Müller 之中國史鑑，Basilicon Sinense (1674)，柏應理之中國歷史紀年表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1686)，卜彌格之中國脈理醫鑰 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1686) 等，皆十七世紀研究中國學術最早之作，而俱以拉丁文寫成者。其他有關天文，算數及我國儒學之拉丁文載籍，充棟汗牛，非片文所能盡也。風氣既開，歐洲學者，雖足未履中國，亦起而探密，所謂「中國學」Sinologia 者，亦於是確立，而最初發表者，要以拉丁文爲主。若 Athanasius Kircher 之「教內外文獻中之中國」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illustrata (1636)，Leibniz 之中國近事 Novissima Sinica (1697)，Christian Wolff 之中國實用哲學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皆其著者。即泰昌元年（一六二〇）金尼閣第二次來華時，[illegible]

祿五世 op. Paulus V 贈書七千部，（見拙作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牧斯北辰扇三卷第四期）亦以屬拉丁文者為多，今北平北堂藏書樓猶有存者。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澳門出版孟三德 P. Eduardus de Sande 著「日本遣使羅馬教廷記」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m Curiam，為我國刊印之第一部西書。（Cordier, L'Imprimerie, p. 65）天啓五年（一六二四）金尼閣亦在絳州及西安建立廣大工場及印刷所，每年出版中文書籍甚多，並有拉丁文著作。（Pfister, p. 116）及尼閣至杭州，則亦負監理印刷之責。（Dehaisnes: op. cit., p. 206）此種拉丁文書籍，實希世之珍。內地出版西書，此殆始祖也。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北平出版之彌撒經典，亦附拉丁文，俱不可多得者。

今夫世界之變幻，影響於文字者甚鉅。吾儕失其故舊者有之，漸滅不存者亦有之。高盧人（Gallus）與西班牙人古文字，因臣屬羅馬而絕跡。世法荷西語則同化於日耳曼語。今日之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蘭西人，皆自北歐南遷者，若其為羅馬奴役也，固習用拉丁語，迨拉丁漸衰，則又蛻變為現代之法義班語。希臘文與加爾代文在近東失勢後，土耳其文與阿拉伯文遂起而代之，皆一理也。友人閻君在寬「論語言之借用與混合」，說明一民族之文字，必有借語，或曰外來語。於是原為外國語者化為本國語，原為本國語者，因為外國所移借，重又輸入本國，音形既變，轉為外國語化，歷時既久，代遠年湮，不特忘為

所自，即語義亦有一再改易，不可究詰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著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語言學與古代中國書中之「酪」，出lak，glak，若窮其源，則係阿拉伯之arak，為蒸溜液之義。但其後則又引申為烈酒之名，方以智物理小識所謂：「燒酒，元時始創其法，名阿剌吉」。阿剌吉即 arak 之音譯也。（學思第一卷第四期）文字之錯綜變幻，誠有不可思議者。天主教欲以不變應萬變，固守拉丁死文字，（教會中用拉丁以外文字者，僅絕少數）蓋有至理存乎其中。吾人讀教史，見教義之爭，往往起於文字之末，然而卒不動搖者，即在其文字之死，惟其死也，乃能有固定之含義。舉例言之，三位一體之位字 persona 曰字 substantia，天主降生之曰 incarnatio，天主性結合人性之曰 unio hypostatica，咸艱深難解，然其字義則可以亙萬古而不變。方教之初入我國也，於教理詞之翻譯，亦經詳慎異常，凡無適當之譯名者，概以音譯代之。天主曰陡斯 Deus，聖父曰罷德肋 Pater，聖子曰費畧 Filius，聖神曰斯彼利多三多 Spiritus Sanctus，聖寵曰額辣濟亞 Gratia，福音曰萬日畧 Evangelium，天堂曰巴辣抵瑣 Paradisus，地獄曰因弗爾諾 Infernum，聖事曰撒格辣孟多 Sacramentum，痛悔曰白尼登濟亞Paenitentia，告解曰恭斐桑 Confessio，主教曰俾斯玻 Episcopus，司鐸曰撒責爾鐸德，或簡稱鐸德 Sacerdotes，皆是也。鐸德一名，通行於教中，其他則與彌撒 Missa，奧斯弟亞 Hostia 等同為中西混合語矣。

如上所云，教會之所以保守古代用語，蓋因流行語時起變化，意義不易確定；甚或遺人笑柄。Marot 氏曾譯法文聖詠，文筆優美，在當時無出其右者，然今日讀之，鮮有不失聲而笑者，蓋因其中若干語，在現代法文祇於滑稽詩歌中可以見之。拉丁文之統一西歐教會，史有明徵。且各地主教集會時，苟有一種可以共喻之語言為發表思想之工具，則各方意見，亦易表達，而可免翻譯上之損失。此蓋為教會採用拉丁語之又一原因。

或謂教會用冷僻之文，教徒非素習，奚益？曰：教會亦嘗命以各國語文解釋一切經義矣。（參閱脫利騰大公會議 Concilium Tridentinum 二十二期八章）教士散處各國，必以方言講說，教徒因以獲彼教之真理也。

或又曰：拉丁文之於天主教，其猶吾國文言文乎？曰：唯唯，否否。拉丁文簡潔典雅，在羅馬帝國統一西歐南歐北非諸族語異音，衆民至數世紀之久，天主教賴以維繫二千年之教會於不墜，團結四百兆之信衆而無間，我國二千年來，雖迭經變亂，而不致分崩離析者，亦文言之功，此其同也。然羅馬之亡久矣！拉丁人 Ramines 絕矣！拉丁文死矣！其所以猶存天壤間者，幸也！吾國之文言則不然。今日之拉丁文，乃天主教之「母語」，非拉丁人古羅馬人之「母語」，今日中國之文言，則固中國人之「母語」，文與國共存共榮，此其異也。若拉丁不因羅馬帝國之亡而亡，猶存於各國者，則歐洲不致如今日之諸邦分立，可斷言也。若天主教而廢拉丁文，則統一之破壞，亦可立待，古代文章之盡歸無用，更不難

瀰僕徘之。拉丁文與天主教，無國家民族關係，顧教人猶深耐精研，愛之重之，視爲[illegible]；我民族千年深厚文化之所寄乎？距晚近淺學之士，鼓本加厲，倡所謂拉文化漢字，是不啻斯自棄其文，亦將自絕其字，文字既失，吾不知國何以立？國何以一？此吾輩拉丁文傳入中國考之所以不能不有感也！

（附）拉丁與拉丁文之異譯、耶穌文、十字文、羅馬文、大西字、西洋字、喇提諾、喇丁諾、臘底諾、臘諦諾、喇地納、喇倍諾、辣丁諾、拉替努、拉提諾、拉的諾、拉丁諾、拉氐諾、拉體納、納體那、臘丁、拉丁、辣丁、納丁、懶丁、力丁、力登、共二十六種。「納體那」見光緒十八年澳門出版依澄雜說序。「臘丁」見光緒二年張自牧瀛海論中篇。「力丁」見光緒二十八年徐繼畬瀛寰志略卷四俄羅斯國。「力登」見高厚蒙求對集。餘散見本文。

浙江外來宗教史略

（一）浙江之回教

回教何時始入中國，自來即不一說。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默德那條及明一統志，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唐天寶元年長安清真寺碑，濟陽丁鶴園天方聖教序，蠡天方正學卷七回教中聖賢[illegible]默德墓誌，北平牛街清真寺七間房所懸匾額，（原額為明崇禎年重修），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均主回教以隋開皇中傳入中國。而阿拉伯易卜尼漢來都所撰旅史，則謂回教首入中國，在穆聖受天啓之後二年，即隋大業九年（六一三），而日人川村狷堂亦謂隋代時，回教初至中國廣州、福州、寧波、乍浦等處。按回教元年為公元六二二二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隋時回教尚未創立；故隋代回教傳入中國說，絕不可據。

此外尚有唐武德中（六一八—六二六）說，見劉智至聖實錄補遺篇及何喬遠閩書七卷方域志靈山條，其說亦不足信。又有主唐貞觀二年（六二八），貞觀三年（六二九）貞觀六年（六三二）者。第一說為阿拉伯文百科全書及威爾斯世界史綱所主張，而我國回回原來一書，亦採此說，第二說根據西來宗譜，第三說則根據天方正學旺各師大人墓誌，金吉堂著中國回教史研究，陳垣著回回教始入中國史略，皆辨其是非。陳氏主唐永徽二年（六五〇）回教始入中國，其言曰：「舊唐書本紀及冊府元龜均謂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

國十五年冬始，門事代外使至朝，貢有銅魚之制，雌雄各一，銘以國名，達於彼國。唐曾要之，回教入中國者，當在此，故唐為始來。」此論為我國近年之數回教史家所信從。（參閱陳垣教授回回教傳入中國各說述評，載回教論壇第二卷第四期，沈□□回回教傳入中國考，載同民言論第十期，李儼著伊斯蘭教與中國曆算之關係，載回教論壇第五卷第三第四期）

浙江之回教，蓋早或始於元時。試就古蹟與人物二者略論其概。

一　古蹟

甲　杭州回教之古墓

民國十二年六月，杭州拆城築路，在清波門城基下掘獲古墓甚多，墓石鐫阿拉伯文，及波斯文，其尤可重者大者，瀨存附近路口。民國十六年教徒馬福祥題曰：「臨安自古繁華地，南渡君臣一瞬間。七百年來王氣歇，獨留荒塚對青山。……」又曰：「杭州拆城時出古墓三塚，墓前立有石碑，蓋先賢卜合提亞氏及二從者之墓塚。」（見月華卷十一期，）會影印拓片二張，一為回曆七〇二年一月二十日，合西曆一三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元武宗至大元年），一係七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合西曆一三三〇年八月七日（至順元年）。蘊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在杭州鳳凰寺得阿拉伯文碑拓十一幅，惟以上兩幅有年月可徵云。

杭州回教除上述三古墓外，元時清波門外有聚景園者，亦該教公墓。元末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八嘲回回）曰：「聚景園，回回叢塚在焉。」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回回送終條，於敘述回教人送終情形後，曰：「其棺即日瘞之聚景園，園由回回主之。」清波小志曰：「聚景園在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匾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太后臨幸，此武林舊事所載，今則為番回埋骨之地，塌屋高低，狐狸竄伏。舊蹟如會芳殿、瀛春堂、攬遠堂、花光堂及瑤津桂影、寒碧瓊芳諸所，皆不可考，惟柳浪港一線之水，隱然在其後。」又明時丁鶴年亦葬其地，則聚景園之為回教墓地，亦已久矣。康熙巡杭，西湖十景皆有題碑，柳浪聞鶯碑亭，「因柳浪港所在偏側，欲開拓之，左右皆番回塚墓。時中丞張公敏惻然曰：聖王之政，掩骼埋胔，吾豈忍發掘久埋之骨乎，相度豐芝寺前有隙地。鳩工構造。」以上亦清波小志所記，當時回坟之得保存，亦云幸矣！按聚景園亦名西園，舊為湖山勝覽，在清波門外南，湧金門外北。

顧杭州之回回坟，就吾人所知，尚有板兒巷之金剛寺，保信巷（或作保寧巷）、中班街，馬所巷等處，則但近代所瘞者。

（乙） 杭州回教之禮拜寺及回回橋

陶宗儀輟耕錄（同上）記曰：「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田汝成錢塘遺聞軼事（亦名吳越故實），亦有薦橋回回八間樓之記載。元代杭

州回教寺及回教人住宅區，並見當時摩洛哥國人依賓拔都他Abu-Abdullah遊記，中西交通史料匯篇（同上）有譯文曰：「第三日進第三城，城內皆回教徒所居，此處甚優雅，市場之布置，與西方信回教者同。有禮拜堂，有祈禱所。余留進城數日，今日方始舉行午間祈禱。余寓埃及人鄂施曼後裔家中。……鄂曾創辦醫院，（玉爾本作僧庵）建築頗爲華麗，此外各種慈善之事，均有施行，疾病之人，居其醫院者甚衆。鄂施曼在此城曾造一回教大禮拜寺，名曰：甲瑪，瑪思及特Jama Masjid。並捐獻甚多，作維持費。回教徒在此者亦多。」然馬哥波羅遊記謂猶太人及基督教徒住第二市區，自陳垣著元也里可溫考，證明杭州也里可溫教堂在薦橋附近後，馬哥所謂第二市區，久經一般史地家公認即在薦橋一帶。豈拔都他誤第二市區爲第三市區耶？抑第二市區內亦有回教人雜居，而第三市區乃專住回教人耶，則尚待異日發現更多之史料後始能斷定也。

萬曆錢塘縣志紀制稱杭州有義寺，亦作提吾寺，「在曲阜橋西，即靈義寺，元時……。」錢塘志蓋本諸輟耕錄也。輟耕錄（同上）曰：「畏吾兒等有畏吾寺。」西湖遊覽志……十八，作「靈鷲寺，在曲阜橋東，元至正二十一年，浙江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建。本名撒族，故稱畏吾寺，俗訛爲靈鳥寺。洪武三十四年改今額。」日人藤田豐八著東西交涉史之研究，疑爲佛刹或喇嘛尼寺，然亦有疑爲回教寺者。錢塘志又記「眞教寺，在西文錦坊，一郡志名禮拜寺，係回回國人香火，巋然寺中，嘗遺有爲勒石者，不知何故。」眞教

杭州府志曰：「眞回寺舊名回回拜佛堂，土人稱回回新橋。」蓋以其寺鄰橋，故有此稱。輟耕錄亦曰：「上珠寶巷有回回新橋。」于敏中浙中鹽覽云：「眞教寺作正教寺，謂在薦教坊北。」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十八稱：「眞教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寺基高五六尺，扃鐍深固，罕得闖入者，俗稱禮拜寺。」杭州回回寺之起於延祐間，並見萬歷錢塘縣志，武林梵志及西湖志餘。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五，則更記：「眞教寺內存永樂敕諭碑，景泰中復葺，崇禎間毀。」而錢塘志對當道爲回寺作碑勒石，表示不滿，而不知永樂間回寺內且有敕諭。於以見明代杭州回教之盛，並以見外來宗教之易爲國人嫉視也。又康熙秀水縣志卷七古蹟，亦述及杭州眞教寺，見後。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則藏有杭州回回寺圖。見法人A. Vissière維希愛著中國回教研究Etudes Sino-mahometanes。按杭州回寺爲鳳凰寺，寺門作得勝坊式，頗宏麗，杭城修築馬路時被毀，論者惜之！

康熙九年（一六七〇）杭州回教名流丁澎（詳後）作眞教寺碑記曰：「武林眞教寺居城之中，巍然高峙，左顧江海，右映湖山。若東南之鉅館，壯江山之形勢，茲寺信一方之鎭場，創於唐，燬於季宋。元辛巳年有大師阿老丁者，來自西域，息足于杭。睹遺址而憮然，捐金爲鼎新之舉，表以崇閎，漆以修廡，煥然盛矣！無何，而守者不戒，復燬焉。按洪武中有咸陽王賽典赤七代孫給智[illegible]內府宣論，允各省建造禮拜寺，歷代賜敕如例。我大清定鼎，遐邇內外咸爲臣妾，而吾教之行於中土，較前尤盛，順治丙戌歲，中州孫公覲樂蒞

與陸姿，搆偉宏建，飛丹流碧，其規模術早於中土焉。」讀此，則杭州禮拜寺之略史，已可知一斑，而清初時之壯麗，亦不難閉目想像得之。

康熙間，西教士Gobian（華姓氏待考）記杭州天主堂曰：「此堂實爲彼時全國最大最美者，非過譽也。華麗宏壯，雖不及城中之主要回教禮拜寺，然裝潢整潔，則過之。（見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 Nos 1—2, 1933, P. 82） 文中以天主堂與主要禮拜寺相較，可見此外尚有其他規模較小之禮拜寺也。

楊文杰東城紀餘錄上有回回城一則，轉載陳良謨見聞紀訓，無足錄者。惟許後孫涵跋，以也里可溫之大普興寺爲回回寺，則誤矣！

亞所謂回回新橋，或簡呼回回橋，亦名祈善橋。郭西小誌稱回兒橋，謂：「住持封篩建於明成化間，有攬月樓，道問學堂」。亦杭郡回人一大古蹟也。

（丙）寧波之回教寺

寧波有禮拜寺二，延祐以後建，見至正四明續志十。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美術篇第三節曾言及。顧案頭無四明續志可稽，無由知其詳也。

雍正寧波府誌卷三十三寺觀，記寧波回回教寺在「縣西十里，宋建隆三年間，僧坦[illegible]，明洪武二十年重建法堂五間。」建隆三年爲公元九六二年，將一千年矣。而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去今亦五百五十餘年，實浙東回教最古之寺也。近人何友仁著寧波回教堂考略，復

云：「堂原名爲清眞古寺，今改爲回教堂，當地人多稱回回堂。其歷史之久，頗值注意。據本地老人云：該教堂之建築，相傳爲一海外商人，約有船隻數十，來此貿易後，建立此寺，此說無所徵信。依該寺之重修記碑云：據稱唐代有鳳凰寺後，亦即有此寺。亦莫考其年歲。按鄞縣縣志，該寺之有，自宋元豐間，建於東南隅，獅子橋北；元時又燬於東南隅，海運所南，即今鄞地之冲虛觀前。明末燬於兵燹。清康熙三十八年後，建於西南隅，月湖之濱，虹橋西畔，爲明陳悲深公祠之隙地。乾隆初，爲王斗文阿衡重修；迨四十一年，又爲江夢麟阿衡偕張光祖，馬廷元等重修；嘉慶十九年，王錫蔡春又修高殿，設三門石柵。道光十二年，殿宇牆垣毀於颶風，馬振川阿衡偕張飛橋，馬熙三三人出貲補葺之；又租陳公祠地之餘，爲闢牆外基。粵匪擾後，有西門阿衡某，又集資修之。同治十一年，白玉庭阿衡，袁梅亭，張小樓等又修之。」此民國以前，寧波回教寺之沿革也。（何君原文見回教論壇第三卷第四期）

（丁）嘉興之回教寺

康熙秀水縣志卷七古蹟記回教寺曰：「教人獨杭省爲最著，杭縣有眞教寺，宏麗甲天下。其衍在禾郡者，久闕表建。今教人馬仲偉等捐金買街隙地於治東之通濟橋南，稍倣杭制而起建，以宣教諭焉。」今嘉興回教寺有萬曆三十年嘉興府新建眞教寺碑記，余嘗親訪。康熙秀水縣志卷七碑記亦著錄。寺又有重修嘉興府禮拜寺碑記，因在暗室，不能錄

鐘，僅「乾隆丙寅丁卯間」數字尚易辨認。堂長為余言，碑實乾隆年間立，當可信也。雖碑亦在嘉興府治東門內通濟橋畔，與志所云通濟橋，微有不同耳。就余實地考察所獲，寺實在橋西南，兩說各有所偏也。

（戊）其他

浙省回教較盛之地，尚有溫州、台州、鎮海、衢州、處州等，現台州及鎮海皆有所謂回回弄者，歷史亦俱頗久遠，限於篇幅，當俟異日另詳也。

（二）人物

（甲）回人至浙江之淵源

西湖遊覽志卷十八記曰：「宋室徙驛，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號色目種，隆準深眸。」元典章二十二戶部雜課曰：「……於大德元年（一二九七）五月初七日奏過事內一件，也速答兒等江浙省官人每說將來有阿老瓦丁、馬合謀、亦速福等斡脫每作買賣呵休與稅錢麼道執把着聖旨行有來怎生麼道說將來有啓與等奏將來拔亦的兒哈是稅錢……」斡脫即猶太，阿老瓦丁等又皆回教名，蓋元代江浙行省奉回教之猶太人也。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九[illegible]錄謂：「正統三年（一四三八）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十八人，自涼州徙至浙江；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其後絡續至者，未易悉述。

（乙）浙江回教名人舉例

（1）贍思　贍思，元史卷一九〇儒學傳中有專傳。字得之，太宗時，祖魯坤因入仕中國，家於真定；父斡直，絕意仕進。贍思幼聰慧，稍長，博覽羣籍，隱居篤學。泰定三年（一三二六），詔以遺逸徵至上都。後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一三三〇），召入為應奉翰林文字，以所著帝王心法進呈文宗，言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後至元二年（一三三六）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既而又分巡雲南，所至以為民謀福。次年，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浙西郡縣，無敢食墨者，並建議罷將浙右諸僧寺之道人、道士、行童等，勒歸本族，並人官濟常徭，隱徭役，妨國而蠹民也。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至正四年（一三四四）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一三五〇）召為秘書少監，議治河事，皆不赴。十一年，卒於家。謚文孝。贍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旁及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及外國之書，所著有文集三十卷及其他書十餘種，今僅存河防通議二卷，四庫著錄。贍思亦善八分書，張相文藏有所書哈珊神道碑，陳垣跋。見陳著元西域人華化考。

（2）丁鶴年　鶴年，明史文苑傳有專傳，取材於戴良九靈山房集高士傳及烏斯道撰丁孝子傳　其他則有寧波小志，浙江通志　杭州府志，亦俱有記述。今摘要錄為小傳。

鶴年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以助軍餉有功，世祖賜田宅京師。烏馬兒累官甘肅行省

左丞。祖苦思丁，累官至臨江路達魯花赤，有政聲。父職馬祿丁，爲武昌縣達魯花赤，爲民所愛，卒於官。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淮兵毀武昌，鶴年奉母走鎮江，母歿，流寓杭垣。復避地四明，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又展轉逃匿，賣藥自給。及海內大定，乃還武昌，爲父築墓，見生母遺骸而葬之，人咸稱其孝焉。鶴年天資穎悟，窮經博史，尤工於詩，爲文有奇氣。嘗曰：吾宗兩貴顯，然以文學知名於世者恆少，吾欲奮身自爲儒生，豈隊隸襲先蔭，苟取祿位而已耶？倘氣節，竟然諾，專以躬行爲學，非其衣不衣，非其食不食，而好赴人之急。晚年，益剛於憲。以避寇東，與僧人往還頗多，誠爲其學浮屠法者，非也。永樂中，卒於杭州，清波門外聚景園。所著有鶴年吟集，丁孝子集，或題丁鶴年集。

（3）吉雅謨丁　鶴年從兄也。二人甚友愛。吉雅謨丁豫爲亭時，欲以利祿勉鶴年，鶴年不顧而去。後以直言忤權貴，謫遷江右，道里梗塞，僕隸皆揮之，鶴年乃獨衝寒雪，冒險從之。後吉雅謨丁遷浙東，鶴年徒步往依之。吉雅謨丁有漢姓曰馬，字元德，至正間進士，嘗任奉化州及昌國州。高士傳附述頗詳。

（4）薩都剌　字天錫，有雁門集行世，回回教世家之中國詩人也。

（5）合剌甫丁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禮俗篇第四節曰：「阮元西浙金石志卅六，合剌甫丁墓碣，爲泰定元年物，得諸南屏山麓。無額，上刻雙月之形，雙月形者，回教徽

號，時論今新月旗也。碑稱：公以勳伯顏丞相薦，充嘉興上海縣達魯花赤，累調紹興之山陰，衢之常山，建康之句容，過化之地，皆有恩澤及民。及急流勇退，隱居於杭之豐樂橋東，樂逸園，植花竹，爲高世避賢之舉，以禮義教子孫，以詩酒交親友，視富貴如浮雲，得遊遊物外之意，易所謂知進退存亡者，公有之云，」以至治三年卒，年七十有四。葬於錢塘之西湖之園云。

（6）薄傅　回回人，蓋其兄名道剌沙，因元代回人習用之名也。改姓薄，字仲淵，崔灝薄埞集卷七有西域浦氏定姓碑文，稱其：「性穎悟，從名師傅，通毛氏詩。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辟教諭嘉興，遂占籍焉。一廻道吾，任同知溫州路總管府事，事蹟不詳。

（7）買閭　字兼善，嘉興儒學教授。嘗築一樂堂，王逢梧溪集卷五，有懷嘗撰序云：「慨清：美萊閭教授敬親愛弟也。惟敬愛也，不以禍亂離獨少渝焉。構堂名一樂，前朝儒吏，可頌可備至，而琴操缺遺，故予補之云。」

（8）丁澎　亦作丁鵬，爲杭州眞教寺碑記之撰人，又嘗撰天方聖教序，俱載劉智天方至聖實錄。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七及光緒二十五年重刊本浙江通志卷一七八人物六俱有傳，茲節錄記之。先生字飛濤，號藥園，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禮部郎中。少有雋才。與兄景鴻及弟漾，並稱三丁。襲家有白燕樓詩，爲與下士女所傳誦。初與同里陸圻，

者先俗等稱西冷十子，爲鐘錢，又與宋大訪龔翔麟輩七子。與同時南鄉試，讀居翁上五年。歸田後，不問戶外事，而自娛於文，工辭。康熙癸亥，輯浙江通志，曾董其事。清扶荔堂集，藥園集，今皆不見。浙江通志文則引吳農祥丁鶴傳，吳氏原傳亦未見。

（二）浙江之猶太教

浙江今日無猶太教，往昔所有，亦僅限杭甬處三處，試分述之：

（一）杭州方面

（1）唐末阿拉伯人頭齋在特海森 Abu Zaid Hassan 記黃巢破 Khanfou 時，屠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及拜火教徒自十二萬至二十萬人云。

Khanfou 爲今何地，據吾人所考，尚不能有確定之答覆；或曰廣府，或曰澉浦，或曰杭州，且俟異日之發明。（詳見拙著清末教友發見之地 Khanfu 位置攷載我存雜誌四卷二期）

（2）歷史家，猶太人來中國甚早，開封猶太教[illegible]康熙碑謂來自周時，俄人維那古拉多夫亦有是說，又古經依撒意亞第四十九章之 Sinim 或即指秦，（余另有詳考）亦在周平王朝。然猶太人之來華，以絲亦一大原因，吾浙夙爲產絲著名地，蘇杭尤稱蠶絲淵藪，杭州之有猶人足跡，亦爲有必然者。猶太教既爲民族宗教，故猶人所至，教必隨之，惟不向外宣傳耳。此則余個人之臆說也。

近人黃義撰中國猶太人考（載文化建設月刊一卷四期）從學實上證明猶太人之來華必已久遠，至少在耶穌紀元及聖地陷天之前，頗有見地。

（3）馬哥孛羅遊記中曾謂北京，杭州等處多有猶太人居住。

（4）我國史書上稱猶太之名有二：一曰朮忽，即阿拉伯文 Djuhud 之譯音，一曰斡脫，即希臘文 Joudaios 拉丁文 Judaeus 之譯音。（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滙篇第四册及元史譯文證補）

元典章（一六〇）載：「大德八年七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為諸王駙馬，各枝兒勾當，在各路裏幹辦公事，論馬分例等事。……他每的投下催趁斡脫錢、地井、造作勾當等。……」

又（二十二）戶部雜課：「大德元年八月，福建行省准中書省咨，江浙行省咨，杭州稅課提舉司，申：……事，准此。據大德元年五月初七日奏過事內一件。也速答兒等江浙省官人每說：將來有阿老瓦丁、馬合謀、亦速福等斡脫，每做買賣呵，……依着這裏體例，要教納稅錢呵。……欽此！」（張星烺稱阿老瓦丁等皆回教徒人名，故此必猶太人而奉回教者也。）

又（二十七）戶部：「大德六年十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二道，……欽奉聖旨，追收斡脫錢，……除已行下杭州路行移汝卜宴只哥歹等着落元借斡脫錢八人卜魯罕丁追徵外

…」（元時白話文，雖多鄙俚，卻頗翻亦不易易，祇能悟其大略。）

楊瑀山居新話：「杭州砂糖局，糖官皆主鶻回回富商。」陳垣曰：「主鶻者，尤忽之異譯也。」（一賜樂業教考第四章）

又弘治二年，猶太教碑（名重建淸眞寺記）曰：「俺誠醫士，永樂十九年奉周府定王令，賜香重修淸眞寺，寺中奉大明皇帝萬萬歲牌。永樂二十一年以奏聞有功，欽賜趙姓，授錦衣衛指揮，陞浙江都指揮僉事。」

諾埃氏（Noye）撰猶太人考Les Juifsen Chine（法文）曰：「一三四〇年伊賓拔都他謂杭州猶太人頗多，且有特別居留地，且在第二市區有城門曰猶太人門；其他景教徒，土耳其人回教徒，而回回教徒尤多。韓國英司鐸P. M. Cibot（一七五九一一七八〇年留寓中國，一八七七年爲P?. Somm rvogel 在 Etudes雜誌七五一頁，發表其遊記）曰：當時（元）杭州猶太人已散開封尤多云。（見北平法文天主教月刊，一九三六年二月八十頁及三月一四六頁。）

所謂猶太人門，當卽至順鎭江志卷九大興國寺記，所謂薦橋門也。（見陳垣也里可溫教考）

利瑪竇記函云：又據江省城杭州，所居猶太人亦衆，一如他處，並有會堂，今會堂已不存，蓋已悉爲淸眞寺矣。Comm. Syn. 1935, P. 638, Judaei in Sinis: Dr.

Jaeger 原著，Ostas 發表，P. Maurice, O. F. M. 譯爲拉丁文。

（二）寧波方面

弘治二年碑中有云：「天順年（一四五七—一四六四）石斌、李榮、高鑑、張齊取寧波本教道經一部，寧波趙應捧經一部，資至汴梁歸寺。」讀上文，可知當時寧波亦有猶太教經二部，但猶太教人對經典至爲重視，有經必有殿以貯之，如弘治二年碑曰：「……自備資財，增建後殿三間，明金五彩粧以，安置道經三部。……」並有經龕、經櫝、經桌等制作。正德七年碑且名尊崇道經寺碑曰：「其寺之創也，實爲尊崇經之所。」康熙二年碑亦載：「殿中藏道經十三部云云。」以寧波彼時亦必有殿，但既曰「歸寺」，可知原在開封所撥於寧波也。趙應是否能繳（見上）趙誠，不得而知。

諸如前揭猶太人之由印度來者必經寧波。（北平北堂天主教月刊「一九三六年八六頁」）而上海徐家匯土山灣 P. Tobar 之『開封猶太碑考』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四九頁）推謂寧波係浙江港口，久有外人至其地，與華人往來貿易云。

Vissière, Textes hist. P. 1889，（上八八九頁）謂寧波且有波斯人，梅……其道經亦與印度祭猶太人之瑪拉伯林 Codex Malabaricus 略同，並有波斯文附註云。

（三）處州方面

元典章二十四戶部：「中統五年八月，欽奉聖旨內一款節該隨處州府驛路……幹脫籍

衛齊爲入戶對內錄一百戶內戶中百一名充役。……」

明末天主教者，可見其蹤跡在杭州、寧波、北京及劉家等處之穢路已淡遠殆盡，不呼舊見。（Lettres édifiantes 十三卷，二五七頁，參見沈公布聞於一賜樂業教之吉光片羽，載聖教雜誌二十一卷四期。）按此說並見 let. édifiants 匹卷，一四〇頁。P. Domenge 孟振生記。

（三）浙江之景教

景教之稱爲聶斯托里別派，似已爲一般史家所公認，但吾人以今例昔，稱唐人稱之景教，亦容指基督教正宗及各別派而言也。近數年來，燉文景教文獻復有一二新發現，但未見與吾浙有關之圖文也。

也里可溫爲元時基督教之總稱，但漢文所有本省景教史料，概作也里可溫。也里可溫之原義，中外史家，解釋甚多。近張亮塵先生告余據北平比國田教士 Father Mostaert 云也里可溫名字之來歷，至今無從知悉；若其原始非阿拉伯文，亦非康居文。田教士諳蒙古巳恩巳字，係後所著，凡元碑漢文也里可溫名字，亦恩巳文皆用複數式。河套內蒙古人中至今尚有稱之者，惟其人皆已忘其所自，僅於拜神時以水加額，略保留其古代施洗時之儀節耳。

也里可溫之淺說明，試進言杭州之也里可溫。

(二) 杭州之也里可溫寺

杭州之也里可溫寺，爲陳援庵先生(元也里可溫考)所發表。吾人爲求敍述明瞭起見，將應考：(一)寺爲何人所建？(二)寺爲何教？(三)何時興建？(四)何時始廢？(五)遺址何在？(六)寺名何意？但提先當知者，卽杭州也里可溫之主要史料，卽至順鎭江志梁相大興國寺記一語：

「馬薛里吉思(中路)於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

(一)讀上文，吾人卽知寺爲馬薛里吉思所建；馬氏何人？至順鎭江志(卷十四)曰：「元鎭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也里可溫人，虎符懷遠大將軍。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將軍副達魯花赤。」(此段並見康熙鎭江志，惟刪去也里可溫人一句。)又同志僑寓類亦言其爲也里可溫人。(卷十八)馬氏西名，近人多作Mar Sarghiz。

(二)馬氏爲也里可溫，則其所建寺，當爲也里可溫教寺。而陳援庵先生則復據馬哥孛羅遊記而證其爲景教(聶斯托里)徒。蓋遊記謂鎭江府有景教禮拜寺二所，一二七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之名馬薛里吉思者爲其地長官，寺卽爲其所建。馬哥孛羅並云其爲敍利亞人，且疑其爲景教主教。又據景教碑：「眞禮趣生榮之路」，及「判十字以定四方」，與「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諸語，以證諸鎭江碑「教以禮東方爲主」及「十字者取

像人身，四方上下，亦是爲準一等文物合。且曰：「馬哥歐人，對於基督教之源流，必甚清晰，大興國寺碑又爲其所親見，果爲羅馬正宗，馬哥必 辯之。……」（元也里可溫考第五章第十四節）

（3）杭州也里可溫教寺，吾人知其爲何人所建，而不知其所屬何教矣；現所欲知者，卽寺何時興建。俞樾序楊文杰東城紀餘，據楊氏原書謂建於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但楊氏所言，乃據鎮江大興國寺建年而致，余頗疑之。蓋杭州寺建於最後，而雲山聚明二寺（見後）尚建於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註四）況大興國寺記既謂馬薛里吉思休官務建寺，又謂其任鎮江五年，而鎮江志則稱馬氏以至元十五年大任，是知其休官建寺，乃在至元二十年之後。陳援庵先生「雲山聚明二寺建於至元二十一年」之說，亦更可證實。且可知任職時所建者惟大興國寺。

然馬氏抵浙，實又不係始於此時。大興國寺記謂：「（至元）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爲造舍里八。」此其證也。舍里八詳陳氏原書。

（4）寺廢於何時，則頗難懸揣。蓋寺以嘉靖年間被改爲謝三太傅祠。然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十六城內勝蹟：「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祖里可溫建，久廢，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暨明贈太傅謝遷者。」曰久廢，可知其廢也非數年之事，顧亦不能遽謂其已廢於元。蓋元末（一

三六七）至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相去之遠，達一百七十五年，在此將及二百年之長時期中，而謂無人居住，任其荒廢者，不惟寺屋無以保存，即杭州之佛道，亦必生覬覦之心，今故祠既僅始於嘉靖二十一年，即以百年空廢計之，又假定寺僅建於遜元末年，（一二九四）則杭州之也里可溫尚至少有一百四十八年之歷史。然則明初近百年間諒必有景教徒在吾杭延其殘喘也。且鎮江之銀山聚明二寺，雖至至大四年即被拆毀，改爲般若院。（見至順鎮江志道觀類）而據萬曆鎮江志則大興國高安四瀆安三寺，猶至明季猶存，然則謂明時杭州尚有也里可溫之寺，不爲無據矣。

（5）至其遺址，大興國寺記謂在杭州薦橋門，西湖遊覽志謂在薦橋門東，熙春橋西，已如上述。康熙錢塘志（卷十三祠廟）「謝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址；嘉靖間吏部寺郎餘姚謝丕建，祠址舊頗廣闊，規模宏敞。……」讀此則不特寺之地址瞭然，即寺之範圍，亦可概得。

陳援庵先生以爲十方寺乃十字寺之誤，（見原書）稱也里可溫爲僧，乃景教碑例。以余按之，方十二字辨認尚易，音亦不同；不能自誤，亦不易傳誤也。蓋後人援佛氏十方之語，而附會之也。又元時各教教士均有專名，非如唐時之紊雜，故僧字亦後人擅增也。所以復留也里可溫四字者，或因其原義僅爲部族名。或因田汝成生於晚明，於也里可溫諸實，已茫然不解。十字二字，亦殆以基督教中絕已久，遂不復詳其原意，故以佛化名詞實

之，而非故爲欺飾，亦未可知。

祠以民國七年改爲菜場，而以旗營地對換，民國二十一年新祠落成，有記曰：「杭州薦橋街，東山古里先王太傅祠，爲明嘉靖間尚書公捌建。（中略）萬曆間太常公恢復之，天啓間衆公公贖回之，清康熙間知府公重修之，蓋五百餘年於玆矣！同治間燬於兵燹，餘屬既神主，遂復原有也。（下略）」

今菜場之后，仍有謝氏後裔卜居，並設神主。余曾兩訪新舊二祠，亦無所獲。

（6）今吾人既知寺之路史，試進問寺名樣宜忽木剌六字與果有何義。大普興乃華語，或至少須華化語也，其義尚明。忽木剌三字亦爲馬氏所建七寺中所同有。諾亞洽 Noye 曰：忽木剌爲敍利亞語 Humra 之譯音，即譯修院或寺院之意。（見北平法文天主教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三期，參見通報一九一五年六三六頁。）但樣宜二字何義，迄今未明。

（二）溫州之也里可溫

元典章（卷三十三）「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里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籙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於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列於先生之上，動致爭競，將先生人等毆打，深爲不便，申乞轉呈上司禁約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因隨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

戶計，遂於各處再設衙門。（中略）錢得即日隨朝慶賀班次，和尚先生祝讚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下略）」張星烺先生曰：「此節所謂掌教司衙門者，必主教或總主教駐箚所也。何以必於溫州立主教者，蓋溫州為元時通商七港之一，當人萃之地也。」

豪按原呈僅爲溫州路之也里可溫而發，江南諸路近教，或因職等所在，或因休戚相關，或緣勢力較大，故書名代呈，而禮部遂以爲事關江南諸路，誤也。然亦幸有此誤，而可知也里可溫南下未久，即深入溫州，其傳播之速，概可想見。陳援庵先生謂：「道教原呈所爭之點，不在朝賀班次之先後，而在法籙先生之被誘化也，曰「將先生人等毆打」，一面之詞耳，然亦可見當時教爭之狀瓶此。集賢院以爲人之投入也里可溫教門者，係爲規避差役計，然元制，凡僧道也里可溫皆免差役。（中略）如徒爲規避差役而已，則緇流羽士，皆得享此權利，又何必也里可溫耶？此其故可深長思矣」。又曰：「至於禮部所定朝賀班次，也里可溫在和尚先生之後，是不過以也里可溫爲新教門耳，不足爲榮辱也。」故當時溫州也里可溫之情況，必有可觀，安得其他記載以爲之證，將非快事！

（三）浙江也里可溫之人物

（1）馬薛里吉思　馬氏爲浙江也里可溫最出力之人，其官職等略如上述；今試更錄大興國寺記文中所誌其行蹟，儻亦治斯學者所樂聞乎？文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

儕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賞賚甚侈。舍里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為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

文中應行疏解之處，俟詳陳援庵先生原著；而公之先世，信仰、官秩、政績、宗教熱誠、建寺緣由等等，皆可由此文中得之。此外關於馬氏之文獻，有尚元通制條格（卷二十九）一節，馬薛里吉思作馬昔思乞思，音譯不同也。文繁從略。

（4）哈剌　馬氏之外，浙江也里可溫之著者有哈剌。萬曆杭州府志（卷九職官表）「元時可考者，有江浙行省左丞哈剌，也里可溫人，又曾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世次無考。」又陶宗儀書史會要補遺及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十七引）稱：「哈剌字元素，也里可溫人，登進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辭，其書宗揆正齋。」四庫全書本書史會要哈剌作哈喇，也里可溫作伊嚕克溫。永樂間，賈仲明撰錄鬼簿續編作「金元素」，康里氏，

名哈剌，隨元爵北去，不知所終。」又稱：「金元案名哈剌及其子文石、武石、也里可溫人，樂府皆有名。」又處州麗水縣志謂：「哈剌贍姓傘，至順間爲麗水縣達魯花赤，政爲諸邑最。」

（梁相附） 梁郎撰大興國寺記者，字必大，杭州人，儒學教授。陳援庵先生以其文中，習用「佛國」、「道場」諸詞，附於也里可溫教義，未必瞭然，顯習用異教名詞，時亦爲文人習氣，而佛道諸稱，又入於吾國文學，佔有相當勢力，且也里可溫新入中國，教中名詞，譯出當必經審慎，惜亦乏精確佐證，足以確定其宗教信仰也。

此外浙江也里可溫之軼事，尚有：（一）大德四年（一三〇〇），江浙省等官吏奏，也里可溫人等不納稅。（元通制條格卷二十九）（二）至大二年（一三〇九）江浙河南省官吏奏請免也里可溫等租稅。（元史卷二十三）（三）至大四年（一三一一）仁宗登極遣宣政院等諭江浙等處行省曰：「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於金山地。」（至順鎮江志卷十）（四）延祐元年（一三一四）正月，江浙行省奉旨令也里可溫人等遣發種樹（元典章卷五十九）以上俱詳見陳著第四八十二等章。第四條陳氏以爲非限於江浙行省，乃僅載江浙行省之文以概各處也。余以爲此節亦也里可溫在本行省兩特殊事蹟之一故也。

（四）浙江之摩尼教

摩尼教即教Manichaeism。研究中國摩尼教者，有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油印本，

北大國學季刊本，現在木刻中）馮承鈞譯沙畹教授 E. Chavannes 原著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又山東諸暨洛司鐸亦有法文中國摩尼教考，發表於北平天主堂法文月刊，（一九三五年二五九——二六四期）而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亦述及焉。試略述浙江之摩尼教。

通鑑卷二三七·胡三省註引僧史略卷下，又引唐會要（卷十卷）曰：「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六八年七月廿七日）敕賜回鶻摩尼爲之置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六年正月敕賜荊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陳垣曰，「大曆三年，京師始建寺，大曆六年即敕東南諸州同建寺，其傳播之廣而且速可驚矣！……越爲今浙江紹興，當時洪越諸州，未必皆有回鶻人居住，可見摩尼傳教之廣遠，實較回鶻人之分布爲廣也。」

佛祖統紀（卷四十一）「大曆六年（七七一）回紇請於荊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

陳氏又引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元和二年（八〇七）正月庚子，迴鶻使者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並加以按語曰：「河南太原去京師較近，而建寺乃後於荊揚洪越等州三十餘年；由南而北，實耐人探討。」

方勺青溪寇軌（今泊宅編卷五載方臘之亂曰：「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至凱旋凡四百十日，……賊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所掠婦人自洞中逃出而縊於林中者，……

……凡八十五里，……山谷相嶺，不知幾入。」按方臘爲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縣）人。其徒「號魔賊，夜聚曉散，……男女無別，」即摩尼一流。起事於宣和二年十月，方自號「聖公」，改元「永樂」。行軍「無甲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旬日有衆數萬。」（參見上海大公報史地周刊八十五期既澂君混雜的迷信與歷朝內亂）

Wieger：Textes histor.卷三四（一九八三頁）以爲一一〇八（宋徽宗大觀二年）孔清覺在杭州創立之白雲教，即襲自摩尼教者，尚待考證。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四十四節摩尼經編入道藏）「嘗考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年）五月癸丑王居正上言云：「伏見兩浙州縣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原著有按語曰：「此節道光年刻沈濤交翠軒筆記亦載之。」」曰「兩浙」，可知已不限於睦州；曰「不可勝禁」，則其勢之熾，亦不難想見矣。

陸游渭南文集（卷五）有條對狀（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曰：「……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襘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此條亦曰「兩浙」，亦足爲遍布全省之證。

又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八）曰：「南宋嘉泰二年（一二〇二）餘杭白雲菴道民乞協謂一事，特著排斥摩尼之論，可知當時摩尼亦依附道教。」但餘杭之摩尼教亦因此而發

傳。

沙畹教授並謂「「喫菜事魔」四字……志磐於佛祖統紀中一二〇二年註白雲教中又目之。浙江之白雲教與摩尼教，似不無關係，然於佛教則為一外道也。」佛祖統紀僅目曰白雲菴，無白雲教之名也。故以陳垣道教之說為當。

同書(四十四)有云：「宋眞宗於一〇一五年時敕佛道二家，將二教衝突之經文廢除。……當時眞宗以杭州道藏不完，乃以秘閣道書命戚綸等校正，」(見宋史本紀卷八)事竣於一〇一六年，然條校未善。次年，又命張君房主其事。……張君房之原序有云：「臣於時盡得降到道書，并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明使即摩尼，見京師圖書館摩尼教殘經。及老子化胡經可知浙江之摩尼教，由紹而台，化及海隅，其盛可知。而台州之摩尼教，饒有人研究，在遜清同治年間，猶有其蹤跡。按台州開教史略(徐志修 Rizzi 原著，漁父譯，載台州教區月刊一卷八期等期。)記曰：「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間有無為教，守齋戒徒二十餘人，燒香禮拜祖師，在東山廟舉行萬燭會，廟中燃燭千餘，桌置燭二十五枝，共計十三斤有奇。桌旁坐高徒二十四，頭上燃，各執拉丁式十字架一，架前端插燭，至時點右引火，(禁用他種發火物)然張燭，而及於桌上巨燭，次及燭，又次及齋徒所執燭，後以所陳年糕，分成十字形，將飯祝禱，飯置兩碟中。禮畢，各取年糕丁一方，並飯一匙置口

中，以蒸餅所獻之茶迨之。行禮時繙聲喃喃可聞。教徒敬祇守持最嚴。禮期共爲十五日；因所費不貲，故不常舉行。其書籍中有無爲教來自西方達摩之語，經文中有云：「非法非法，要眞法，等白衣神法。」（蒙按守齋教當即指前齋之訛，白衣之飾，則謂南史弟，（白衣爲帽，所在成社。）夷堅志（摩尼白佛，又所事佛衣白。）均有記載。又穆宗聖訓同治元年閏八月諭：據都興阿奏：「秦州一帶入教者，男婦俱穿白衣。……」亦足資佐證也。元史刑法志云：「諸以白衣善友爲名，聚衆結社者，禁之。」可知聚衆集會及白衣爲飾，在摩尼實自古已然矣。而萬燭會之設，殆亦摩尼又名明教或明尊教之由來歟？

浙江之摩尼教，其盛行與可徵而名者，除杭紹與台州而外，溫州亦其一也。莊季裕雞肋編（琳琅本卷上）謂紹興間（一一三一——一一六二）摩尼自福建入溫州，而至兩浙諸江。

佛祖統紀（卷四〇）載開元二十年（七三二）七月，上諭斥摩尼教文中，且謂末尼教律，原爲西湖祖師所傳，則杭州亦有其蹤跡矣。（見本法文天主教月刊，一九三五年，四——一四七頁。）

熙寧元年（一〇六八）回鶻向宋求金字大般若經一本，而所予者乃是前賜予之此後回鶻使者即不復至。是爲宋人所記。當知一一三八年宋都已自汴徙遷杭州矣。（法文天主教月刊，一九三五年，一九五頁）

讀上文所記，浙江之摩尼教，雖假託清不絕，但亦等強弩之末，式微甚矣。摩尼既挾回鶻之勢而盛，亦因回鶻之弱而衰，建之靈寺，亦由於回鶻之請，其憑恃與失敗之原因，至爲顯然。但沙畹教授曰：「至八四一年回鶻帝國崩解之後，不免因疑忌而受排斥。然當其根蒂尚深，又因其二宗之義，與中國陰陽舊說相合，其教徒雖與中亞之教徒音問隔絕，尚能與他教結託以自存。其教在閩浙諸地，雖具有佛道二教之外表，然尚不失爲摩尼教，二宗三際，仍未變也。」

（五）浙江之天主教

浙江天主教史可分三期：明末清初爲興盛期，雍乾嘉道爲中衰期，咸豐至今爲復興期。但元代教史，亦頗足一述，故以此冠諸篇首。

浙江天主教前史，當始於義國方濟各會士和德理 Odoric（亦譯奧代利克）。和氏以一三二六年（元泰定三年）抵杭，其遊記明言彼時杭州亦有同會士四人及教友等。和氏留杭時期甚暫，嘗至西湖靈隱寺遊覽呼猿洞，與寺僧辯道。所經路程，約當今之江山、衢縣、金華、建德等地，而由運河北上。

和氏在杭無成績可言，其會友佈道狀況，亦無文獻足徵。惟一三〇七年（元大德十一年）刺桐（或作瑞桐即今泉州）已設有主教，治理東南教務，浙江亦在轄區之內，彼時浙江之有教友，似可藉此爲證。刺桐西音爲 Zaiton，以前歐洲歷史家，頗有疑即杭州者，

誤也。

元時杭州有一大宗教大旅行家經過，即羅馬教皇報聘元帝之使臣馬黎諾里 Marignolli 是也。馬氏遊記中，亦述及杭州，然寓杭久暫及所有事蹟，俱無從探索。

元亡明興，干戈頻擾，加以海禁森嚴，與中亞帖木兒之突興，東西水陸交通皆絕，故國外來宗教，亦驟就澌滅，雖最近宗教史家，多有謂元明之際，中國之摩尼教、景教、天主教亦有未嘗中斷者，但吾浙之天主教史，實不能於其時追求綫索，姑俟將來之發見。

近數年間歐洲及國內西文教會雜誌，有轟動一時之本省教史新發現，即謂西湖古剎爲歐洲古代修院之遺制，並稱靈隱寺藏有希伯來及敍利亞等文之書籍，且盛傳天台山有古猶太教會之遺物發見云云。已經杭州教士證爲傳聞所誤。

又近人譯著中西交通史或貿易史等書籍，多有述明正德年間葡人僑寓寧波，及後被國人驅逐殺戮並焚燬船隻之史事。一九三四年一月之法文北京政聞報猶有詳細記述，但一九二六年之 Asia Major 雜誌（第三冊七一——一〇三又一九四——二六七頁）已有德人 Schurhammer 作 Fernao Mendez Pinto und seine Peregrinaçam. 一文，考證其誤。

（二）興盛期

明季浙江之第一次開教須推溯以一六一一年（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八日舉行於杭州，

然前乎此者，有一五八八年（萬曆十六年）羅明堅 Ruggieri、麥安東 Almeida 二教士之試建紹興；一六〇四（萬曆三十二年）杭州之刊行天主實義與一六一〇年（萬曆三十八年）湖州三和堂出版天主聖教約言；惟乏其他史蹟，堪資稱述耳。

杭州開教後，因郭居靜 Cattaneo、金尼閣 Trigault 等司鐸之努力，與[illegible]部鄭等之熱心，都盤御史楊廷筠二公之信奉，教務蒸蒸日上，影響及於東南各省，遂大爲佛教徒目，乃有雲棲蓮池大師與虞淳熙之反響。蓮池著竹窗三筆天說四端，淳熙著天主實義殺生辯，並有致利瑪竇書。蓮池弟子張廣湉及武林釋普潤、成明、亦咸有攻擊，而寧波天童寺僧圓悟所著辯天說及復張夢宅書，與山陰王朝式之罪言，德清許大受之聖朝佐闢，温州李王庭之誅邪顯據錄，皆當時浙人反對天主教有力之文，而彼時天主教之發達亦藉於此見之。後復有沈漼之排教，沈固浙人，而里人方從哲等亦助之，浙江之天主教一時陷於凶險之風浪中，形勢之嚴重，大有不保旦夕之概。幸教友戮力衛護，始脫大難，教務之進展，且倍於曩昔。其最足以使後人豔羨者，即文化事業之發皇，如中國天主教唯一叢書，今教內外共相珍視之天學初函，亦以是時在杭刻印。外此則名理探、寰有詮均在靈隱附近李之藻宅內譯刊，而艾儒略 Aleni 之三山論學記，陽瑪諾 Emm. Diaz 之唐景教碑頌正詮，金尼閣之西儒耳目資，衛匡國 M. Martini之逑友篇等，其初版地皆爲杭州；其他曾在杭到杭傳教之教士，所有著述，或撰於杭，或刊於杭，或重版於杭者，尤更僕難數，而之藻廷

衛爾先生之著作，幾盡爲杭州發行。且當時已有小學及男女修道院之設立。而同時中國教史上之著名教士，或因來杭避難，託庇於李楊二先生，或担任教師，或從事編譯，或學習華語，而初到之教士爲尤多，一時風聲所及，杭州教會，一躍而爲全國之中心，駕上海北平而上之。

未幾，金華蘭谿即有多明我（多米尼干）會士之蹤跡，而寧波湖州崇德一帶，亦由耶穌會士利類思 Buglio 孟儒望 Monteiro 等竭力傳佈，寧波尤稱興盛，名士朱宗元（順治五年舉人）之力居多。

明季杭州教務既盛，鄰省亦接踵來請，嘉定之孫元化，常熟之瞿汝夔（式耜式穀之父）福建之葉向高均來杭邀請教士，而松江之佘山，亦由杭州教士前往宣化焉。

清初浙江之教務，亦極有可觀，巡撫佟國器與有力焉。順治末年方濟各（佛蘭西斯科）會士亦偕多明我會士入浙，肆力於省之西南部，同時浙江始有正式隸屬之主教，蓋即由越南主教兼轄也。

嗣後，歙人楊光先倡議非教，浙省亦蒙其影響，巡撫張鵬翮之示禁，尤爲當時一大打擊，幸以在京教士努力斡旋，此種事態，得不久即止。時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越十六載，浙閩總督梁鼐復有驅逐西士之舉，孰意地方官雖不滿於西士，康熙帝則三次南巡，對杭垣西士，莫不優禮有加，賜物賜錢，並邀教士宴於御舫，或在行宮召見，時復遣

大臣至天主堂慰問，亦於天主像前行禮敬拜，至足令人尋繹。

，浙江天主教史上極優美之一頁，蓋即各會士之麕集也。先是耶穌會士傳教於杭甬等地，清初始及於蘭谿，但不久蘭谿之教務，即居杭州之上，而錢塘江之上游，固猶未正式開拓也。自方濟各多明我二會之會士，相率由閩贛紛入後，巴黎遣使傳教會及羅馬傳信部所遣之教士等亦接踵而至，活動於衢縣、金華、蘭谿、建德、紹興、蕭山各地，頗多建樹；同時耶穌會士亦伸展其傳道區域，而及於海寧、餘杭、臨安、嘉興、平湖等處。寧波教會曾一度中絕，至是亦逐漸復興，教徒之足跡且散傳於餘姚等附近諸地。

明末清初，浙省之天主教曾煊赫一時，偏僻地域及鄉村小鎮，如常山、塘西、新豐、王店、嘉善、平望、濮院、硤石、義烏、亦均有教徒散佈，讀現存羅馬、巴黎、柏林、里斯本各政府或教會圖書館所藏之教士手札，可知其詳。蓋數十年之間，以教士抱犧牲之精神，拼命苦幹，乃造成輝煌燦爛之歷史。

（二）中衰期

康熙後，浙江天主教驟就衰落，然所以衰落者，內外各有其因也。緣彼時教士關對中國敬祖尊孔等禮，意見頗不一致，而齟齬遂生。當時反對最烈者為多明我會士，該會士多集中於浙省南部，康熙十八年（一六六一）之儀禮會議，即在本省之蘭谿舉行，結果，浙省所受之影響亦最鉅。且各會間爭謀獨力之發展，未能聯絡一致，教徒中又乏名公鉅卿，

鴻彥碩儒如李楊之流，為之提倡鼓吹；而內地風氣閉塞，時有謠諑，好事者一唱百和，國人乃鮮敢問津，故雍乾嘉道年間之反教運動，雖云帝王之罷黜，為其最大原因，而朝臣之挑撥，民間之詆毀，尤為教難蔓延之動機。一時教會活躍之生機，斲伐殆盡，百年之間，浙江之天主教，無一日不在風雨之中。雍正初有閩浙總督滿保之禁阻，雖因與杭州教士德瑪諾Hinderer私交甚密（德氏即奉康熙帝旨在閩浙測繪地圖者，曾以福建沿海島嶼圖一幅贈滿保）未便明令驅逐，但省會之外，即大感不利。迨李衛繼任，乃嚴加禁斷，排擊壓迫，不遺餘力，風靡一時之浙江天主教，頓受破壞而沒落，同時耶穌會士亦因被熱而絕跡東渡，尤使本省教會受一莫大打擊，蓋耶穌會士，素以學術傳教為職志，成效大而速也。

教難之結果，使轟動一時之浙江教務成為強弩之末，此時教史上僅寥寥數人點綴風光而已。舊時教堂之可考而得者絕鮮。惟雍正四年平湖縣令楊克讓改天主堂為節孝祠，雍正八年李衛改杭州天主堂為天后宮，尚有文獻足徵；其他浙省天主教古蹟保留至今者有寧波泥城巷之天主堂，杭州桃源嶺麓之方井南古墓，瘞耶穌會士十一人，又衢縣北門火德祠尚存康熙壬寅王姓教徒古墓一區，餘如蘭谿天主堂僅有鄰居地契可稽，而嘉興西門府學後之天主堂為余藏辯學抄本所記者，近已鞠為茂草，茫無蹤跡。其他各處天主堂或以原無詳細地址，或因西音翻譯欠確，不能諧合，且間有並地名亦難訪覓者，則因當時教士國籍紛紜，各隨其方音為標準，遂致紛歧殽亂，欲後人考證得之，寧非難事？

禁教期內，杭州教徒有為巳往歷史所忽略者二人，即雍正從昆弟蘇努之孫庫章阿與簡親王德沛是也。惜庫氏在杭，乃為雍正禁錮。（其原因或曰信教，或曰政治關係。）德氏雖貴為浙閩總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及兼理浙江巡撫（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徒以信心不篤，未敢有所表示，外間遂亦鮮有知者。

時浙江僅果存之教堂為海鹽小村車輻浜、宋家、陶家三處，教士偶偷潛入駐足，亦以此三處為多。他如寧波、平湖、及衢縣之蘇遂，亦往往合數十家教友共聚一處，但概有十餘年或數十年不見教士者，亦多有僅知循例舉行教儀而不詳其底蘊者；教士偶或一至，亦晝伏夜行，利用舟輿以避耳目。或喬裝乞丐，或偽為病人，或在舟中舉行婚喪儀禮，其困苦情形，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乃復諭江浙兩省嚴緝外人。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浙江教務由福建主教兼轄，越六載，北平國籍遣使會士亦開始入浙。

嘉慶十年諭禁西人刻書，人民入教，並代遞書信等，凡二次。十六年又重申二次，嚴厲執行，不稍寬貸，但彼時教徒得留至今者，仍歸悉本；其堅忍有至足多者！

（三）復興期

時浙江北境，雖已有遣使會從事傳化；而浙南一帶，則仍由多明我會士效勞如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浙省教務概由遣使會 Lazaristes 負責推行，兩省主教亦同時產生。

及五口通商，信仰確獲自由，浙省教務復離潰自立，於是浙省教會，始能由仇教空氣緩和之後，重整旗鼓。惟太平天軍入浙時，教會亦大受影響，教徒出亡被戮者不計，杭甯二教士亦被逼離境。事平，台溫處三舊屬相率開教，進展頗速。中法戰起，教士法籍居多，頗受疑忌，卒以教皇良十三世向光緒帝聲明政教立場之不同，及薛福成之妥爲辦理，寧波趙保祿主教 Reynaud 復於是時爲鎮海漁民向法領請命，遂得相安無事。迨北方義和團起，南中幸賴各督撫鎮壓，得免大亂；但各地教案，亦時有所聞，其原因亦至複雜。蓋自清軍屢敗以後，國民多存懼外心理；社會不良分子，以教士中外人較多，遂藉以混入教徒中，間以有利可圖，亦不惜棄教會之名譽於不顧而橫行鄉里者；地方官吏又多缺乏政治常識，每媚外以全職，於是民教不安之舉，遂愈演愈多。然自吾人觀之，在人民爲一時之受愚，在匪徒爲一時之逞快，在教士爲一時之疏忽，實一時之畸形現象也。

教案時期過後，教務之進展尤速；遜清末葉，遂分設杭州教區，轄杭、嘉、湖、金、衢、嚴六舊邑；民國十五年，台州自立教區，且純由華人組織；既而麗水亦分區；蓋以縮小範圍，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民國二十九年，金華（舊府屬）劃隸麗水教區。

重要參考文獻：（不分次序）

1. 陳垣：元也里可溫考
2. 郭棟臣：真福和德理傳

3. 陳垣：明浙西李之藻傳
4. 陳垣：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輔仁學誌三卷二期）
5.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6. 蕭靜山：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7. 韓霖：道學家傳（公教青年會季刊二卷二期）
8. 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淸初之天主教（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八卷二期）
9. 利瑪竇：辯學遺牘
10 德理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11 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
12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故宮博物院編）
13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
14 程宗裕：增訂教案彙編
15 黃斐默：正教奉褒
16 浙江通志　萬曆杭州府志　康熙仁和縣志　咸豐及光緒鄞縣志　光緒平湖縣志
康熙錢塘縣志
雍正寧波府志、城北天后宮志
17 釋蓮池：竹窗三筆

18 沈㴶：南宮署牘

19 聖朝破邪集

20 拙作：雍正前之平湖天主堂，近三百年來浙江之主教，我存年譜，明末清初杭州暨附郊老天主堂考，方井南墓地沿革。（參見我存雜誌二卷三期，三卷八，九期，四卷一期、三期、八期。）

21 Pfister :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22 Colombel :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23 Moidrey : La Hie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307—1914)

24 Sica :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S. J.

25 J. de la Serviere :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 de Jesus en Chine.

26 Ricci o. f. m. : Hierarchia Franciscana in Sinis.

27 Boucherie : Notes biographiques sur Mgr. Reynaud.

28 Memoires de la C. de la M. en Chine.

29 Catalogue du personnel de la Cong. de la M. en Chine……

30 Planchet : 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1924.

按浙江佛教事蹟過多，耶穌教（新教）則爲時尚短，史料散漫，俟待後作。又上述各教略史，皆不撰於一時，故體裁亦不一律，還祈　讀者原諒。（方豪識）

與友論學書

（一）復繆彥威先生（鉞）論北朝胡俗書

——相偷戲與打簇來源考——

來書

傑人前見史筆，頃讀魏書卷十二孝靜帝紀：「天平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戲」。相偷戲詳況魏書未載，北史魏孝靜紀無此條，蓋以其無關宏旨而刪之。按宋洪皓松漠紀聞卷上云：「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惟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盜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钁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以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魏孝靜所禁之相偷戲，殆即此類，松漠紀聞所記乃遼金之俗，元魏本鮮卑族，俱出東北方，則所謂相偷戲者，蓋東胡之俗歟？魏自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四九四）遷洛之後，即禁胡服胡語，改定姓氏，力求華化，而此種陋俗至孝靜天平四年（五三七）始革，可見用夏變夷之不易。史稱孝靜「從容沈雅，有孝文風」，其能革除胡俗，亦一證也。魏又有所謂「打

簇」戲者，亦在正月十五日夜舉行，北齊書卷二神武紀：「三年（武定）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中略）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卷四十八爾朱文暢傳記此事較詳，云：「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竹簇之戲，（按神武紀作「打簇」，此作「打竹簇」，「竹」字蓋涉下文「簇」字竹頭而衍，北史卷四十八爾朱文暢傳作「打簇」，無「竹」字）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為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為主。」史既云魏氏舊俗，殆亦一種胡俗，惟此與相偷戲無關，蓋相偷戲在天平四年已被禁止，而「打簇」戲武定三年（五四五）尚舉行也。吾兄夙治中西交通史，不知西方諸胡國亦有與此相同或相類之風俗，可徵東西諸族往還之跡象者否？願承教益，以廣異聞。藉此敬頌著祉，弟繆鉞拜上。

復書

彥威兄有道：承示魏書及北齊書所載「相偷」「打簇」二戲，並以類似之風俗下詢，謹就所知，錄覆一二。

按相偷之俗與打簇之戲，雖皆出自東北方，但當時玩藝之技及行樂之法，東胡西胡，久已混合，其他風俗亦可想而知。張衡西京賦所謂：「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木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西羌與鮮卑之運動方式，雖陳一場，實足發人深思。

按相偷戲據來示所引松漠紀聞，云：「自契丹以來皆然」。查宋祕書丞葉隆禮奉勅撰契丹國志卷二十七「歲時雜記」治盜條曰：「正月十三日，放國人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為鶻里尀，漢人譯云：鶻里是偷，尀是時。」葉禮隆所撰遼志，實即契丹國志第二十三卷與二十七卷之節本，故亦有此條。惟叢書集成本遼志，目錄及正文皆誤「治盜」為「詔盜」，遂令人不可解。又以正月為五月，誤亦顯然。又按此條並見武珪撰燕北雜記及王易著燕北錄。燕北雜記曰：「正月十三日，放契丹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燕北錄則改「契丹」為「國人」。「依法行遣」以下，並有「北呼」云云，與契丹國志及遼志所記盡同。第無論如何，相偷之俗，其始必僅以契丹為限。歷時既久，遂至如松漠紀聞所載「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蓋敗風陋俗，不乏趨而效尤者。惟魏書云係正月十五日，松漠紀聞則曰正月十六日，蓋契丹國曆後宋曆一日也。宋史蘇頌傳，謂「頌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為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契丹國志，遼志，燕北雜記，燕北錄俱謂自正月十三日後舉行三日，亦即宋曆正月十二日後三日也，易言之，即十五日前連續舉行三日也。

綜我國各地元宵習俗，尚有竊燈以送無子之親朋者。四川樂山鄉間，盛行竊菜，燃燭其中，遊行街市，名曰「偸青」。李調元南越筆記謂廣東番禺諸鄉，亦有於元宵竊蔬者，名謂「采青」。海豐之俗，則於元夕放水燈於江干，競拾之，得白者喜爲男兆，得紅者謂爲女兆。程景沂輯遊戲錄（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下引齊說曰：「正月十五日，夫婦共於富家局會所，盜取燈盞，勿令人知，安臥牀下，當月有娠。」殆皆相偸戲之遺風歟？

至於「打簇」一事，既與相偸戲同在上元日舉行，弟意荷就彼時一二百年間上元日所有諸遊玩方法，綜合而比擬之，或可窺其相互間之關係也。

以弟觀之，打簇戲必爲百戲之一。打簇戲在武定三年（五四五）猶見舉行，而齊武平中（五七〇—五七五）百戲亦盛極一時，其間相去纔二三十年耳。隋書音樂志曰：「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百戲凡百有餘物，而所舉僅及十事可知佚名及失記者之多。隋書柳彧傳，載彧請禁止正月十五日角抵戲，略謂：「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行，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塡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此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

鄧禁斷。詔可其奏。」打簇與角抵之戲，既俱在正月十五夜舉行，年代相去亦近，必遊簇不悖者。角抵爲百戲之一，（見後）則打簇亦必爲百戲之一。「盜賊由此而起」一語，尤可與爾朱文暢等謀刺神武事相參證。惟習俗相沿旣久，遂牢不可破，至隋煬帝，則淫奢益甚。隋書音樂志又曰：「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旣曰「萬國來朝」，則必有各國之戲以娛外賓。蓋百戲至隋煬而登峯造極。正月十五日隋又盛行登高。隋書：「文帝常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石虎鄴中記亦云「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

唐代之正月望日，則通行拔河戲。唐語林卷五曰：「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唐封演聞見錄與語林所述盡同。惟荊楚歲時記則稱拔河爲拖鉤。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見丁輯全隋詩卷二）亦專爲描寫洛陽正月十五日之遊玩者，辭極風趣。曰：「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雲間璧獨轉，空裏鏡孤懸。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閣相連。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豔質迴風雪，笙歌韻管絃。佳麗儼成行，相攜入戲場，衣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高高城裏髻，峨峨樓上妝，羅裙飛孔雀，綺席垂鴛鴦。日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戲笑無窮已，歌詠還相續，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假面飾金銀，盛服搖珠玉，宵深戲未闌，競爲人所難。卧驅飛玉勒，立騎轉銀鞍，縱橫旣躍劍，揮霍復跳丸，抑揚百獸舞，盤跚五禽戲

[illegible][illegible]弄斑足，巨象垂長鼻。青羊跪復跳，白馬迴旋騎，忽覩羅浮起，俄看鬱昌至。峯嶺既崔嵬，林叢亦青翠，麋鹿下騰倚，猴猿或蹲跛。金徒列舊刻，玉律動新灰，甲夜邀陌柳，殘花散苑梅。紫星漸寥落，斜月何徘徊，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普天逢聖日，兆庶喜康哉。」

右詩曰新年，曰月團圓，必指正月十五日也。點綴品有魚燈，有龍燭。娛樂方式有胡舞，而以百戲為主。百戲中有人戴假面之戲，有動物舞，其中可得而知者為獅、為象、為羊、為馬、為鹿、為猴。獸類之外，則有飛禽。徹夜狂歡，往往達旦不休。

韋述西都雜記曰：「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所謂前後各一日，即指正月十四與十六也。雍洛靈異小錄曰：「唐朝正月十五夜，許三夜夜行。其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棚高百餘尺，神龍以後復加嚴飾，士女無不夜遊。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浮行數十步者。」此所謂「許三夜行」，或亦指十五前後三日，若據後引朝野僉載，則為正月十五，十六，十七矣。王三聘輯古今事物考卷一「觀燈」曰：「漢家日祀太乙，自昏至明，今上元夜遊觀燈，是其遺跡。唐勅金吾弛禁，許三夜士女夜行，謂之放夜。宋增十七十八為五夜」亦一說也。

惟上所云拔河一戲，不限於正月十五日，中宗（七〇五—七〇七）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見唐語林卷五）武則天於景龍三年（七〇九）二月己丑辛亥武

門，觀宮女拔河。（見唐書卷四則天本紀）景龍文館記次年「淸明日幸梨園，命三品以上拋球拔河。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衰老，隨絙踏地，久不能興。」

角觝之名，則終唐之世，不絕於書。（見舊唐書穆宗本紀，敬宗本紀，新唐書禮樂志等）即角抵之戲，亦未稍衰。舊唐書卷五兵志云：「六軍宿衞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疑打簇一戲，亦可於當時見之。將來稍有所得，當再請益。）

至景龍年間，則燈戲大盛。唐書：「景龍四年上元夜，中宗與韋后微服過市，徜徉縱觀。因幸中書令蕭至忠之第。是夜放宮女數千人看燈，因此多有亡逸者。」

明皇尤愛燈。燈影記曰：「正月十五夜，唐明皇於長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名，奏月光分曲。又撒閩江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被，綠暈衫。」張鷟朝野僉載曰：「先天二年（七一三）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妙簡長安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睿宗並有軒遊宮十五日夜詩曰：「行邁離秦國，巡方赴洛師；路逢三五夜，春色暗中期。關外長河轉，宮中淑氣遲，歌鐘對明月，不減舊遊時。」明皇雜錄曰：「上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燈影，設庭燎，自禁中至於殿庭，皆設

鑄炬，連屬不絕。」此時去齊武定三年已一百六十餘年，係今日我國民間之過年，與嘉靖年間亦無大異，以今論昔，則隋唐之新年習俗，或亦相差無幾。頗疑打簇之簇，即朝野僉載「簇之如花樹」之簇，易言之，打簇即打燈簇也。開元天寶遺事下「百枝燈樹」條，謂「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燈樹即燈簇也。今江浙一帶亦有在正月末打燈之俗，所以表示此後不再玩燈之意。當時之燈亦有外來貨，張說有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踏歌辭二首，曰：「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豔，雞踏蓮花萬樹春。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妬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西域燈非外來貨耶？曰火樹，曰萬樹春，亦皆與上云「簇之如花樹」相合。考試方殷，搜羅爲復，仍祈明教。敬請大安。篤豪謹覆。

（附啓）叢書集成本遼史拾遺卷十五亦引松漠紀聞，惟「十倍責價」作「十倍責償」，「次則攜壺，小亦打糕取之。」作「次則攜壺小飲，或打糕取之。」未知孰是，當俟異日覓得善本，方可論定也。

（二）與方國瑜先生論「也里可溫」與「也里」「可溫」

國瑜宗兄惠鑒：承示「教育與科學」第三期尊撰碑跋三首，不勝欽佩。惟昆明筇竹寺元璽旨碑中之「也里」二字，尊意以爲其下必缺「可溫」二字。竊以爲尚可商榷也。

按至順鎮江志之梁相大興國寺記，謂「泰之人口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此處所謂「受

戒」，外國學者有以爲係指教士而言。（見一九三六年七月份北平法文公教月刊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 所載 P. Noye 司鐸著也里可溫語源考）弟以爲當時教務尙未甚昌明，獻身爲教士者必不甚多，「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云云，似一家中受戒者不止少數人，故受戒當爲受洗之別名，或更近似。而與元朝祕史所云「可溫」爲蒙古語「子」之漢字音譯亦合。蓋「也里可溫」即言「也里兒」也。「也里」亦作「也里牙」，鎭江碑稱馬薛里吉思爲麻兒也里牙之徒，按麻兒也里牙爲當時景教宗主教（祖師）之名，若追溯語源，則「麻兒」或「馬兒」，乃敍利亞文景教主教司鐸之尊稱，亦作「馬里」。「也里」或「也里牙」則即吾人所稱「上帝」或「天主」，故「也里兒」或「也里牙之徒」即「上帝之子」，「天主之徒」之義。「兒」「子」「徒」三字義皆相同，故稱馬薛里吉思爲麻兒也里牙之徒，猶言馬薛里吉思乃麻兒宗主教所轄之教徒也。明乎此，則可知「也里牙之徒」即「也里可溫」。「也里」與「可溫」原非一詞也。

又西湖竹枝集，稱馬祖常爲「可溫」人。孫原理選「元音」（卷九）稱雅琥亦作「可溫」人。蓋漢文尙簡，故「也里」與「可溫」分用以後，雖盡失原義，而人亦習用不察也。

明乎此，則筇竹寺聖旨碑之原文，或誠如兒所云也里下當奪可溫及先生答失蠻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等字，或也里下竟一字不奪，亦未可知。鄙見如是，謹以還質

高明，並請敘安。宗弟豪再拜

附筇竹寺碑原文及方國瑜先生跋文節錄

長壽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使臣每根底，宣慰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闊台皇帝，完者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要賜藏經與筇竹寺裏，命玄堅和尚住持本山，順闡以祝壽，以脈民安。凡不揀甚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雲南鴨池城子玉案山筇竹寺住持玄堅，長老爲頭和尚每根底，執把口口大藏經帙與了，聖旨宣玄堅教修本寺裏藏經樓，并寺院房舍完了者，營發鋪馬一應休當者，稅粮休當，但係寺院的田園地土人口頭疋舖面與[illegible]當，不揀甚麼的，是誰休奪要者，休付氣力者。更者，和尚每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做呵！他更不怕甚麼聖旨。龍兒年四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方國瑜先生跋文節錄

（上略）元代優禮宗教，凡和尚，先生（即道士）也里可溫，答失蠻得免差役，此碑即降聖旨優禮寺廟者，而白話碑通例，以援用聖旨，故不論寺觀之屬於道教或佛教，並稱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此碑和尚下有「也里」二字，次即「要」字，以他碑例之，「也里」下當奪「可溫」二字，蓋也里可溫，譯音或作也里克溫，

而未見有作「也里」者。也里可溫又奪先生答失蠻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等字，蓋通常碑文爲如此，此碑奪字，故不可解也。（下略）

復書（略）

（三）復向覺明先生（達）論孫元化及毛文龍事

來書

杰人先生箸右：（中略）弟一欲對於孫元化事蹟擬作一試探。孫公之守登萊，見叛將，後世論者，亦不免嘗交譏，求一真知灼識者，幾不可得。然觀登萊陷後，西士致命者至十餘人，而王良甫兵部揭帖，頗有辨白之意，而辭旨含蓄，似有不能盡言之隱，因疑其中必有一段冤情。像世新刊檔中，涉及孫公者，只見一疏文，屬於守寧遠時事。就職登撫以後，僅崇禎長編中著錄奏疏三數篇。或者倘有其他湮沈於故紙之中，猶有待而勿彰歟？憶徐匯書樓曾印有孫公墨蹟一種，舊時行篋中曾有其書，故都淪陷，遂不可問。左右知其有此，不識亦能一假，俾得過錄一份否？當時西士著述中，述及孫公者亦不少，而此間如曾德昭所著書，俱未之有，只有束手而已。目前所能爲者，惟有將孫公奏疏，王良甫揭帖，以及明人著述紀及孫公者，裒集一處，以爲他日博考之資耳。博聞如先生，不審將何以教之？率陳不盡一一。即叩著安。弟向達謹啓

復書

覺明兄史席：承寄徐匯返孫元化墨蹟，按即徐景賢先生撰「明孫火東先生致王葵心先生手書考釋」，發表於上海聖教雜誌二十卷九期及二十一卷五期者。有單印本，目前弟案頭亦無此書，謹將聖教雜誌發表者裁下寄奉，張公手書亦附錄於後。曾德昭書，此間亦付缺如。惟一六六三年羅馬出版，巴篤里Bartoli著義大利文耶穌會史中國之部，述孫公事甚詳。是所據材料，悉爲明末在華西士曾德昭金尼閣輩之記錄及手札，當屬可信。茲特將有關孫公死事者，迻譯呈教，不知有補高明否？

孫元化（原文稱孫依納爵）因徐光啓（原文稱保祿博士）之薦，任遼東經略使，以禦清兵，旋陞該省（按爲山東登萊）巡撫。張燾（原文稱張彌額爾）來任參將，然不久彌即爲人所嫉，其長官且犧牲以終。時京中糧餉不至，元化雖知已爲朝廷所棄，猶屢疏抗爭。不幸疏爲嫉視天主教與徐光啓之太監所得，遂益爲所恨，而控劾亦愈多。所部遂叛，並欲降敵；元化願負諱變之咎，偕張燾王徵（爲文作王斐理伯）入京。衆以此行必罹巨禍，勸易清幟。三人以忠天主之心忠君，卒奉命去。元化與燾皆論死，徵削職，並籍沒家產。二人受刑前，湯若望喬爲炭商，託詞入獄，爲行赦罪禮，時一六三二年也。

其在巴篤里稍後者，一六八八年巴黎出版耶穌會司鐸奧爾來盎Orléans撰法文「韃靼兩次征服中國記」，亦述及此事，且較詳細，並譯如後：

上文所稱嚴刑，（即不降者以死論）使一孫姓奉教大吏，得以其忠君體國之誠，益為吾教光輝。時遼東已淪為戰區，彼乃率師其地，為巡撫，屢立戰功。苟朝廷稍有援助者，則必更有所作為，乃廷中竟停其餉給。孫自持嚴謹，卒以此見忌於人，廷臣屢以惡計害之。故雖數以無餉上聞，廷臣亦不之理。幸素為士卒愛戴，雖或有怨聲，終賴其德威而平息焉。然所部終不能忍，乃刼某城，盡取所有。變後，知公必膺懲處，且不可與言，遂以叛國為勸。願追隨勿去，並許久以不奉為王，亦不解甲。將軍知從衆請，必[illegible]自全，願仍峻拒不允，且斥刼城之非，更執為首者，治以罪。孫公所行雖光明磊落。然廷中仍命入京自白，且委人代率其軍。部屬聞之大譁，咸以抗命為言，曰：「將軍毋離去，苟有害將軍者，願以身捍，此吾輩分內事也。將軍其俯允所求。」清軍聞其事。亦遣人相告曰：「降則必獲安全。」將軍處誘惑中，不為動。竟論死。惜哉！

與衞米來呂司鐸書中，又有一節述毛文龍事，亦可與本國史相參證，積譯如左：倘亦為賢者所樂聞乎？

此次戰事中，公教教友及附與教友往還而略聞教義者，俱足為公教爭光。大將毛文龍即其一也。文龍粵人，習衞文，並從衞人治軍事學，亦聞公教忠君愛國之說。抗清諸將中，無如文龍勇毅者。清人許以降後分治中國，時文龍所餘軍力已弱，卒不為動，

乃退守高麗，屢與清兵戰。時清軍以袁崇煥爲遼東巡撫，乃講毛文龍而降。

此一段事實，與中國史料所記頗多出入。而文龍習葡文諸說，亦爲時人所不知，因便附及，以備采擇。又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下，崇禎遺事七條，記崇煥之殺文龍，係受參軍汪璽之慫，謂文龍目中無崇煥也。後崇煥亦死於其手。璽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諒爲兄所素知。謀設奇答，殊媿草草。惟祈萬自愛。弟豪謹啟。

附陳元化獄中與王徵論交始末

（手蹟現藏于右任先生之處）

徃從西鐸，知涇陽有葵心王先生，壬戌乃于，便擬游涇關，不再□聞之。癸亥回，則先生司李平×，內艱去，遂稿一册，附西鐸爲問，他無言也。丙寅冬，先生除服謁選，余再從遼遠歸我方，益聞所未聞，益同者道義相許，至是乃更得其巧思絕學，而所謂道義者，即與翁同得之西鐸，亦未有一聞不待見，一見不待試，若許翁之深，其所以深者，余不自解，而翁何能相解？即丁卯春，余得讀投閑，兩篋一兜，蕭蕭握手，殊知不避嫌忌，座視行色者先生一人，此世俗賢豪所尙，高致義舉者，而兩人結契，並不在焉。翁補理廣陵，仍從西鐸，一相聞，彼此數行，淡然立絕。戊辰余賜環道出廣陵，固知翁望見故人甚切，而偶取他途，非必不見，乃不必多一見耳。未幾翁復外艱歸，余入都，出關垂一年，在塞外七月，尋往來萊，此兩年者日在駭浪驚濤，辭魂

夜號，萬死餘生，乃復入此苦海，爲國爲身，入惟求舊，西鐸有言，友，第二我也，我非第二翁，翁實第二我，翁才寡出一時，豈安以勢要相許者，不亞於余之道義，而余不斷勢要之足稱與否，毅然辭之，亦心知翁之自必不以勢要辱也，不覺一片凝腸，終成大夢，淹倒詔獄，臥殿已死，翁同苦而倘以其苦餘左右，提挈子弟童僕之屬，周至有加，蓋自官登，而縲五日不一再見者半年，自乘城而無日夜不一再見者半月，自陷賊流海，下北司，過西署，而日止一再刻不見者半年餘矣。今翁頭搖顫戰，黯然言別，以紙塗手蹟，爲長途隊伴，余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餘，至今皴塑，搖頭間，一舉筆橫直宛得止之間，皆不自繇。手之好也，猶不能書，況其病乎？乃書交誼始末，謝淡若水，後苦如茶，翁見其書，如見其病，如見其病，亦請翁書此，使兒曹識之，更見翁書，即如見翁之同病，而且數乃父病也。

壬申七月吳人孫元化書

率爾就法，古今創舉，後有飽誣，誰炤其詳列之，同志同難，亦信將軍妙墨，不虛此紙耳。（按此段亦孫元化書，以下爲張蘧所識）

孫元化號火東，南直嘉定縣人，巡撫登萊石僉都御史。

宋光蘭，號綺石，福建莆田縣人，海防道副使。

王徵號葵心，陝西涇陽縣人，遼海監軍道僉事。

吳惟誠，號冀峯，北直冀州人，登州知府。
賈名傑，號翠宇，北直眞定縣人，登州同知。
秦世英，號北溟，陝西三原縣人，蓬萊知縣。
王尚坤，號心求，福建龍溪縣人，蓬萊訓導。
張燾，字維炤，浙江錢塘縣人，東江前協副總兵
中丞孫先生，絕世聰明，於古今遠邇書無不讀，遵西儒教，以敬天爲主，以苦身守識爲誡，余里人王良甫先生，深交篤信，二十餘年矣。迨孫先生節鎮登城，勞心焦思，欲爲主上分憂，欲爲小民造福，良甫先生亦以虛衘共事，正相商而圖吾君，無奈吳橋之變，相適而成禍亂，西先生即有一片赤心，亦無能施其經綸矣。航海就法，西曹幽禁，有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之意，及良甫先生握手言別，孫先生自敘相知始末，出之素牋，以識道義之雅，患難之情，余小子偶一讀之，吁嗟太息，欲叩上蒼胡以擬此高賢，而不俾建非常之勳，且令困頓以死，天道眞不可解已！
崇禎庚辰春日

華池溫自知與亨跋

（四）再與向覺明先生論毛文龍事

覺明：兄撰席：前承左右以孫元化事下詢，即匆匆裁答，並附述毛文龍逸事，諒達鈞

覺。旋聞從者有敦煌之行，遂疏音問。忽老友夏樸山先生（定棫）來函，謂弟發現毛文龍從葡人習軍事與與習葡文兩項史料，實史學界一大事，並以民國二十二年羅振玉印行海寧吳騫編東江遺事見示，其書皆記毛文龍事，爲之狂喜。蓋客歲春暮，弟曾於桂林掃蕩報文史地週刊第六期讀朱倓女士撰「跋二則」，其一即爲「舊鈔本東江遺事跋」，久欲一覩其書，蓋弟與朱女士皆不知其已有印行本也。其書乃輯錄各家紀傳而成，力辨毛氏之冤死：羅振玉氏有跋亦以爲然。乃近年中央研究院所得內閣大庫檔案，尙有文龍與清往來文書，則其是否冤死，恐情節複雜，猶有待於更公正之史料與更詳密之考證也。結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題東江事跡，亦稱「凡杭人無不訴毛文龍之冤者，其昧於鄉里之私，而所見如傖父，可一哂也！」其言雖譏杭人，然杭人盛言文龍冤死，而非出於一二親友之阿好私諛，亦適可於此見之。樸山兄搜集文龍史料甚富，彼蓋有志爲文龍作傳者，吾人可拭目待之。

（五）復歐陽瑜先生（琛）論滿州西洋火器之由來及葡兵援明事來書

杰人先生著席：數月前嘗從向覺明先生問孫元化守登事蹟，蒙示以抄存各項有關史料，因得檢讀益世報文史副刊八期先生與覺明先生之復書，博聞卓識，無任感佩，毛文龍係奉教教友一節實闡明清史料上一大發現，其影響鉅大，自不待言。琛孤陋後學，於此不敢贊一詞。但因琛在此間之研究專題爲清代武器之演變，故於登州事變孔耿入滿與滿洲武器發展之影響，頗欲一加探索。今獲讀先生之文，不啻得一極有價值之啓示，惟尙有疑難

二歲，敢冒昧求教於先生。竊考崇禎時代史事，據明史莊烈帝本紀一，在崇禎二年六月（即後金國天聰三年），王蔣二氏東華錄則見於天聰二年四月，容後詳考。東華錄並載天聰三年五月與九月曾兩次遣兵往「椵島毛文龍」，椵島實行「攻剿」，均稱「斬級俘獲以歸」。又滿洲鑄紅衣大礮據王氏東華錄始於天聰五年正月，而於是年七月即有隨營紅衣大礮四十位之記載。（按孔耿攜礮投滿在天聰七年）以當時滿洲之經濟情形而言，於數月間鑄成大礮四十位，即使於熟練技工方面不成問題，（例如爲滿洲最初鑄礮之王天相金世祥均屬遼東銅工之類）然於設計造礮之技術問題，殊覺無法解決。琛嘗妄揣測：文龍既爲粵人（明史謂係仁和人），曾從葡人治軍學，且遊鎮皮島牽掣滿洲者歷有年所，以孫公爲例，文龍邀致中外教友於島中以資襄助，當有可能，尤以鑄造銃礮之技術人才爲然，故在此種假定之下，當文龍慘遭誘殺之情形中，此類銃師或因避禍情急而走遼東，或因逗留他方而被滿兵捉俘，則滿洲因得使代造礮實甚可能，且於鑄礮時間上亦較合理，此爲琛之假定一。又考孫公巡撫登萊，當時公教教友之在登者除王及甫張藻外 ，尚有外籍銃師多人，據崇禎長編登城失陷後，外籍銃師死難者有公沙的西勞等十人，重傷者十五人，赴登外籍銃師是否僅止此數，無從稽考。曾聞先生曾告以倍德昭與士禮二書均有此項記載，但均無法見到。琛以爲孔耿均爲文龍舊部，既叛之後，觀其於孫公等不加殺害等情，則銃師之被害受傷，恐係守城拒戰時所致 。其後孔耿投滿攜帶大批槍砲，崇禎長編及王氏東華

錄均不記載，若吾人能證明赴登銃師不止二十五人，則有少數銃師被迫僧役滿洲，亦爲頗近情理之事，蓋大礮點放稍準亦需人爲之指導也。以上之假定二則，均苦無有力之史料爲之佐証。久仰先生見聞賅博，且於公教書籍靡所不窺，尚望宥其冒瀆，不吝賜教。再者與爾來盎司鐸其人其書，及其記述毛文龍事之權威性，亦希示知一二，不勝感禱！謹此肅懇，敬請著安！歐陽琛謹啓。

復書

伯瑜先生著席：遠辱惠書，並以滿洲紅衣礮之由來見詢，謹就所知，略述如左：

與爾來盎神父謹言毛文龍習葡文，並從葡人研究軍事學，是吾公教教友，則未明言。文龍爲杭州人，謂係粵人者，或因其曾到澳而誤也。與神父爲十七八世紀之際耶穌會之史學大家，著作甚多，如暹羅首相公斯當傳（里昂，一七五四版）；徐光啓孫女許太夫人傳，按此書原係柏應理(Couplet)撰；利瑪竇傳（一六九三年巴黎刊印）及韃靼人兩次征服中國記等，皆爲法文，其材料則盡得諸東方傳教士之報告與函牘，故其書亦頗可靠也。

關於尊擬第一項假定，弟所得西文毛文龍史料，已詳復向覺明先生，並無新獲，故文龍幕中有否外籍銃師殊不敢必。惟向澳門購銃之張燾曾任皮島副總兵，皮島爲文龍所據地，蛛絲馬跡，不無可疑耳。東江遺事有無名氏紀事附本末備遺所記「毛帥東江」謂：天啓元年七月初九日毛文龍率部至石城島，得銅砲一，鐵砲四，不知是否西銃也。又毛奇齡

撰毛總戎墓誌銘，稱文龍在皮島「日市高麗暹羅日本諸貨物，以充軍資，月十萬計」。文龍有暹羅貨物，亦可想見其與外國人蓋早有往來也。蓋當時視西銃為秘器，不肯輕洩。故徐光啓崇禎三年正月初二日疏中有「火銃一發數里，又能命中；然利害甚大，不宜浪發一切裝放，皆有秘傳；如視遠則用遠鏡，量度則用度板，未可易學，亦不宜使人人能之，所謂國之利器，不可示之也。」故文龍部下，有無此項利器，或須有西文新材料發現，始可肯定也。

惟天聰五年，滿人以六七月時間，成紅衣大砲四十位，非不可能。觀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一六七四——一六七八）前後造成紅衣砲大小二百具，平均每年亦得六七十具；而康熙二十年則更一年間鑄成神武礮三百二十具，計半年得一百六十具。其時去天聰五年（即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已四十餘年，但造礮之速度亦在三倍以上，以技術進步之比例言之，則天聰五年成紅衣大砲四十尊，當非不可能之事。

即以設計造礮之技術而言，則嘉靖間副使汪鋐已獲佛郎機而進之於朝，廣東巡簡何儒並招降佛郎機人而得其銃法。萬曆間王鳴鶴撰登壇必究，（此書在清代列入禁書）卷二十九火器，且已詳言其鑄法，並有附圖。書册一經流布，則傳入滿人之手，亦理想中事也。

但無論如何解決足下所擬之第一與第二假定，或為便於明瞭其他附帶問題，弟這裏敢陳

之辦法，似應將有關葡兵援明之西文史料完全譯為漢文，以求印證，而供研究晚明歷史（任何一方面）者之參考，想足下必以為然也。

金尼閣 Tri ault 一六二一年報告（一二三頁）Relatione aelle Cose piu notabile……又巴篤里（譯音）Partoli 耶穌會史中國之部 Dell' historia aella Compagnia de Giesu. La Cina（一六六三年羅馬出版）（六九三，六九五，六九六等頁）：

（徐光啓）乃就戰局進奏，直言戰爭中所犯之錯誤及驅敵出境之方策。此奏既上，光啓乃為闔朝所注目。光啓所貢獻方法之一，即為招募澳門葡萄牙兵，然其目的所在，乃欲同時招致教士也。此議為朝中大員全體贊成，然而皇帝仍照其向例，置光啓奏中所言於不聞，對此事亦不發一言。

Kirwitzer所著一六二〇年報告書（七五頁）Relatione delle Cose Piu notabile…… Relatione Dell' Anno M.Dcxx P75亦有記曰：（此書乃一六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澳門發出者）按此人獨承鈞節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譯作祁維材，乃一六二〇年與金尼閣同來澳門者。

（光啓）乃召瑪爾定博士來，（「博士」為當時外人對中國舉人以上科名之稱呼，瑪爾定乃天主教聖人名，故其人必係教友，此乃受洗時所用者）並委任兵部副侍郎。（？）此人為中國最優秀教友之一，曾掌軍中高級職務，然因見嫉於同寅，乃削職，

而所有私產亦俱被沒收，已賦閒八載，其生活多賴光啓為之維持。當時二人之心志，皆欲為基督多收戰士。（按即多引教士入境之謂）

金尼閣 Trigault 一六二一年報告（一三九——一四〇頁）Relatione dell' Case、Più notabile……Relatione Dell' Anno M. DC. XXI. PP139—140又記曰：

然（光啓）在未知葡萄牙人是否願來並能來援助中國之先，亦不欲在帝前特有所書，蓋如葡人不願，或不能來，則彼亦可免食言之譏也。於是，乃致函中國教會之二大聞人，即李之藻與楊廷筠。（時二公均在杭州原文誤作南京），光啓囑即派遣一二新教友赴澳門，告以此行必大有利於國家，尤能為教會樹大功。張彌額爾（即張燾）與孫保祿（即孫學詩）遂膺此任。二人抵澳門後，下榻於吾（按指耶穌會）公學，葡人欲以正式官禮接待，而教中上司不允，蓋二人乃朝廷官員以私人名義所遣，並非奉旨而來也。二人乃備陳來意。時葡人雖可託詞不允，（按其時葡人須防範荷蘭人來犯）然二人竟未遇絲毫困難，乃捐貲將所得四尊大礮，寄送光啓，以便轉獻於帝，以充軍援。然二人仍不以此為足，復以自費聘請礮手四人，蓋欲以此表示效忠於君也。顧廣州之地方官，以此舉適足以顯示彼等之不能為國盡力，乃宣稱不奉上諭，不能准外國礮手入境；於是遂遣回澳門，惟大礮則仍得通過。

巴篤里關於此事，亦有記述：（見同上七一六至七一七頁）

其時，葡議派遣葡國武裝精良者，前往輦援明帝，又另派百人爲助手，此百人固亦從軍者。又 萬利和Laurent de Lis Vestio 統率全軍，同於陸軍中將 Lieutnant 固驍勇有爲之人也。萬將軍之所以欣然接受此艱鉅之任，固不在虛榮，其惟一目的，乃出於宗教熱誠，欲借此伴送教士入京也。關於此舉，吾人當歸功於李之藻，其時之藻亦奉召入都，任監督軍器(原文直譯當作任「對滿戰事軍需監督」)乃上一最有力之奏章，極言招募葡兵與利瑪竇同會士之需要：此議爲兵部一致通過，皇帝乃下詔至澳門，並頒諭孫學詩及張燾二人。皇帝欽派使臣至澳門，實屬創舉。當二人出現於澳門時，因侍衛之盛，民衆夾道而觀，羣欲一親豐采，澳門士紳亦全體率儀仗相迎，並在大華美大廳中接待。欽使因不久以前，某英船爲颶風飄流至中國東岸，舟已被損，舟上所有巨礮三十尊遂爲中國所獲，故要求聘請優良礮手十人。蓋前所聘四人，已被迫回澳也。

巴篤里(同上七二九——七二〇頁)曰：

(沈㴶)乃抗言反對求援於葡人，並謂彼之理由，絕無可駁之處。蓋若葡人可以戰勝滿人，則我爲滿人所敗者，更不足爲葡人之敵也。前門拒狼，後門進虎，非智也。對滿戰事之失利，乃偶然之事，卽有錯誤，亦士兵之咎，非吾濟國者之罪也。使武裝之外夷深入堂奧，並及於輦下，皆贖已極，貿然許之，則吾人之過，誠有不可卸責

者，況外夷之覬覦我國，初不在滿洲之下，又何况其兵力尤強，尤爲可畏乎？

一六二一年金尼閣自杭州發出之每年報告，亦述及孫張二人抵澳門求礮事。此報告書爲「天啓元年七月初八日卽公歷一六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發。Relatione……（一五〇——一五一頁）

當予抵澳門時，適有二學者亦來取礮，彼等一見大批書藏（按卽七千部，參見拙作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及其他珍品，不勝驚奇。

巴篤里（前書頁七七一）曰：

一六二三年之始，中國全國教會有一無可與比之愉快而光榮之事，卽教士因兵部之奏請與皇上之准許而得回返京中也。此舉之成，實徐光啓與李之藻之功，蓋二人曾向兵部建議，招致澳門葡軍及礮手，並召教士來京，共禦滿人，以渠等均曾學習大礮瞄準之術，正爲中國人所不知者。

曾德昭P. de Semedo（中國全史三四八——三五〇頁）亦記曰：

自南京教難以來，滿人已對中國用兵六七年，戰爭頗爲劇烈，中國軍隊被擊破，遼東省有數城被陷，中國人對滿人之前進無已，竟束手無策。時各教士謀能在國內公開傳教，然最大困難，卽無皇帝之許可，不能反其上上諭而行，吾教友與吾教諸學人，（原文作博士）乃擬乘此對抗戰之機會，向皇帝進奏。先陳戰爭所加於中國之不

科，次述編遂西洋文化之精誤，以教士除□德□欽外，且具大才，而尤爲優越之數學家，其學必有特別秘密及特獲之處，爲國家目前情形中所必需者。苟彼等能如已往之繼續在朝者，則今日國家局勢必可改觀。最後則謂西士或尚未盡數離去，但因地域遼闊，路途艱難，恐非短時期所能歸來，請皇上下諭各省，留意訪覓，一有所遇，即令送京報效。西教士因並不盡諳軍事，亦不知使用火器，故對教友所採用之方法，極力反對，且欲教士重來，尚有其他理由可言也。李之藻，彼爲此劇主要角色之一，聞此非難，即答曰：苟答以軍事相委者，請勿急，當如製衣者之用針，迨線既穿過，而已成衣，針即無用，軍械之術，不妨以針視之。但使君等能借帝命公然入華，則此後自可放下刀劍，換上筆墨，以著述代從軍，乃可以破迷信而傳真教。於是遂將奏摺遞上，其負責進呈奏章諸人，亦頗幫忙，故未幾即呈御覽，並如吾人所視，皇上一一照允，交兵部議處，兵部不僅全部通過，且附加多語，謂伊等深信各教士必能以其數學上之秘密，使滿人生畏，蓋滿人必將[illegible]指揮其軍隊，且能攻破之，並必從速訪覓外但彼亦不必遠求，且原任此職者，必能知伊等之所在也。

此篇並對諸教士及對李之藻之計劃與之藻之答辯，亦有敘述，惟較爲簡短。但繼曰：（原書七七一——七七二頁）

於是龍華民P.Longobardi及陽瑪諾（亦曰小湯瑪諾）Em.Diaz de Castelblanco

二司寧遂請指定前往，由兩廣總督巡撫之公文北上，甫抵京，即到兵部引見，並受殊禮款待。與澳門撥兵事相詢，繼又問及二人之軍事學與礮術，二人乃據實以告。謂對於軍事及火器，實無所知，而伊等職務亦須合乎伊等之身份，如指示救靈之道，教人事主耳。僅在此軍務倥傯之際，伊等亦非無可爲力者：蓋伊等可以約束自澳門招募而來之葡兵與黑奴，使生活檢點，服從命令，效忠皇上。諸大臣聞之，已頗欣慰，乃出示關書第一版，並按宮中儀式，各賜一馬，以便訪客及其他事務之用。未幾，反對武裝外人入京之奏章紛然而至，李之藻乃受懲處，自北京調回南京，葡人則除礮手之外，一概不許入境。時有教士二人已準備偕葡軍同來，以便分赴各省成立新教區，至時，遂被剔除。後又有葡國礮手七人之不幸事件發生，乃使反葡達於頂點。此七人者，衣服奇偉異常，幾不類礮手，入都時大爲人所注目。時中國人不知礮術，葡兵固不難一獻其技也。詎當第一次試礮時，不知是否因礮身製造不堅，抑因點放不得其當，礮忽炸裂，碎片飛入天空，葡籍礮手一人及其若干鄉人竟因而殞命。此數鄉人者，爲好奇心所驅，不知自慎，佇立過近，致遭不測。華人迷信最重，往往以一例他，故試礮之舉不能繼續進行。而文武百官及皇上，亦以葡軍之來，原爲增援，乃竟傷害自所志願保護之人，遂斷其必有害無利；立命返澳，毫無挽回餘地。至龍華民與陽瑪諾二人，則除若干洗禮之小販，仿效天主教者以外，亦無人主張伊等出京，故不爲人注意，二人

得

亦如擴其對李之藻所言，各國京中，除度其士外，別無所務。

衛匡國 Martin Martini 之韃靼戰記 De bello tartarico（即後來曾德昭中國全史所本者），亦述及赴澳求援事，詞句微有不同，亦譯如下：

時大戰已臨頭時，乃有奉教學者二人，一名保祿，一名彌格爾，按指徐光啓及楊淇園，或誤指孫學詩及張燾）向皇帝奏言，赴澳門敦求大礮及礮手。二人之意，乃欲借機使耶穌會士得入內地，傳揚甚有信仰。皇上准如所奏，命人送教士前來，蓋自萬曆下諭（禁教）後，教士僅能隱密傳教也。於是教士多人，借葡軍入中國。魔鬼及其黨羽雖百方阻撓，而聖教終於日益發皇，皇帝亦准教士在全國公開宣傳。

曾德昭又有書作，公沙的西勞 Gonzales Texeira 道出之文，見 Manuel de Faria y Sousa（1590—1649）Imperio de La China（一六四二年馬特里出版，一七三一年里斯本出版一九六頁）：

最後，滿人繼續作戰，且獲大捷，要求明帝以最北之遼東省割讓滿人。滿軍遂已北京附近，大戰遂起，但明軍雖犧牲多人，終致獲勝，並迫滿人退回他處作戰。未幾葡人公沙的西勞入京，並攜有澳門城（指澳門葡政府）所進呈之禮品，渠本人亦與若干優良士兵介紹於兵部諸官。各官均欣然接受，並指定一人為嚮導，而神父陸若漢 P. J. Rodriguez 亦與焉。在澳門所約者共四百人，多數為葡人，餘為中國人，亦曾受葡

人訓練，俾等知使用大礮。□每一士兵各有一侍役，亦受皇餉。士兵之軍餉尤豐，除能置備最漂亮之服裝及精良之武器外，尚有富餘。渠等登舟時，有軍佐二人率領：一爲Cordero，一爲Rodrigue ae (Cabo（及）伊等之將官與副官。在廣州時，渠等之職□與儀式容及精幹，已引起中國人之驚奇。並有人供給小艇渡河，彼等行經河岸，中國人俱以種種方法加以修治，俾平坦可行。抵某山（按爲梅嶺）盡一日之力，乘騎而過，復登舟而下，幾越江西全省，至省城，予時在城中，予之教友亦在焉。葡軍之容姿與武器及其　裝方式，在在引人注意；又以彼等之服裝多經剪裁　，觀者竊竊私議，以爲太好之布，何必四分五裂，若以爲不可解者。實則彼等固以此而暗笑，然葡人見此無謂之新發現，亦不禁腹誹也。

雖葡萄人亦曾在同樣受歡迎情景中，爲人敬重，然竟毫無所得，廢然由此回返澳門。在廣州，中國人之與葡人貿易及作經紀人者，獲利甚巨，均恐葡軍入國後，通商事業必因此發達，葡商亦易於入境，且可親自經營，不必假手於中間人，致受剝削。職是之故，在葡人未抵澳門前，彼等即入奏於廷，說明武裝夷人入國之危險；據云彼等並以厚禮賂大臣，然求援之舉，本出於大臣之議，言猶在耳；況葡軍之來，所費已多，而竟謠□□緊要。皇上乃答稱，不久以前，卿等方進言於朕，欲用葡人拒滿，今卿等□謂此□爲□□者：此□爾等如有所言，務須深思熟慮；苟葡人不諾□者，可

今回去。

巴篤里（見前九六一頁）又曰：

　　中國教會因彼（按指龐類思）及鄧玉函 J. Terenz 之死所受之損失，賴本年（按指一六三〇）十月間五教士之來華，得一部份之補償。其中意大利籍者二人，即 P.T. Grassetti（謝貴祿）與 P.P. Canevari（聶伯多），葡萄牙籍者一人 P.B. de Mattos（林本篤），法蘭西籍者一人 P.E. Le Fevre（方德望），弗蘭芒籍者一人 P.M. Trigault（金彌格乃金尼閣之姪）。彼等之入境也，不如以往之須採用秘密方式，乃係公然而行，且不衣葡裝，蓋其時澳門適有大礮十尊進呈明帝之舉，教士遂受其惠。大礮之外，並附有大量其他火器，皆爲抗滿之用也。隨來者並有人數相當之礮手及若干重要之人物與澳門人公沙的西勞高蘭雅 Gonzaliz Tess'eira Correa，澳門政府並特別以陸若漢神父爲渠之譯員。陸神父乃自北京派赴澳門求葡萄牙人之新援者。

巴篤里（同前九六七——九七〇頁）續記曰：

　　公沙的西勞偕其礮隊行抵距北京數（Leghe 或 leohe 約合四公里）知良鄉已爲清軍所陷，涿州亦受震動，良鄉適在涿東與北京之中，而葡軍之目的地固在北京也。涿州則爲北京之最後門戶，距北京城僅七 leghe，城中人一部份早已疏散，的西勞與所率

侍衛一小隊，入京相護，使命乃在負守京城[illegible]之一角，裝備大礮，居民亦各攜火鎗。然滿軍對此西洋戰場竟不投身前線，且並所佔民鄉亦放棄，而攜掠得之物，退回遼東。此出乎意料之退卻，使的西勞獲得莫大之榮譽，雖敵人敗退之原因不一，然兼借退敵之力，即的西勞到臨之消息。而皇上亦深因滿軍之長驅直入，以致憂慮不安，故對葡人之來與其進呈之物品，均極滿意。聞敵退，的西勞及陪伴的西勞而來之陸若漢神父，即向皇上入奏。若漢摺中則明言自己為利瑪竇同會士之一，蓋瑪竇之名在京中頗負盛譽也。又稱自己與瑪竇所傳之教無異，皆為闡揚真神及其聖誡，此教已大行　歐洲與全球之大部份土地，而此次自澳門前來之葡人，亦期以使帝得一充分之認識也。的西勞則表示其代表任務完畢後，請皇上欽准，彼甫自澳門招致三百葡人前來助戰，並請以彼等之勇敢善戰及彼等所加於中國人之鼓勵，不僅可使滿軍敗退，遂出中國版圖，且可直入彼國，跟蹤追擊。……帝即以其奏交兵部議商，兵部因得徐光啓之贊助，遂順利通過，的西勞留在京，而決定派陸若漢回澳門招募三百人，並率領前來。若漢行前，所得公文，對若漢稱頌備至，譽為忠實可靠之人，而惟以道學是務者。澳門葡人亦極需要明帝之額外垂青，俾澳門已往所得之特典，可一變而為永久之權利，故皆以此為千載難逢之機，亟願立功報効，故數日間即有一百五十葡人，服裝軍器，俱已充實，侍役之數亦如此，陸若漢暨上述五位神父亦同時登程，曾

往皇帝指定之北京，此外復有巨礮一大隊，亦隨同運入中國。但不知是否因清軍已在距北京數Leghe處退却，抑因有若干大臣，向皇帝奏言容許武裝外人入境之危險。當葡軍行抵江西省城南昌時，皇帝所派之捷使即令阻止前進，並令折回澳門。惟因澳門有新購皇帝之軍火一批，故陸若漢及其他若干人仍得繼續前程，北上入都，並由北京前往登州Tim-eu ，其地近滿洲僅數「千步」（Milha），乃邊境一小城，明軍將領孫元化即駐其地，其人予已一再言及，乃一極誠篤之教友，處事謹慎非常。其尤爲中國文人所不可多得者，即彼在軍事上亦驍勇異常，觀清軍屢敗於其手，已可爲明證。最近又以手連克四城，遂被擢爲遼東（按指登萊）巡撫，（Vicere）元化並非舉人（Dottor），而得此銜，誠異數也。元化雖會試敗，但因曾派三千軍人守衛該城並留置抗戰之必要品，乃不數月而該城竟失，的嘉勞與其他葡人咸以身殉，元化不幸亦被斬首。此事之發生，乃因三千士兵，在若干官吏轄境內，所受待遇惡劣，此等官吏對國家大事毫不關心，士兵爲饑寒所逼，憤恨不平，遂出而搶劫，凡落彼等手者，且俱爲所殺，事後畏罪避罰，乃逃往城郊村落。又因出走時，城內尚留下自衛之人員及武器甚多，爲貽後患，遂冒險於午夜襲城，並以先鋒，元化與的西勞，各率士卒，出而抗拒，終於不支，在極危時中，的西勞直衝而上，一手執燈，一手向叛兵發礮。其叛兵遂向勒登之目標放箭，箭中其胸，遂於士兵前倒地。不幸箭已穿透胸部，

次日身死。居民爲免禍起見，乃開城而降。渠等（元化與的西勞所部）雖奮勇抵抗，但亦徒使城中人增加死亡而已，況其中葡人之數亦復不少，（e fra essi de Prtoghesi non Pochi）於是陸若漢乃借礮手三名，自城上一躍而下，逃奔北京。其時上積雪甚厚，一望皆白。數日後，城中居民及叛軍咸頗懊悔，乃向皇帝求恕，賴人對情，皇上亦遂寬赦一切。

然元化及張燾與王徵（原文作張彌額爾與王斐理伯博士）則被押至京，元化與燾因同僚之嫉妬，被判斬首，徵則削職，家產沒收，倖獲身全出京。湯若望司鐸 P. Adam Scial 乃以煤煙將面部塗黑，並全身改裝爲炭夫，又以其能操純粹華語，遂得混入孫張二人被拘之所，一若真爲炭夫者然。若望在獄內凡一日半，爲二人舉行告解赦罪禮，並加以鼓勵。元化奉教虔誠，爲諸神父服務已歷年所，故能於臨終時獲此殊恩也。其人有大德，此次部下譁變，本可以上邀皇帝之矜宥，蓋不獨其已往屢立大功，而有光榮之蹟，即此次叛軍曾願擁立爲王，彼以此舉爲不忠於天主，不忠於皇上，毅然拒絕，且曰：寧授無瑕之首，不冠下萬有玷之冠。元化慷慨就死之情形，亦爲人所驚奇。教中人則以其護法甚力，尤爲痛哭哀悼，蓋元化之死，在教會實爲一鉅大之公共損失。至於西勞及其餘礮手，皇帝命以盛禮舉喪，並追贈官銜，蓋官銜在中國實視金錢爲重也。陸若漢與其他餘存葡人之要求返回澳門者，則亦優待有加，准予給

暇，旅途淹逗留三月以上之時間。因徐光啓之請，兵部於一六三二年六月十九日特發一極長之公文，敍述陸若漢之勛勞，並屢次提及耶穌會，蓋中國人已開始認識耶穌會爲一種宗教團體，會士皆志在中國傳布其教者。……

此外巴篤里於敍述 P. Palmeiro 神父（中國印度日本教務視察專員）時（同書頁九一一——九一三）亦略及公沙 的西勞等入華情形曰：

彼對進入中國之種種方法，猶豫不決，最後乃決定與公沙的西勞同行。彼乃澳門政府應中國皇帝之請求，攜帶大礮十尊及率領優秀礮手四名前往北京者。然自陽曆十二月十五後（一六二七）至次年二月終，仍不能出廣州，彼以六十高齡，際此嚴冬時期，或棲身小艇，或與衛軍同居某廟，而廟內猶視舟中差勝。最後彼乃獲得自由，而能入中國境，並至北京。

以上材料與漢文史料若徐光啓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 ，李之藻奏爲制勝務須西銃敬乞亟取疏，及崔景榮等奏爲制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等，（俱見增訂徐文定公集卷二）咸能相互印證。且曾德昭謂北上澳門援軍凡四百人，多數爲葡萄牙籍，少數爲中國人，但亦曾受訓練，而爲優秀之礮手。巴篤里則稱北上者有礮手二百人，巨礮一大隊，又明廷蓋已在某英艦上得礮三十尊，可知足下假定赴京銃師不止三十五人，甚極合理也。又民國十九年，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在北平徵集及發掘古砲一千餘尊，內有一千五百五十年荷蘭東印度

公司所造之古砲及葡萄牙人所造古砲。可見西洋砲傳入中國，實甚早也。此「又有一銅砲，被識爲「神威大將軍」，大清崇德八年十二月造，重三千七百斤」。則係關外所製，時爲明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當亦係明末教士所造也。又戚繼光練兵實紀及紀效新書兩書，時時提及「猴機手」，即佛郎機手之簡稱。則吾國習西洋火器之風，已盛行於萬曆間矣。尊作何時出版，深以先覩爲快，專此佈覆，敬候明教，並頌著祺。

弟豪拜復。

（六）與張西山先生（維華）論清初所譯西洋音名

及西儒耳目資中之V音

西山我兄如晤：頃：文史雜誌第一卷第十期，讀尊著「明清間中西文化接觸中之音學音樂及對中國語文之貢獻。」略有所見，謹[illegible]陳如左：

（一）兄文引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桂林掃蕩報文史地週刊第十三期「康熙與德理格」一文所錄羅馬傳信部東方檔案中之西洋音名「烏、勒、明、法、朔、拉、」曰：「說者謂「烏」不合於今之「d」，或爲「烏」字之誤，理或然也。」弟按現今通用之音名，爲Guy d' Arezzo（1000—1050）所創始，蓋以拉丁文聖若翰讚每節之首字，或首字之首音爲音名也。以今則用CDEFGAB。茲錄聖若翰讚於後：

Ut queant laxis

Resonare fibris

Mira gestorum
Famuli tuorum
Solve polluti
Labii reatum
Sancte Joannes

第一字若按拉丁音讀，正爲「烏」音，而非「鄔」音。至一六四〇年，乃有義大利人以Doni代Ut，緣義人讀Ut，其音頗感不便也。又Guy d' Arezzo生時，不用si音，渠循當時習慣，而稱剛B音或强B音，所以別於柔B音也。及其卒後甚久，始有採用聖若翰讚（見上）末段二字之第一字母，拼成si音也。

（二）尊文以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分諸音爲二十九音素，又將二十九音素分爲「自鳴」「同鳴」「不鳴」三類，所謂「不鳴者」，余嘗釋爲「他國用，中華不用，」推其意所謂中華無此字也。兄有按語曰：「按V音中國亦用，不知金氏何以謂中華不用而去之。」弟按V音金書已列入「同鳴類」，固未嘗去之也。兄試一檢之，即可得也。辱在知交，用敢直告，敬祈垂督，並頌撰安。弟方豪頓首。

附傳信部檔案原文（一七一四年）

「六月二十二日首領帶起麟傳旨西洋人得里格教的徒弟，不是爲他們光學彈琴，爲的

是要學律呂根原，若是要會彈琴的人，要什麼樣會彈的人沒有呢？如今這幾個孩子，連烏勒明法朔拉六七個字的音，都不清楚，教的是什麼？你們可明明白白說與得里格，着他用心好生數，必然教他們懂的音律要緊的根原。再一着六十一等教道他們。」

豪按「六十一」乃人名，旗人習俗恆以數字爲名。如著西域聞見錄（亦作西域記）之椿園先生，即以「七十一」爲名者。其他國朝耆獻類徵，三州輯略及新疆總統事略中，亦屢見之。

（七）與翁詠霓先生（文灝）論清初測繪地圖考中之漢譯外國人名

詠霓先生大鑒，敬啓者：尊著清初測繪地圖考，自發表迄今，即爲士林傳誦，競相引用，具徵需求之亟，並以知鴻文之受人推重也。豪不敏，略治中西交通史，去歲應浙大友朋之約，來此講學，再讀大作，見有可商榷者一二事，張兄曉峯囑錄呈教正，未審有補於高明否？

（一）西人已有漢姓漢名者，應緊漢姓名，尊著亦從此例，惟尚有少數音譯者，擬僭爲更正如下：

馬俠當作馮秉正　　哥皮爾當作宋君榮

多馬斯當改安多　弗里德果應改費隱

卡多羅應改麥大成　蓬若瀚改山遙瞻

搭脫附應改湯尚賢　肯特雷應改德瑪諾

風德爾應改洪若　勒貴德應改李明

皮諾斯脫應改蔣友仁

〔二〕Simcnelli 之漢姓名爲徐茂盛。

〔三〕因原書原名印誤而譯音不正者，如卡多羅之原名爲 Cardoz（或作 Cardoso），墓碑作 Cordos，譯音當作卡多索，蓋原書誤爲 Cardolo 也。又肯特雷之原名爲 Hinderer，譯音當作因特雷，而不直從 Kinderer 之誤也。其他西字排印錯誤者甚多，不及一一更正。（本文付印時，恐亦不免有此現象，則無可如何也。）

〔四〕Bonjour Augustin 爲一人，嘗譯爲「奧斯定會士山遙瞻。」緣當時參加繪圖工作者，幾盡屬耶穌會士，獨山氏爲奧斯定會，故特表而出之。山遙瞻之名見其墓碑。

上舉數事，曉峯兄著「尙未成功的中國地圖」（圖書評論第一卷第三期），王以中先生（庸）「中國地理學史」等，皆有引錄，多仍其舊，故不揣譾陋，輒瀆左右。惟我公進而匡之，則幸甚矣！專肅，敬請大安。方豪謹上。

復書（略）。

（附）復曾俊千先生（世英）論翁著讀故宮博物院重印乾隆內府輿圖記中之漢譯外國人名

來書

杰人先生道鑒：去冬尊著清初測繪地圖考中之一二疵誤，可否抄示？又方志月刊五卷四期曾載翁文灝讀故宮博物院乾隆內府輿圖記，翁亦有誤乎？希惠告，謝謝。專此，順頌道安。弟曾世英拜上。

復書

俊千先生大鑒，敬覆者：翁讀故宮博物院重印乾隆內府輿圖記中，如哥皮爾當作宋君榮，波諸亞當作蔣友仁，已見弟復翁先生書中。其他外國人之有漢姓氏而未列出者，僅有二人；一為雅洛莎 da Arocha 當改傅作霖。（按其人原名倘有 Darocha 及 de Rocha 二種寫法。）一為愛司丙哈 Espinha 當作高慎思。專此佈復，敬候潭居。弟方豪百拜。

（附）擬十七八世紀中外文化交通史要目

（一）科學篇

第一章　天文學

第一節　明末欽天監改用西人與曆局之創設

第二節　天文書籍之翻譯與天象之考測

第三節　明末清初欽天監以外西人之天文研究

第四節　楊光先等之反對與失敗

第五節　西洋儀器之輸入與清廷自製之儀器

第六節　國人研究西洋天文學之成就

第二章　數學

第一節　幾何學之輸入

第二節　代數學之輸入

第三節　其他數學之輸入

第一節　拉丁字母與拉丁注音
第二節　國人對拉丁注音之研究
第三節　國人對歐洲文學之研究
第四節　西人對中國文字之研究
第五節　中西文詞典與文法書

第二章　文學

第一節　中國一般文學之西譯
第二節　在歐洲風行之中國戲劇
第三節　在歐洲風行之中國小說
第四節　西洋文學所受中國之影響

(三)史地學篇

第一章　歷史

第一節　西人對中國編年史上古史及蒙古史之研究
第二節　中國通史與中國名人傳記之翻譯

第三節　民間之西洋畫與歐化畫家
第四節　在西洋畫上之中日關係
第五節　國畫西化與西畫華化之批評

第二章　建築

第一節　澳門肇慶南京北京上海杭州之西式教堂
第二節　圓明園之西洋建築
第三節　民間之西洋建築

第三章　音樂

第一節　西洋樂器之輸入
第二節　西人對中樂之研究及國人對西樂之研究
第三節　康熙乾隆宮中之西樂與歌劇

第四章　中國美術之西傳

第一節　羅柯柯作風